

一念

用经济学思考



上海三联书店

将复杂的问题用简单的方式说清楚，这是科学家。将简单的事情用复杂的方式说灿烂，这是文学家。将复杂的问题用简单的方式说得又清楚又灿烂，这是兰小欢。

● 叶三（诗人，《九万字》作者）

不是所有经济学家都关心现实世界，不是所有关心现实世界的经济学家都为普通读者写书，不是所有为普通读者写书的经济学家都能用中文写植根中国的经济学故事。小欢是关心现实世界并执着地为普通读者写书的中国经济学家。他的这本书用原汁原味的中文写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故事，引证的则是地地道道的正统经济学论文。如果你学过主流经济学，读此书会是一次愉快的复习；如果你未曾学过，读罢此书你应该想做个经济学家了。

● 李冠一（波士顿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

经济学可能是最违反常识的学科之一了。很多自视聪明的人在常识反复出错后，感到有必要学一点经济学以便在社会上更好地装，但又觉得学起来很枯燥。如果你凑巧是这种人，可以试试兰小欢的这本书。它解答的都是你多半会感兴趣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北京卖毛片的碟贩子大都集中在中关村？为什么充当人体炸弹的极端恐怖分子当中——和人们想象的刚好相反——穷人和文盲的比例其实很低？

● 罗永浩（牛博网创始人，老罗英语培训学校）

经济学算不算科学，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不过就好的普及读本而言，经济学和自然科学显然必需具备同样的要素：帮助人看到事物的深层逻辑，不高估也不低估读者的智商。这些年经济学成了显学，面向普通公众的读本层出不穷，然而就这两点来说，小欢这本都可算是上乘之作。

● 姬十三（果壳网CEO，科学松鼠会创始人）

ISBN 978-7-5426-34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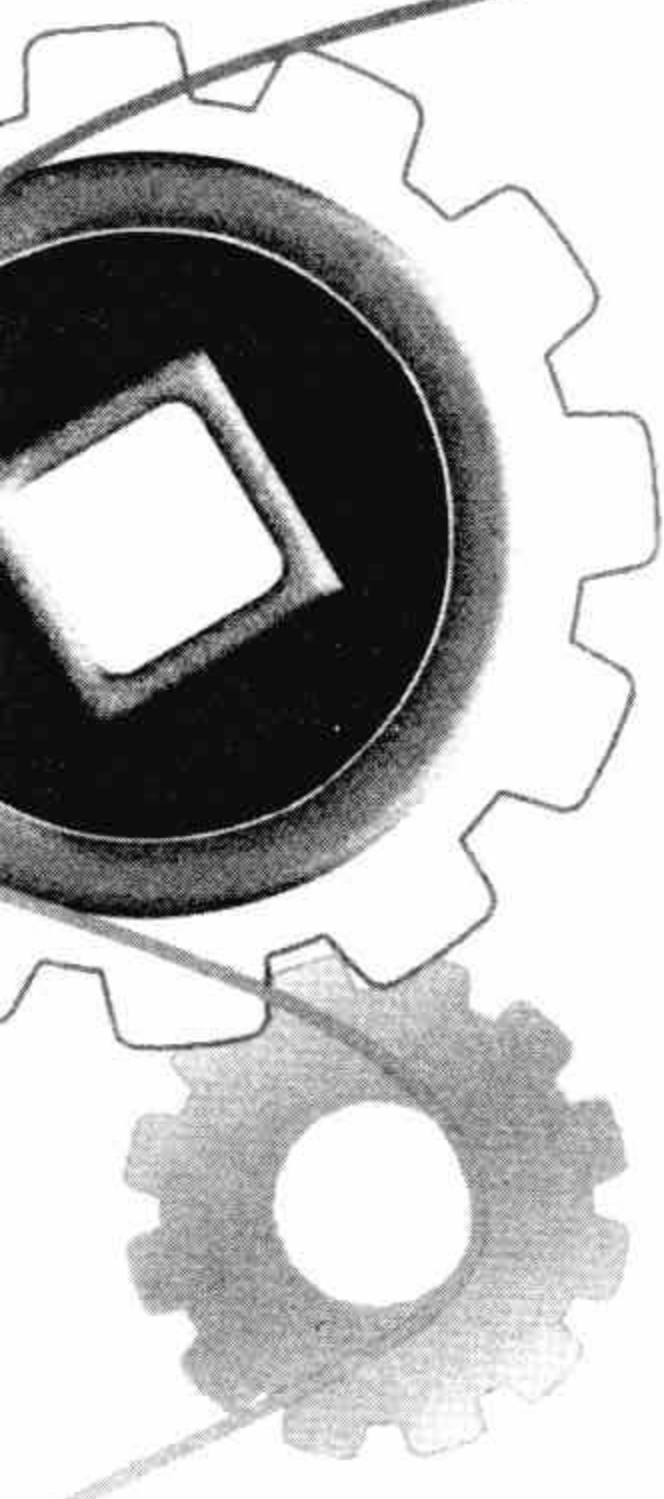
9 787542 634993 >

定价：25.00 元

一转念

用经济学思考

兰小欢·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转念:用经济学思考 / 兰小欢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1. 5

ISBN 978 - 7 - 5426 - 3499 - 3

I. ①一… II. ①兰… III. ①经济学—文集 IV. ①F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0128 号

一转念:用经济学思考

著 者 / 兰小欢

责任编辑 / 彭毅文

装帧设计 / 俞伟娅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 //www. sanlianc. com](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hsanlian@yahoo. com. cn

印 刷 / 上海叶大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120 千字

印 张 / 6.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3499 - 3/F · 583

定 价 / 25.00 元



序

美国有一档帮助穷人的电视节目,选定一户穷人家,一周内为他们建栋崭新的漂亮房子,全新的家具,车库里都放上新车。一夜之间,梦想成真,就要从此幸福地生活……不久之后,记者回访发现,很多受帮助的人把车和家具都卖了,换了钱。甚至还有人生活比以前更显困顿了些,因为付不起房子的财产税。

这本书里绝大部分故事,都有类似的情节:出乎意料,但转念一想又合乎情理。这些故事是从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那里听来的,我记录并转述出来。虽然来自经济学家,但这些故事和税收利息、国际贸易无关,而是柴米油盐的道理,是日常生活。拿虐待老人来说吧,子女不孝冷血当然是原因之一,但不管子女如何冷血,绝不会虐待家财万贯可以留大量遗产的老人。富有的老人,子女探望的次数通常也要多一些。忙还是不忙,子女要算时间的成本和收益。久病床前无孝子,富在深山有远亲,是经济学的道理。

本书很多文章取材于我 2008 年加入牛博网之后的博客内容。

像旅行家们记录旅途中的奇闻轶事一样,我把自己在经济学领域里见过的或好玩或古怪的故事记录下来。如果你觉得有趣,那我的故事就算讲成功啦。另外还有些在这旅程中的感悟,我也一并记录下来。

我感谢朋友罗永浩,没有牛博网这个平台,我不会写这些文章。我感谢编辑彭毅文和兄弟喻建欢,是他们促成了这本书。我感谢女友恬恬,没有她的照顾,我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整理出这本书,也感谢她对本书初稿的大量修改和润色。

书里的错误疏漏,我不是故意的,希望读者能批评指正,待以后有机会再版时改进。

序

第一辑：无情有理 1

锦衣不夜行 3

新年空余愿 7

偏以貌取人 1 1

博士不值钱 1 5

生命价几何 1 9

剩女与光棍 2 5

又帅又有钱 3 0

一夫一妻制 3 4

善心与市场 4 0

血头红十字 4 5

无知与仇恨 5 0

利益与伦理 5 7

常理破神圣 6 4

建美国大业 6 8

第二辑：非法合律 7 3

海盗与民主 7 5

估价太子党 8 2

扎堆卖毛片 8 5

走私与腐败 9 0

恐怖分子考 9 5

女巫与女婴 100

谁在打假球 106

他来自街头 111

第三辑：少迷多思	119
逻辑和因果	121
顽固的脑壳	127
专家的意见	133
性别与语言	137
活在比喻中	142
近代史教育	145
快速读书法	150
与学友共勉	154
青年探索者	159
科研伦理观	163
神秘的点球	167
钱都哪去了	171
纪念钟开莱	174
撞开那扇门	178

第一辑：无情有理

据说人是理性动物。我至今仍在寻找支持这说法的证据。

——伯特兰·罗素

锦衣不夜行

有朋友劝我没事常回国看看，他的原话是：人在美国而不常回中国走走，如锦衣夜行，不可取。那是说，虽然现在海龟快比中华鳖精都多了，不稀罕了，但留洋经历多少还残留了点儿显摆价值。过去是海外吃了肉，回国见了人就想张大嘴剔牙，现在虽然不太好意思这么做了，但时不时捂着嘴打一两个无伤大雅的略带牛排味的饱嗝，嗓子眼儿里也还是有股满足感。

谁不爱炫耀呢？有点儿成就了，不搬出来显摆显摆，简直了无生趣。谁都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如果甚至能摆出事实来证实这一点，那种满足感无与伦比。

要从炫耀中得到满足，需要几个条件。第一要件是炫耀目标得是你在乎的人。和陌生人瞎得瑟，没劲。可要是老同学聚会就大不同，若还能重遇当年暗恋的班花就更好了，当然前提是她有个窝囊老公。第二要件是目标群体中个体差异不能太大。老同学聚会，如

果大家都中年危机正为房子和奶粉发愁呢,你就更容易金鸡独立些。但万一目标群体差异极大,有的被强拆殴打了,有的正忙着强拆殴打别人日进斗金呢,你就不好炫耀了,因为其中还有人比你强很多,你要得瑟的话白费功夫,别人眼皮都不往你这边厢抬;也因为还有人远不如你到简直凄惨,你得瑟起来自己也感觉不太仁义,毕竟谁都不好意思和盲人炫耀视力。第三要件是你得有能炫耀的东西,而且得到这东西的成本不能太高;或者就算成本太高,也必须不能让别人知道。炫耀就是玩潇洒,就是玩“得来全不费工夫”,“踏破铁鞋无觅处”是摆不上台面儿的。

把这三个要件搞清楚了,就大概理解“炫耀”这件事儿了。

比如说青少年“奇装异服”哈韩哈日文身打洞吧,这事儿据说叫“街头文化”,但本质还是炫耀,满足上述三个要件。第一,那身儿行头是给同学朋友看的,主要目的是为让他们赞叹,捎带着让爹妈老师不爽一下,不过是附属效果。第二,“狐朋狗友”们之间差别不能太大。你弄个黄头发,我就弄个绿的;你打一个洞,我就打一圈儿。但如果其中有人天天开着跑车,副驾上的妞儿天天换,那我就没法炫耀了。第三,炫耀成本不能太高。为啥比的不过是身儿行头,不是跑车游艇呢?还不是因为穷。弄身儿好衣服穿双好鞋,勒紧裤腰带几个月也就行了,再进一步,就只能望洋兴叹了。

传统上,人们惯用“青春期逆反心理”来解释上述青少年的行为,这种解释没有内容。不过是想炫耀,不过是想与众不同,成年之后,心里的这股邪火和冲动就灭了?根本没有。但为何成年后的表

现与青少年时期不同了昵？因为炫耀的环境和成本都变了。随着交际范围扩大，身边各类人五花八门，不再是当年都差不多的同学，现在拿什么东西出来，好像都有别人比你强，炫耀达不到效果了。而且，炫耀的成本急升。年轻时因为大家都穷，摆弄摆弄衣服和头发就能与众不同。现在不一样了，想与众不同地夸耀一下吧，开个国产车你都不好意思和人家打招呼，怎么办？炫耀行为自然减少。

只是炫耀的冲动永远都在，成年之后虽然不靠奇装异服，但凡是逮到机会都要忍不住得瑟，那股劲头一点不输给“青春期叛逆”。

中国手机品种最多，价格卖相等千差万别，为何？因为大家穷得刚刚好：既富有到了可以买得起手机，又穷到了可以用部好手机就能让自己多少显得与众不同，过一下炫耀瘾。世界各大奢侈品厂商都爱中国市场，为何？因为大家穷得刚刚好：既有大量的人富有到了买得起，又穷到了这其中大部分人其实还得节衣缩食几个月，刚好达到炫耀的目的，那价格和火候，真是拿捏得准。

和“街头文化”一样，据说奢侈品消费的也是“文化”。这文化的要义在于走高贵路线，营造高贵气氛，但目标客户可绝不是盖茨和巴菲特。真正支撑这个市场的，就是海量城市白领，买不起游艇飞机又渴望引人注目。不奇怪，“炫耀性消费”是经济学经久不衰的话题。

美国电影中，街头的黑人总是打扮得金光闪闪，开很炫的车，戴很炫的珠宝。研究者发现，与同等收入的白人相比，黑人在“可见消费品”上的支出要比白人高 25%，这多出来的“炫”都是从其他消费

品的开销上省出来的。这难道仅仅是因为黑人比白人个性更张扬么？那为什么黑人中的中产阶级和白领们穿着打扮就不那么张扬呢？其实，黑人比白人这多出来的 25%“炫耀性消费”，几乎完全是因为黑人整体比白人穷。研究者还发现，就算同为黑人，穷人也比富人更爱炫耀。这一规律是跨种族的，黑人白人墨西哥人，都如此。

可以拿来炫耀的，可不止是消费品。学历、娇妻、刚爸爸、权贵名流朋友，都可以拿来炫耀。当然，如消费品一样，这些资源本身都有很大实际价值，“可供炫耀”是额外的价值。但无论炫耀的是什么，炫耀这种行为本身，道理都类似。要秀得开心秀得过瘾，就一定要选对场合和观众，还要讲究一定的技巧。毕竟，“我的朋友克林顿”这种经历，除了莱温斯基之外，要讲得铿锵有力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还是得用中文，若还能做到“不经意提起”，那效果就只能家喻户晓了。

中文传神，两个词就可精确概括关于炫耀的经济学分析：“锦衣夜行”和“穷得瑟”。我穿锦衣的目的，就是给你看，从中获得满足感。我之所以这么得瑟，是因为我穷，但更重要的是，你也穷。

注：本文的逻辑和引用的美国黑人的消费模式，主要来自 2009 年的论文《炫耀性消费和种族》(*Conspicuous Consumption and Race*, QJE), 作者是芝加哥大学的 Kervin Charles 和 Eric Hurst, 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Nicoli Roussanov。

新年空余愿

新年新气象，人人有愿望。满怀憧憬地列个单子：“要好好学习，要提升修养，要坚持锻炼，要……”哎哟，不好意思，这是我去年新年时列的单子，今年的单子是：“一定要好好学习！一定要提升修养！一定要坚持锻炼！一定要……一定不能像去年一样!!!”

新年最美好的事，就是许下注定落空的愿望。然后激情投入，然后坚持不住，然后捶胸顿足。周而复始，人人如此。憧憬意味着自信，太多憧憬意味着过分自信，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发现，“过分自信”是普遍现象。

精明的生意人都懂得利用憧憬和自信的关系，其中的佼佼者就是健身俱乐部。一进俱乐部大门，迎接你的不是宽肩窄臀健步如飞肌肉男，就是盘正条顺身轻如燕阳光女。你看着他们，肥封已久的肌肉中，“憧憬”破油而出。于是你当机立断，于是你要排除万难，我能！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可以每次来健身都交费，来一次

50 块,一个星期来四次是 200,一年就算保守估计来 40 个星期吧,那就是 8000 块。什么? 年费才 3000 还不限次数?! 太划算了! 来张年卡!

结局大家都知道了:你一年下来只去了十次,本来只用花 500 块的事儿,你花了 3000。这多出来的 2500,就是“过分自信”里“过分”的意思。不过你也别太自责,前面说过了,“过分自信”是普遍现象。美国两位经济学家调查了 3 家健身俱乐部的 7000 多名会员,发现那些办了月卡或年卡的人,80% 以上去的次数都不足。这些会员平均每人每年花 1400 美元办卡,而按照他们实际去的次数算,如果按次付费的话,平均能省下 600 美元。也就是说他们花费的钱里,有四成多纯属浪费。美国将近 17000 家健身俱乐部,3300 多万会员,算算看,一年得多花多少冤枉钱? 真是太“过分”了。

当然,你可以说,一开始自己买年卡不是因为太自信了,而恰恰是因为对自己的自制力太不自信了:就是生怕自己坚持不住,所以上来就破釜沉舟,先狠狠地交笔大钱,以后想起钱来肉疼的时候就不偷懒了。虽然最后只去了十次,可要不交那年费的话,可能连这十次都不去呢。这心理和新年愿望一样:新年了,总得雄心壮志一会儿吧。虽然心知肚明自己是三天两头常立志的典型,但不立回长志的话,连开始的激情投入都没了,直接从年末的捶胸顿足进入下一年的捶胸顿足,怎么得了啊。

问题在于,经验已经一次次证明自己是多么不靠谱。新年立宏愿虽然过瘾,来如山崩心潮涌,可过不了几天,总是去如疾风不留

痕,怎么办?

传统文化强调和自己的欲望与懒惰做斗争,怎么斗? 吃苦耐劳。什么十年寒窗美人香,什么学海无涯苦作舟,都是这个路数。又苦又寒不说,还动不动十年无涯的,谁受得了? 历史书里代代相传的励志故事多半都是假的,后人添油加醋般夸大这个“苦”字,不过为给自己屡屡放弃求个心理安慰。任何值得追求的愿望,都需要与之相称的努力,但努力过程不可能从头苦到尾,到最后突然量变质变苦尽甘来。

要让自己的努力见效,最要紧的是习惯的养成。也就是说,在开始努力的阶段,要格外留意。决不能假设自己能如想象般含辛茹苦坚持到底,不可能。所以在开始阶段应格外用心些,设计些方法激励自己坚持一段时间,一旦有了习惯,接下来便简单。

还举健身为例。不要心血来潮对自己痛下杀手一次扔一大笔年费,可以从按次收费开始,省下来的钱可以雇个私人教练,帮助自己十几二十次。一两个月后形成习惯,自己就更容易坚持了。这样做大概比扔笔年费然后浪费掉大多数更划算,也更有效。

因为人有惰性,所以在做事物的开始阶段不仅要尽量获得外界的帮助,还要时不时给自己些奖励。办张健身房年卡,你不会觉得多去一次就会让自己的年卡更划算,在大多数时间里,你都会觉得如果不去的话,就有浪费的负罪感。前者是正面的激励,后者是负面的惩罚;虽然二者其实是一回事,但给人的感觉可大不同。“给自己多点儿甜头”和“让自己少吃些苦头”,能一样么?

美国的研究者做过一个实验,随机抽取一些在校大学生,鼓励他们到健身房健身。怎么鼓励呢?在健身的头四个星期内,如果他们去够八次,就能得到 100 美元。虽然这奖励并不大,而且只给头四个星期,可这小小的奖励却大大有助于习惯的养成。研究发现,相比没有受到奖励的人,这些在头一个月拿到 100 美元的人,在随后几个月内去健身房的概率提高了两倍!而且多出来的这部分去健身房的人,大多是那些本来平时不怎么爱锻炼的人。可见前期的鼓励对习惯的养成有多么重要。

这些道理其实人人都懂,可是因为“过分自信”无处不在,使得我们常常制订很难执行的计划,让本可以实现的目标困难重重。万事开头难,所以不能埋头闭门蛮干,要把最简单的事放在最开始,并多方寻求帮助,借助外力让自己开始得容易些,这是坚持下去的最有效方式。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可惜人还是那个不靠谱的旧人。要想愿望不落空,先易后难您可得放轻松啊。

注:关于在健身房花冤枉钱的现象和分析,来自 2006 年的论文《花钱不健身》(*Paying Not to Go to the Gym*, AER),作者是加州伯克利大学 Stefano DellaVigna 和 Ulrike Malmendier。奖励大学生去健身房的那个实验,来自 2009 年的论文《锻炼的动力》(*Incentives to Exercise*, *Econometrica*),作者是加州圣芭芭拉大学的 Gary Charness 和加州圣地亚哥大学的 Uri Gneezy。

偏以貌取人

人人爱美,所以美貌便有了市场价值,能赚取额外的回报。这回报可以是金钱的,比如时装模特;也可以是非金钱的,比如帅哥美女在择偶时的选择范围更大。就赚取回报而言,相貌和教育水平没有差别,都是个人能力的一部分,至于这能力是天赋还是后天努力获得的,市场并不看重。本来“先天”和“后天”就很难分清,市场关心的是能力本身,不关心能力获得的途径。

相貌与教育,经济规律类似,带来的现象也类似。

现象一:高学历者工资高,容貌出众者工资也高。美貌的高回报不分男女,但女性更为显著。上海的数据显示:美女工资比平均女性水平高10%,而帅哥工资也比平均男性水平高3%。反过来看,丑女工资比平均女性水平低30%,而丑男工资也比平均男性水平低25%。

现象二:高学历既需要先天资质也需要后天投资,美貌也一样。

可不要以为美人都是先天造就一劳永逸的,哪怕素颜朝天也追捧者众。真要如此,时装和化妆品市场早就歇业了。先天不太聪明的人可以后天格外努力学习,所以家教和补习市场庞大;而先天不太好看的人也可以整容,这整容的市场也庞大。根据“美国整形协会”的数据,只 2007 年一年美国人用于整形美容的支出就是 124 亿美元。这一年共有大约 1200 万例各类整形美容手术,其中女性约 1100 万,男性约 100 万。不奇怪,因为相貌的回报对女性更高。

现象三:高学历者要往能提供回报的地方流动,所以集中在大城市,而美女帅哥也集中在大城市,去北京西单和上海南京路瞅一眼就知道了。上海的数据说:美女数量占样本女性的 34%,而帅哥数量占样本男性的 32%。反过来看,丑女和丑男数量只占各自样本的 2%。

类似的现象还有很多,都不难理解。比较难理解的是:美貌的价值究竟何在?学历高的人一般都多少有些高于平均水准的能力,这些能力“有用”,所以能多赚些钱,可“美貌”有什么实际用途呢?

首先当然是因为人们爱美,爱看美人,所以美貌有价值。一本畅销书,一部商业大片,可能内容垃圾,但因为人们爱看,就赚了大钱。“有用”这个概念纯粹主观,所以市场的回报全凭买家的喜恶。姚明怎么能挣那么多钱呢,不就是大家爱看他打篮球吗?可会打篮球有啥用呢?有人爱看就有用,都是主观的。

其次,美貌的回报可不止于“美”本身,帅哥美女们往往在一项很重要的能力上强于常人:他们更加自信,并且擅长和人打交道。

抛开那些我们已经熟知其缺点的好朋友们,想想那些我们曾交往过的陌生的帅哥美女们,是不是这个群体更加自信,举止也更加得体呢?那种让人愉悦的第一印象,很难忘的吧?就算撇开相貌,自信和与人交流的技巧都是非常重要的能力。谁会相信一个不自信的人呢?谁不愿意和举止得体的人交往呢?

美国的研究者发现,就算在那些与外貌完全无关的工作岗位中,比如计算机编程,美貌的人仍然能通过他们的自信和与雇主交流的能力,来赢得雇主的好感,从而提高自己的工资。尽管他们的工作能力并不比相貌平平的人高,可见自信和交流能力的重要。而那些需要和客户频繁交流的岗位中,美貌以及附加的自信和交流能力,就更具有实际价值。所以在所谓的“公关岗位”上,大都是仪表堂堂的人。

就像知识教育一样,自信和交流技巧的培养,也需要漫长的学习过程。聪明的孩子学习得又多又快又好,而美女帅哥们因为从小就格外受欢迎,与不同人群打交道的机会要多得多,所以社交技巧和自信心都磨练得更好。如同知识投资会带来长期回报一样,这种社交技巧和自信的提升,也会带来长期回报。纵然青春易逝红颜易老,可那种“得体”和那种“气场”历久不衰,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些瞅着特别让人舒服的老头儿老太太们,就会知道他们年轻时也一定是美人。

嫉妒心驱使,很多人对美貌者的成功不屑一顾,对美貌者其他方面的能力和特质视而不见,这和对“富二代”的复杂情绪一样,都

是抱怨“天赋”的不公。这情绪走到极端,就是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人群试图摧毁美丽。

漂亮的脸蛋和名校文凭一样,不一定代表背后的能力,但都是很有用很可靠的信号。看到一张名校文凭,我便知道这背后有努力和天赋,这都是潜在的价值;而看到一张漂亮脸蛋,我便知道这背后有更复杂的阅历和更丰富的社交经验,这也是潜在的价值。

所以,如果以名校文凭取人没问题,以貌取人有什么问题呢?

注:关于上海的容貌和收入数据,来自得克萨斯大学经济学家 Daniel Hamermesh 的研究,他研究相貌的经济回报多年,新书《美貌值钱》(*Beauty Pays*)预计将在 2011 年面市。强调美貌,自信,以及交流能力并重的研究,来自 2006 年的论文《为何美貌重要?》(*Why Beauty Matters*, AER),作者是哈佛大学的 Markus Mobius 和 Wesleyan 大学的 Tanya Rosenblat。

博士不值钱

浙大有位年轻的海归博士跳楼自杀了,很不幸,悼念。

有几位朋友来信和我说起这问题,大谈国内的科研体制如何如何,说这位死者生前的工资如何如何低,据说每月只有 2000 元。当然这个工资不代表真实收入水平,我相信他起码在住房方面享受了相当的优惠待遇。但我这里想说的是,这么低的工资是有原因的。

一个人的工资很大程度是由他能为雇主带来的价值决定的。以科研人员为例,学术论文就是他们的产品,可就算是发论文的机器,对中国的大学雇主有多大用呢?系里科研排名上去了,能涨学费么?恐怕不能。能瓜分更多国家的科研基金么?很难,因为这基金分配规则复杂,有很多科研能力之外的因素。国内高薪引进的海归,大多是成了名的人物,这些人本身就已经是资源,能直接为中国的大学带来各种利益。他们本身就是成果,是成品,不像年轻的博士,是生产成果的投入品,价值大不相同。

在这种情况下,刚毕业的年轻博士回国能做什么呢?一来教书,二来继续跟着有资源有钱的人做研究,成为他们团队的一员。但如果功能只是这样的话,给定中国目前的科研发展水平,海龟和土鳖的功能有什么不同呢?对于雇主而言,这两者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中国每年本土新生产的博士数目全球第一,超过 5 万人。此外,还有许多光干活不拿什么钱偶尔也可以上上课的在读硕士和博士们,这么巨大的劳动供给,这么多人竞争那么有限的高校教职,想提高待遇,不现实。

就算撇开不合理的体制不谈,科研人员的收入也要由市场的供求力量决定,中国如此,美国也是如此。

我不算聪明,起码不比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聪明。我的研究依赖于数学和统计学模型,但我的数学水平远不如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可是,我的期望工资会比他们中的大多数高,而且不止高一点,高很多。主要原因是对经济学家的市场需求比一般科学家要大,而经济学博士的供给也要比一般科学家少,所以工资也就更高。

在美国的新毕业博士中,经济学家的平均工资要比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的平均工资至少高 40%,相差两三万美元稀松平常。比如,现在美国一个生物学博士,毕业 5 年内的平均工资大概 45000 美元,而经济学博士相应的工资是 8 万多。这里不止有需求更旺的因素,还有劳动供给的因素。数学物理生物学新博士的真实工资,有十多年没涨过了,因为博士生供给数量大增。

本来二十几年前,美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日子是很好过的。

拿数学家说吧,毕业不用修炼博士后,只有很精英的博士生才选博士后,多训练两年后,大都进入美国最顶尖的大学执教,那时博士后是金字招牌,是学术明星,而且博后期间的报酬也不低。

天有不测风云,中国改革开放了。1985 年开始,大批中国人涌入美国数学系和统计系,于是 1990 年代初期,数学家找工作开始困难,毕业后做博士后的比率翻了一翻,金光闪闪的博士后头衔大大贬值,成了不得已的选择。

屋漏偏逢连夜雨,苏联解体了。1990 年后,涌入美国数学系和物理系的来自东欧的神秘天才们数量增长了 365%。于是到他们毕业的 1990 年代中后期,数学系毕业生更加难找工作,选择博士后岗位的比率再翻一番。两次事件之后,选择博士后的人数从最初的大约 10%到了 1990 年代末的大约 40%。

因为博士后训练不过是一份暂时的工作,所以平均工资要比非博士后的其他岗位低 40%左右,而越来越多的博士使得找工作越来越困难。本来不过是权宜之计的一两年的博士后训练,越拉越长,动辄四五年。所以这些理工科新晋博士们的平均工资水平一头栽落海底三千米处,再也没有反弹起来。今天,博士后收入和相似专业的本科生持平,低于硕士收入。

道理很清楚,给定中国几乎无限量的本土博士和在读博士生,海归博士的竞争对手太多了,给你每月几千块,干不干?不干有的是别人干。海归博士的科研水平可能平均是要高一些,但给定中国目前的科研水平,那高出来的一点没有太大市场价值,折算不成钱。

所以能力归能力,那属于自己;钱归钱,那是市场力量。埋怨怀才不遇没有用,市场不需要的能力,只能留着自娱自乐。

有位浙大的读者给我留言说“市场总是错的”,让人颇觉得不忍。没办法,地球引力把我们的身体留在了地面,而市场的供需力量也不会让我们的工资飞上天。很无奈,但这世界错也罢对也罢,规则不是我们定的。顺着它走,不一定昌;不顺它走,不一定亡。选哪条路,要自己好好合计,收益和代价都要自己担,博士不会赚大钱,理想也不能当饭吃,但也许能给你喝风的勇气和心态,自己选吧。

注:美国博士数量和工资的数据,来自美国每年一度的博士生普查(*Survey of Earned Doctorates*)和每两年一次的理工科博士抽查(*Survey of Doctorate Recipients*)。更多对美国博士后盛行现象和博士工资的分析,参见我 2011 年的工作论文《外国博士的流入对博士后岗位的影响》(*The Influx of Foreign PhDs and the Impact on Postdoctoral Positions*)。

生命价几何

讲三个关于生命价值的小故事。

故事一：十亿人的头疼和一个无辜人的生命

昨天我在微博上做了个小调查，征求下面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十亿人正在轻微头痛，如果杀掉一个无辜的人，所有人头痛立刻停止，否则继续痛五小时。你认为这个人该不该杀？

在我收到的有效答案中，128 人认为“不该杀”，5 人认为“该杀”，不出意料一边倒。

这个问题来自于一位道德哲学家的论文，他用道德哲学的原理和将近 40 页的篇幅用来证明这个人“该杀”，最后宣称这个结论很违背直觉。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道德哲学在“证明”上不是一门很有效率的语言，40 页长篇大论用经济学来表述只需要三句话，而且根本不违

背直觉：如果让人出一块钱来避免五小时的轻微头疼，绝大多数人愿意出；如果让人出一块钱来把自己的死亡概率降低十亿分之一，实验表明绝大多数人不愿意出；所以大多数人认为十亿分之一的人命价值小于五小时的轻微头疼，杀一人来为十亿人止头疼，划算，该杀。证毕。

这个故事的重点在于引发思考：日常生活中，我们一般瞬间就能做出的道德判断是从哪里来的？依据是什么？

这些复杂的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而上述这个例子也和“多数人的暴政”、“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等更现实的口号没有直接的联系。这些口号或修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过是赤裸裸的谎言，和抽象的道德原则无关。在现实中，首要的问题并不在于“牺牲少数人利益保证大多数人利益”是否在道德上有正当性，而在于即使牺牲了少数人的利益也保证不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历史已经提供了无数的证据说明，在此类口号盛行的地方，通常只是先牺牲少数人的利益，然后继续牺牲又一部分少数人的利益，再继续牺牲另一部分少数人的利益……来满足少数人的利益。

故事二：一条陌生人命值多少钱？

2009 年有个电影叫《魔盒》(*The Box*)，卡梅隆·迪亚兹主演的惊悚片，这部片子有个很好的道德小故事。

依照剧情，想象你已结婚并有孩子，家庭基本幸福，但就是有时候手头比较紧张。某一天，来了一个面容非常奇特的人，你怀疑他

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他拿出一箱 100 万美元的现金,再拿出一个盒子,盒子里有一个按钮,说:“只要你按一下这个按钮,你就能得到这 100 万,但这世界上会有一个你完全不知道的陌生人死去。这件事除了你之外没有人会知道。你有 24 小时考虑,你按了我就知道,我会把现金给你;你不按我也知道,我会来拿走这个盒子给下一个我选中的人。反正,你不按总会有人按的。”

接下来的故事不难猜到,一向善良的主人公挣扎很久之后还是按了,然后就是一连串命运的连锁反应。

这是个很精妙的道德故事,如果那怪人直接拖来一个陌生人并递给主人公一把枪,说:“干掉他立刻给你 100 万。”这故事的戏剧性就要大打折扣,主人公得具备杀人狂的素质才会答应。就算他真开了枪,我们普通老百姓观众也没有共鸣。这电影精妙就精妙在:一边是在你需要钱的时候出现的绿花花的 100 万美元,另一边是神不知鬼不觉眼不见心不烦地让一个不痛不痒完全无关的陌生人死掉。

同去看电影的朋友认为这是个困难的问题,问要是换成我的话会怎么做,我说:“那还用问?! 立刻啪地按下去,然后问怪人‘还有什么? 再来几个’。”她大笑。

玩笑归玩笑。但我认真考虑过这问题,答案是我绝不会按。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让我修改一下上面的故事。

某一天,家里来了个面容非常奇特的人,你怀疑他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他没有钱,只拿出一个空盒子,说:“你要往里面放 100 万美元,否则我就去干掉一个你完全不知道的陌生人。”你相信他一定

说到做到,但你没有 100 万,他还很慷慨地表示可以借给你,以后慢慢还,不算利息。你不用考虑 24 小时,二话不说就可以请他走人。

好吧,100 万太多了;50 万? 赶紧滚蛋;1 万? 谢谢您我没空……反正你可以试着往这故事里填个数。我相信不会太高,就算你腰缠万贯,也不会填太高,绝对到不了 100 万。

这两个故事的本质都是 100 万和一条陌生人命的交换,但人的估价却完全不同。为什么呢? 这可能和所谓的“所有者偏见”有关。这偏见的意思是说:一旦你拥有了某项东西,你对它价值的估计就会上涨,所谓敝帚自珍就是这个意思。

在上面的第一个故事中,100 万是别人的,虽然很容易拿到但毕竟还没有拿到,自己不算那 100 万的所有者;而在第二个故事中,钱已经是自己的了,再要拿出去救人可就要肉疼得多了。

故事三:这不是钱的问题。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公认的最犀利的辩论天才。辩论是一项特殊的技巧,不是每个伟大的思考者都能成为伟大的辩手,辩手不仅要想得快,而且要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组织最有效的语言。网络上有很多弗里德曼生前的辩论视频,观后真让人赞叹不已。

一次弗里德曼对大众演讲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的种种长处,演讲完毕后有个年轻人提问,并讲了一个悲惨的故事:一个老人,因为交不起电费和气费,屡次欠费后被停了电和气,因为冬天太冷冻死

在家里。保险公司最后也只赔了几千美元了事。这个年轻人据此来质疑市场的“道德”，谴责那些企业，坚持人命不能用钱衡量。

人命可不可以用钱衡量是个观念问题，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无所谓。但重要的是在思考的过程中，不能前后矛盾，一会儿接受一会儿不接受。

弗里德曼问了这年轻人两个问题。

第一，你为什么首先谴责电力公司而不去谴责这老人的亲戚朋友？谴责他们不借钱给他交水电费？

这是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想象一个流浪儿，饿死街头，恐怕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谴责他的父母和亲人，而不是批评满街的饭馆不肯免费给他口饭吃。为什么在这个老人的例子中就转换了谴责对象呢？

第二，你显然认为几千美元保险赔偿太少，那如果是几十万呢？几百万呢？几亿呢？

面对弗里德曼不停的追问，那个年轻人已经涨红了脸，弗里德曼继续说：“如果你认为几千美元不可接受，但几千万似乎就可以接受，那你就不是在谈论什么人命能不能用钱衡量的原则问题，而是钱多钱少的问题。”

拿钱和命相比，似乎很荒谬。但活命需要耗费资源，而钱也不仅仅是一堆纸，它代表实实在在的资源。所以钱和命的比较，不是一堆纸和人的比较，而是各自背后的资源用途的比较。

举个例子，如果你坚定地认为医院应该花 30 万去救一个重病的

病人,因为“人命无价”,那你应该想想这 30 万也许可以救活 10 个患了点小病只需要些小钱就能医好但不医会死人的病人。如果你又想为什么不能既救这个重病号又救那 10 个其他病人呢,两边兼顾要花 60 万,那我会建议你不救那个重病号而用 60 万去救其他 20 个病人。

资源永远是有限的,而活命需要耗费资源,所以有时候人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取舍。这并不是夸夸其谈和抽象的思辨,更多现实中的例子请见本书《女巫与女婴》一文。

通常人们认为经济学只能算计些小事儿,而这个世界最重要最珍贵的事是不能算计的,比如生命啊爱情啊之类的。我很难接受这观念,因为它的逻辑像是说在买菜时要一分一分精打细算,而在买房时出手豪阔不惜代价。

越重要的事才越要算计得清楚,为节省脑力,还是把“难得糊涂”留给小事儿吧。

注:第一个故事来自 2009 年的新书《大问题》(*The Big Questions*),作者是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 Steven Landsburg。这本书讨论各种传统的哲学问题,但用的是数学、物理学和经济学的推理,所以读者不仅在思考道德哲学时能看到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也可以在思考认识论的时候了解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和海森堡测不准原理。我多年来一直是这个人的读者,这是我所读的他的第四本书,写得都好。

剩女与光棍

剩女大都在大城市，光棍大都在农村，这是中国新的城乡二元化。

实行计划生育之后，男女比例严重失衡。根据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全国 15 岁以上未婚人口中，男人比女人多差不多 3000 万，男女比例大约 3 比 2。严格一夫一妻的数字搭配一下，目前每三个男人就得有一个打光棍。

形势似乎很严峻，但作家冯唐不以为然，在他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给未婚大龄文艺女青年的六个锦囊》开头，他写道：“社会学家的统计说男性比例严重高于女性，这个势头恶化下去，将和贫富分化以及城乡差异一起构成将来社会最大的三个不稳定因素，阴阳不调，男性被憋疯了之后，见他妈杀他妈，见小朋友杀小朋友。环顾周围，我看到的未婚女性远远多于未婚男性。看到的未婚女性多数是好腿好腰好臀好脸蛋好头发好肉身，不上妆，远看近看都好，不喷香

水也有兰花香茶花香茉莉花香,弹古筝,围棋初段,练《九成宫醴泉铭》,喜欢齐白石和陈逸飞和岳敏君,喝花草茶,吃净心莲,听窦唯、齐豫、张悬,上豆瓣,上老罗学校而不是新东方,看《天堂电影院》、《阿拉伯的劳伦斯》、《红蓝白》,看《与无常共处》、《莲花》、伊恩·麦克尤恩、张爱玲。看到的未婚男性基本很少,很少的这几个也是怎么看怎么和美好生活没有关系,刚升 VP 的全副心思想升 MD,刚升正处的全副心思想升副局,挣了几百万的想挣一个亿,挣了一个亿的想到创业板上市产品卖到美国去,一腔驴血,一脸大包,为了祖国和事业,何以家为?”

我想很多生活在大城市的读者的观察也和冯唐类似,都见过不少很美好很能干很有才华却单身的女人。可既然男人比女人多这么多,怎么这些女人就找不到合适的夫婿呢?

因为冯唐生活在大城市,而大城市里女人多。漂亮姑娘大都生活在城市,“大龄剩女”大都生活在城市,“小三”也大都生活在城市。女性涌入城市,不仅因为有更好的就业机会,而且因为那里有更多高教育高收入的男性。所以,中国的男女比例虽然失衡,但城市远比农村平衡。中国城市人口中,未婚男女比例大约 6 比 5;而在农村,这一比例高于 8 比 5。

这样看,城市里的性别比例并没那么失衡。更重要的,女人普遍青睐学历收入胜过自己的男人,而因为城市里女性学历普遍高,所以她们中意的比自己强的男人群体本身就不大。而与学历相比,男人更加青睐女人的相貌,但城市里的美女可不少! 上海的数据显

示：美女数量占样本女性的 34%。

难怪当各路单身女人齐聚城市，争夺“好男人”的战争就惨烈起来。“好男人”们选择一多，眼神可就游移开了，有人一直单着在花丛里晃着，有人找漂亮女人当老婆，有人去包个漂亮二奶。而剩下的男人们还入不了高学历单身女人们的法眼，可不就只能单着了嘛。

城市里的单身女人金龟婿难求，而乡村里的单身男人想讨个老婆，恐怕更加困难。

青年女性流动到城市去，留下的是乡村中同龄男青年的无奈。于是陶喆唱：“一个小镇的姑娘到了大城市，你一定听过这故事。”美国乡村小青年也无奈，于是一曲《好莱坞不是美国》就红了：“哥哥我想你啊，穿上咱的牛仔裤回家吧妹子，好莱坞那可不是人呆的地儿啊。”^①对农村单身男青年而言，城里人不止抢了他们的地，还抢了他们的妹子，这怎么忍？！社会学家黄平说：“你要是把喜儿都霸占了，那大春儿可就要参军了。”

婚姻能稳定社会秩序，而单身男青年是犯罪率最高的群体。汉语中，“光棍”这词一直和“地痞”、“流氓”等词联系在一起。当男女比例严重失衡打光棍的人增多之后，犯罪率也会随之上升。计划生育之后，中国的犯罪率翻了一番。这增加的犯罪率中，有大约 14%

① “So long, put your blue jeans back on, go home. Remember, Hollywood is not America.”

应归咎于男女比例失衡。当然,男人天生比女人容易犯罪,男人多了犯罪率自然高,不一定是因为这些男人找不到老婆。可研究显示,这些增加的犯罪率确实更多来自未婚男人。

犯罪率高还不是娶不上老婆的全部恶果。就算不铤而走险犯罪,那娶老婆也得攒钱啊,没钱怎么办?下矿呗。研究显示,在中国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地区,只有儿子的家庭更有可能从事危险的工作,比如父亲或儿子下矿。而同一地区的只有女儿的家庭,则没有这种倾向。中国采矿业的风险之高举世闻名,所以我们不难想象因为没钱娶妻而造成的其他人间悲剧。电影《盲井》描述了两个矿工,专门诱骗单身出门打工的青年,带他去煤矿打工,并向矿主谎称这青年是自己的亲戚,一段时间之后在矿井中杀死该青年,然后借口煤矿事故向矿主骗取封口费。而他们所赚的钱,也不过是省吃俭用地寄回家中,培养儿子上学,寄望将来能离开农村脱贫。

婚姻是头等大事,男女比例失衡让这场婚配的战斗打得更加激烈。男多女少,女性就更加珍贵,男人就要付更大的代价才能娶到老婆,许多婚嫁习俗也会随之改变。1949年,国民党败退,60万士兵加50万平民登陆台湾,其中的男女比例是4:1。跟着两岸隔绝,台湾岛上的男女比例从1:1迅速跳升至1.2:1;而20到24岁人口中,男女比例从低于1:1飙升至1.5:1。于是,相对于女方支付的嫁妆,男方支付的彩礼价值激增。

这男女比例似乎抽象,但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今天很多侨居美国的华人留学生夫妇,妻子都不愿丈夫频繁回中国出差,因为那

里年轻漂亮的姑娘大把。但话得分两头说,一直以来,在美国的中国姑娘紧俏,所以女方要是先于男方出国,留守中国的那男人最后也多半只会落得望洋兴叹落落寡欢。

竞争的力量,哪管你男女呢?

注:关于男女性别失衡而增加单身男性犯罪率的研究,来自2007年的论文《性别比例与犯罪:中国计划生育的例证》(*Sex Ratios and Crime: Evidence from China's One-Child Policy*, IZA Working Paper),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Lena Edlund,清华大学的李宏彬,香港中文大学的易君健和张俊森。关于男女比例失衡增加工作危险性的研究,来自2009年未发表的论文《经济增长的性别基础:中国的例证》(*The Sexu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魏尚进和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IFPRI)的张晓波。关于台湾地区男女比例对嫁妆彩礼的影响的材料,来自即将发表的论文《性别与红龙:国共内战后台湾性别比对妇孺的影响》(*Sex Ratios and the Red Dragon: Us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to Explore the Sex Ratio on Women and Children in Taiwan*, J Population E)。作者艾默里大学的Andrew Francis。

又帅又有钱

在“百度”中搜索“又帅又有钱”，瞬间便有接近 200 万个结果；在 GOOGLE 中用英文搜索同样字样“rich and handsome”，也瞬间便有 1300 万个结果。可见，不分中外，“又帅又有钱”都很受欢迎。从生物学遗传的角度看，“帅”代表基因优良，“有钱”代表能在女性养育后代的过程中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更舒适的环境，谁不喜欢这种好事儿呢？

哪个男人不想又帅又有钱？可造化弄人，二者居其一已经算幸运儿，两者都沾，那简直想都不敢想。如果只能二选一，或者是月薪三千的帅哥，或者是年入百万的中年大肚秃顶麻子脸男，男人们，你们觉得女人更喜欢哪个呢？

生活的现实和观察，让我们无法看好那帅哥。平常人可能据此认为女人就爱钱，可在经济学家眼中，这“年入百万”和“月薪三千”的差距，恰恰表明的是在女人眼中“帅”的价值。因为如果女人就爱

钱的话,那一个月入四千的中年大肚秃顶麻子脸男就能打败一个月薪三千的帅哥,这显然不是事实。换句话说,“帅”非常重要,非常值钱,丑男要打败帅哥,收入要高出不止一点半点。但反过来讲,在吸引男人的竞争中,年入百万的丑女想击败月入三千甚至没有收入的美女,几率却极小。

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们最近利用交友网站所做的实验说明了这一点。当男人选陌生女人做约会对象时,当其他条件一样只是相貌和收入有别时,就算把丑女的收入调高很多,男人都依然会选收入低的美女;而当女人选男人时,丑男的年收入若比帅哥的年收入高很多,女人便会从帅哥转向丑男,可见要女人们放弃“帅哥”,需要给她们很大的经济补偿。

以上实验说明,“帅”对男人的价值不小,而“美”对女人的价值就更大。化妆品和整容市场的规模都是天文数字,顾客群 90%以上都是女性,这还不算她们花在服装和首饰上的钱。

当然了,谈钱伤感情。“年入百万”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还传递了更多的信息,比如这男人的能力和事业心,等等。其次,帅不帅是个主观判断,一个丑男,如果他很穷,那他在女人眼里就真是个丑男,可如果他年入百万,那他的样子,恐怕也会变得顺眼。

虽然“又帅又有钱”听起来是梦幻搭配,但日常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女人们其实对这一类型的男人不是特别感冒,而且非常有戒心。“帅哥都没良心”,再加上有钱,那简直可以肯定是花花公子了。这样的男人,不要也罢。而且,男人嘛,又不是女人,长相不重要,只

要别太丑,过得去就行了。

所以,就吸引女人而言,实际上最顶尖的搭配不是“又帅又有钱”,而是“有钱但相貌平平”,最近的实验证实了这一点。

英国的研究者在上百位在校女大学生中做了一个实验:给她们看一些男人的资料和照片,让她们评分,看看哪些最适合做长期伴侣。这些男人的相貌大致可分为“帅”、“平平”和“丑”,而职业和收入也可分为高中低三档。不奇怪,不管是相貌和职业,档次越高的男人得分越高。但得分最高的组合并不是“又帅又有钱”,而恰恰是“有钱但相貌平平”。这就证实了女人对“又帅又有钱”的男人确实有戒心,认为他们花心,不适合做长期伴侣。毕竟,如果不能据为己有,那无论是帅还是钱,都不重要。

读到这里,可能女性读者要不满意了,什么钱啊帅啊的,谁那么肤浅啊,“爱”才是最重要的嘛。当然,男女配对过程,复杂而精细。外貌智商情商财商人品都重要,是多方面的平衡和取舍。然而,外貌和收入是很有效的“第一眼”评价标准:好看的就是比难看的看着舒服,钱多的就是比钱少的能买更多东西,容易观测容易比较容易评判。而如果这第一眼印象好的话,获得女性青睐的概率就要大得多,得到“真爱”的机会也就大得多。缘分虽玄妙,可也不是不可预测的随机发生的奇迹。一个长相奇丑的乞丐,就算是个情圣,女人们也不会去多看他一眼,缘分肯定不会眷顾他,他又哪来的机会去“爱”呢?

对大多数人而言,相貌和收入不可兼得,且两者之间的取舍往

往冲突激烈,所以电视速配节目,比如《非诚勿扰》,就很容易吸引眼球。这类节目要好看,大致有两个规律:第一,如果是女选男,那上场的男选手收入水平要拉得很开,帅哥没钱,有钱得生得丑,要是弄上来又帅又有钱的,就没啥悬念了;第二,如果是男选女,那上场的女选手相貌都高于平均水准,因为长得难看的根本就没有机会,至于收入水平,不太重要,可大可小。

什么叫非诚勿扰? 答案是郎财女貌。

注:用交友网站估计男女对相貌和收入评价的不同,来自 2010 年未发表的论文《为什么点鼠标:网络约会中的选择偏好》(*What Makes You Click? Mate Preferences in Online Dating*),作者是芝加哥大学的 Gunter Hitsch 和 Ali Hortacsu,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 Dan Ariely。英国女大学生评价男人相貌和收入的实验,来自 2007 年的论文《好的不“现实”——富有对帅哥不利》(*Too Good to Be “True”? The Handicap of High Socio-economic Status in Attractive Mal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作者是利物浦大学的 Romy Hardaker 和 John Lycett,以及中央兰开夏大学的 Simon Chu。

一夫一妻制

一夫一妻制，并非天经地义。首先，它不是古来有之，相反，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一夫多妻才是常态。其次，就算今天，一夫一妻制也远远算不上是普世现象。研究者调查了 1962 年到 1980 年的 1170 个社会，其中存在一夫多妻现象的社会数目是 850 个，大多集中在亚洲和非洲。就算在美国，也有 3 万到 5 万的“非主流”摩门教徒过着一夫多妻的生活。

为什么有的社会是一夫一妻制，而有的社会是一夫多妻制呢？

传统上对一夫多妻制成因的解释是男性财产的不平等。毕竟，妻妾成群是和大户人家联系在一起的，穷人家养不起好几个老婆。但话说回来，古代人毕竟财富有限，不会出现比尔·盖茨，而现代社会比如美国和中国，男人中的财富不平等程度可能还超过古代，怎么就不一夫多妻了呢？

所以，光看男人间的差异，解释不了婚姻制度的差别，另一半的

解释得看女人间的差异。在古代社会,除了长相,其实女人都大同小异,基本都没文化也没收入,女人的职能也都差不多,就是生育后代。而现代社会则不同,女性有了发展自己的机会后,那真是千差万别五彩缤纷个个不同,女性之间的差异远远超过了古代。

男性财富的差异,再加上女性能力的差异,就可以解释一夫一妻制的兴起。

婚姻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养育后代,而养育后代需要资源,要培育高质量的后代,需要耗费更多的资源。而每家每户父母的时间精力金钱都有限,所以在养育孩子这件事儿上,质量和数量不可兼得。这很好理解,养一个孩子并送入上大学比养了五个孩子个个都送入大学,要容易得多。孩子要是一多,那其中某些孩子的发展机会可能就不得不被牺牲掉了。

一般而言,为养育后代提供经济资源的是父亲,而世上有钱的男人大致分两种,一种是靠个人能力和自己奋斗起家的,这种人在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是主流;另一种是靠继承遗产或坐拥大批自然资源发家的,前者比如中国古代大户人家的富二代富三代官二代官三代们,后者比如生在石油井边儿的人们。我们不妨叫第一种人为“能力富男”,后一种人叫“无能富男”。

但孩子的质量不仅取决于父母的财力,还取决于父母的能力。与“能力富男”相比,“无能富男”培养高质量后代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更高,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培养,老培养不好。这就好比书香门第的后代和地主老财家后代的区别,前者家学渊博能诗善文,后者欺男

霸女鱼肉乡里。因为培养质量的代价高,那对质量的需求就低,所以“无能富男”对后代子女的质量也就不太重视。这里的不太重视是相对“能力富男”而言,而不是相对穷人而言。毕竟“无能富男”也还是有钱人,有能力送孩子上学,这点上比干脆上不起学的穷人还是要强。

因为对子女的教育质量不重视,那往前再推一步,也就对孩子他娘的质量和能力的重视了。连富男都不太重视女人的质量和能力,那穷男就更别提了。所以,在“无能富男”居多的社会,对女性质量和能力的需求,比较低。

又因为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之间存在替代关系,所以当“无能富男”们对后代金榜题名不抱大希望的时候,人丁兴旺就成了追求的首要目标。传宗接代嘛,香火越旺越好!那怎么才能多生孩儿呢?就多来几个孩儿他娘呗!

再进一步,这社会对女性最主要的需求就是让她们传宗接代,而对她们能力和质量几乎没有要求。而从生理上讲,就生孩子的数量而言,女人都差不多!既然都差不多,那竞争可就激烈了,价格也就自然降了下来。娶个有文化的大家闺秀不容易,但多娶几个水灵点儿的能生养的丫头还不容易!既然丫头多了去了,那也就不需要给丫头家很多彩礼了。

“无能富男”对孩子数量而非质量有更高需求,而就生孩子的数目论,女人又都因为差不多而竞争激烈价格偏低,所以一夫多妻三妻四妾在“无能富男”居多的社会中就流行开了。

我们用上述的推理来反观“能力富男”。他们因为有知识有技巧，养育高质量后代的代价相对低，自然对后代质量的需求就高，也因此更重视孩儿他娘的质量。这种对女性质量的需求抬高了女性质量的价格，也就刺激了相应的供给，所以“能力富男”居多的社会，对女人的教育水平也就更加重视。记得 2009 年有一部获了很多大奖的英国影片《成长教育》(*An Education*)，讲英国 1960 年代的一个普通人家，费尽心机勒紧裤腰带要把女儿送入牛津大学，目的就是在那里结识“能力富男”。

虽然在生育孩子的数量上，女人都差不多。但在教育孩子的能力上，那差别可就大了。因为“能力富男”们对女人质量的需求高，女人质量的价格就因此上涨。女人质量的价格涨上去了，富男们也就没有足够的资源同时供养好几个有质量的老婆了。因为重视质量大过数量，所以“能力富男”们会把钱集中在一个高质量的老婆身上，而不是选择多个“都差不多”的低质量老婆。“能力富男”集中财力娶一个高质量老婆，穷男们反正也只能负担一个低质量老婆，一夫一妻制就这么出现了。

对一夫一妻制这一重要的人类社会制度，以上这个故事从生物遗传和经济资源的角度给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解释，很有启发。然而这理论只解释了一夫一妻制的原因，它可没说一夫一妻和一夫多妻哪个更“好”！

我曾在课堂上问学生：“你们认为，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哪个更能保护女性？”有个黑人同学答一夫多妻制，我问原因，他说

因为几个老婆联合在一起,更容易抵挡丈夫的暴力行为!

这个观点很新颖,我事先可没这么想过。我当时想的是这样一个现象:一夫多妻制社会中是包含一夫一妻制的,你可以选择多娶几个老婆,也可以选择只娶一个;而在一夫一妻的社会中,一夫多妻往往是违法的。也就是说,在一夫多妻制的社会中,女性可以选择几个人嫁同一个人,也可以选择只嫁一个人;但在一夫一妻制的社会中,只能选择嫁一个人。那么,显然对女性的选择而言,一夫多妻制更优,因为选择更多!

举个逻辑上极端的例子,一个社会只有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一个男人巨富一个男人巨穷,而两个女人都想嫁给富人过好日子。在一夫多妻制下她们就可以这么做,而在一夫一妻制下,其中一人就不得不跟那个穷鬼过苦日子。谁说一夫一妻对女人有好处?!

当然,上述故事预设了女性可以自主选择夫婿。而在一夫多妻制盛行的社会中,女性大多没有自主权,嫁人都是父母兄长说了算。所以我们的文化中有不少挣破封建枷锁歌颂自由恋爱的传说。可话说回来,传说就是传说,意思是这种事儿只是偶然发生,不常见。父母和兄长可能对女儿和妹子的幸福漠不关心,但算钱可从来不会算错,所以就算把女儿和妹子卖了做妾,肯定也都是卖在了付得起钱的家庭。我不是古代女子,不知道她们更愿意给大户人家做妾,过吃饱穿暖的体面日子,还是更愿意嫁给穷小子钻窑洞受风寒。反正在现代社会,“二奶”是很流行的现象。

回到上文那个极端的两男两女的例子,很显然,在男性财富分

配不公的社会中，“一夫多妻制”最大的受害者是没钱的单身男性。阿 Q 要想和吴妈困觉，恐怕就不得不冒险去革命了。

一夫一妻制只是法律制度，是纸面上的管制，管不了背后的经济规律：城里的有钱人包二奶，乡下的年轻人便打光棍；不能同时和好几个人结婚，那就多离几次婚；或者干脆不结婚，交完一个朋友再换一个朋友。仔细想想这些事儿，哪一桩不是经济学呢？

注：文中关于一夫一妻制兴起的“能力富男”与“无能富男”故事，来自 2008 年的论文《神秘的一夫一妻制》(*The Mystery of Monogamy*, AER)，作者是以色列希伯莱大学的 Eric Gould, Omer Moav 和 Ami Simhon。关于文章开始时一夫多妻制的种种数据和后文对一夫一妻减少女性选择的分析，来自 Big Think 网站的一篇文章，该文总结了这一领域的几项研究并给出了参考文献，文章名字叫《一夫多妻是女权主义者》(*Polygamy is Feminist*)。

善心与市场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爱心与慈善活动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普通人也常常在自然灾害时帮助灾区百姓。但慈善捐款本质上是一手收钱一手花钱，都是经济活动。如何收钱和如何花钱，是经济学关心的话题。

先从花钱开始吧，毕竟，做慈善最重要的一环是花钱，要把钱花得有效率，真正用在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最紧迫的需求上。汶川地震救灾中，中国最大的慈善机构红十字会暴露出了不少问题，这并不奇怪，美国“9·11”期间，美国红十字会的表现也让观者大跌眼镜。大灾面前，捐助款项往往一夜之间涌入，数额过亿，而救灾刻不容缓，把钱花得既快又有效率，不容易。

怎么叫花钱花得有“效率”呢？灾民需要水和方便面，而你给送去牛仔裤，这肯定不叫有效率。但效率的含义不仅限于此，要理解大型的救灾机构，比如全世界的红十字会为何效率低下，就必须先

理解效率这个概念。

有效率地花钱,当然首先必须满足灾民的需要,这不难理解。大救灾机构虽然人力物力充沛,似乎能满足灾民的多种需求,但这并不足以说明它们更有效率,灾民不需要的东西,送得越多浪费越严重。

那么满足了需要就算有效率了么?当然不是,还要考虑成本。比如一个大善人花了一个亿为孩子们建了所小学。满足大家需要了么?满足了。有效率么?没有。因为如果大善人把这钱直接捐给村民,村民不会盖一座价值一亿防震十级外带豪华装修的小学,而会选择盖个一千万的坚固安全窗明几净的小学,然后把九千万盖成同样坚固安全窗明几净的民居。

换句话说,要让钱花得有效率,不仅要有收集分析各类灾民需求信息的能力,而且要把花钱的成本降下来。花一万块钱买一顶帐篷外加采购人员吃回扣,那不叫效率,叫腐败。收一万块善款,送到灾民手里只有两千,剩下八千是自己的管理费用,那也不叫效率,叫欺诈。

这些话并非纸上谈兵。实际上,大型慈善机构比如红十字会在采购救灾物资、收集救灾所需情报、快速把救灾物资发放到所需要的人手中等等这些方面,表现一向无能,行动一向迟缓,结果一向浪费,这是世界性的问题。早在1940年代,就有欧洲学者指出并批评了红十字会组织存在的“无效和浪费”。但直到近二十年来,由于媒体的不断介入和大规模的信息传播,这一问题才广受关注。路透社2003年的一篇报道说,1991年的孟加拉大地震,国际红十字会救灾

物资中的 95% 最后都因为没用而不得不处理掉了, 注意这数字: 95%! 吸取这教训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 2001 年印度的 Gujarat 大地震中, 这数字降低到了 5%。

除了采购来的物资浪费严重, 采购这些物资花了多少钱, 那更是一笔算不清的烂账。别忘了, 救灾机构花的钱都是善款, 不是自己的钱花得从来不心疼是古今中外的铁律, 再加上救灾心切, 一百块钱买瓶矿泉水也不是不可能的。实际上, 如果采购环节不透明不规范, 采购人员吃回扣和所采购物资高价劣质是必然结果。考虑到救灾物资中很多都是用于救命的食品和药品, 可能的恶果让人不寒而栗。

在全世界一系列改革慈善机构采购环节的措施中, 弗雷泽组织 (Fritz Institute) 开发的“人道后勤系统”贡献很大。这套系统把现代商业机构的后勤采购方式按照慈善组织的需要进行了改进, 对常用救灾物资的采购和供应建立了数据库, 数据包括各主要供货商的报价, 历史价格和一系列供货合同模板。这系统还有一项广受争议也是中国老百姓很关注的功能——允许捐款者追踪自己捐献资金的使用。

如果所有的人都只能把钱捐给一个机构, 比如红十字会, 而这机构从来花钱不透明不公开, 迷雾重重, 那久而久之, 这机构的声誉就有了问题, 人们就会慢慢丧失对它的信任。2001 年的“9·11”事件后, 涌入美国各地红十字会组织的捐赠款项达十亿美元, 但其下属“自由基金”账目上的第一时间花费的价值几何呢? 不过三十三万六千美元(美国政府为红十字会第一时间提供的医疗救护、救火

等人工的补偿)！和汶川地震期间的中国红十字会一样，当年美国各地的红十字会也纷纷把救灾款项截留做本地红十字慈善预备资金。美国红十字会在救援过程中表现出的无能让美国百姓大失所望。从那之后，这机构的人气一直下滑，收到的捐赠数目也一路缩水。在“9·11”之后的一系列调查中，美国红十字会当时的会长兼CEO Bernadine Healy 下台。

谁的钱都是血汗钱，不是风刮来的，大家捐款是为了救人，如果中间的环节有问题，谁还愿意捐款呢？谁愿意让救急的钱下落不明呢？面对一个不透明的中国红十字会，在历次救灾中大陆的富豪们表现得总是不够慷慨，在我看来便有情可原。一来他们江湖阅历更为丰富判断更为精准，加上消息来源广泛，知道钱捐出去不一定到了谁手里。二来动辄与慈善事业打交道，被宰的次数多了自然就学乖了。在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帮助到别人的情况下，花的那些真金白银，不过是迫于压力在公众面前摆个姿态，既然不过是个姿态，少捐点儿意思意思就差不多了。

再说，富豪捐钱，都不是小数目，扔地上都要砸个坑的，自然要小心些，起码要听个响儿，不能填了无底洞。一个完善的慈善市场，不仅要提高慈善机构的透明度，让捐钱的人知道自己的钱花在了有用的地方，心里踏实，而且要为捐款者提供更多实实在在的好处，让他们觉得物有所值，以后才能多捐些。在美国，慈善捐款可以免税。正常而言，富人们面临的收入税率很高，比方说 50% 吧，那如果我多挣一块，不做慈善就要交税，所以最后拿到自己手里的只有

五毛。那如果我想给自己买一条 50 块钱的牛仔裤,我就得挣 100 块才够,因为有 50 块要上交所得税。但如果我想给别的穷人买一条 50 块钱的牛仔裤,那我挣 50 块然后捐出去就够了。也就是说,因为做慈善可以免税,所以做慈善与其他消费相比更加“物有所值”,自然,慈善活动频繁。再比如,开个慈善晚会曝曝光,给草民们欣赏羡慕一下,捐个楼上面写个名字让大家看看,这些活动都会增加慈善给慈善家们带来的价值,所以应该而且必须鼓励这些活动。吸引捐款和招商引资类似,都要讲策略。美国所有有钱的大学在吸引社会捐赠方面都有专业的团队,策略是一套完整的系统,从传媒到心理,都是全方位的渗透。

世界首富也是世界首善的巴菲特在把毕生财富都捐出来做慈善之后说:“比起挣钱来,花钱可要难太多了。”如果一个机构钱财管理乱七八糟,我凭什么找它去献爱心呢,难道仅仅因为它是“官方指定机构”?

所以我捐款,但从不捐给花钱不透明的机构。我也肯定成不了佛教徒,因为我不能接受如下事实:我在家日日拜佛诵经,每日香火数十元;可当我路经某名山古刹,进去想诵经拜佛敬献高香一炷,和尚师傅便说收费三千。我弱弱地问:“小师傅,无论在家还是在寺庙在下心诚程度都是一样的,菩萨都应该听的见,怎生收费如此之高?”师傅宝相庄严横眉冷对:“此处有古刹一座,金身大佛,佛家子弟众多,佛光普照,岂是汝家搪瓷菩萨可比。三千就三千,有开光礼品赠送,绝不还价!请施主自便!”唉,还是绕开走吧。

血头红十字

美国红十字会的最主要职能是什么？不是慈善救济，而是采血卖血。

要理解一个机构的主要职能不能看广告，不能信宗旨，不能听宣传，而要看这机构把主要的资源都用在了什么地方。如果这机构花费的每一块钱里有六毛用于采血卖血，只有一毛用于赈灾救援，我就会把“采血卖血”而不是“赈灾救援”当成这机构的主要职能，尽管红十字的宪章中只字未提“采血卖血”。

1988 年是美国红十字会成立的第 107 个年头，当年红十字会所有的开销中 59% 用于采血卖血，只有不到 10% 用于灾害救援；1995 年，这数字分别是 62% 和 13%。2007 年，它 30 亿美元的年收入中，一半儿来自血液部门。

上市公司若想发行股票来筹集资金，需要严格公开财务情况，对股民有个交代；美国红十字会主要业务是采血卖血，从献血者中

采集血液并将之卖给需要的医院或军方,但很多献血者却对这一业务一无所知。朋友们,你说奇不奇?

医疗服务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作为医院主要投入品之一的“血液”自然也拥有一个巨大的市场。上网搜索关于血液市场的资料,会发现各种研究机构的大量研究报告,篇幅宏大,定价常常数千美元,可见这血液市场规模之大。实际上,美国红十字会 1988 年的收益是九亿八千五百万美元,如果把这数字用到同年的“财富 500 强”中,可排第 339 位,而它的“血液部”同年的收益便是五亿三千五百万,在“财富 500 强”中也可排到 447 位,是当之无愧的巨无霸级别的血头。

就采血过程而言,研究表明义务献血比卖血要好,因为前者的血液通常更干净。虽然献血是义务的,但红十字会从义务献血者手中采集的血液可不是“义务”交给有需求的医院的,这里头是买卖关系。

“血液”是一项稀缺资源,需要一定的手段来分配。我信奉市场的力量,所以“卖血”——用价格手段调配血液到医院——对我而言没有大问题。有问题的是红十字会卖血卖成了垄断机构,成了血液市场上头号巨人,并屡出奇招打压其他竞争者。

和其他的血库一样,红十字会也标榜自己是非营利组织,其血液的价格仅仅弥补了其成本——50%的人工费,25%的处理和检测费用(新鲜血液采集后并不能立即投入使用,需要经过检测和一定的医学处理),其他是所谓的管理开支。您可别小瞧“非营利机构”

这个头衔，这可是强大的武器，一可用来宣传，二可用来游说联邦政府的免税待遇，这后者尤其非同小可数额巨大。当红十字会在血液供应市场上越做越大，行为也越来越像垄断者之后，反垄断官司就不断找上门来，连法官们也不禁感慨：“这‘非营利’和‘营利’组织的界限可是越来越模糊了。”

让我再具体一点。

“血液”是个整体的概念，学名“全血”，按容量计，这里头 45% 是红血球、白血球和血小板，约 55% 是血浆。对血液的需求绝大部分是对红血球的需求，对血浆的需求较少，虽然后者在“全血”中占的比重很大。

在美国“全血市场”的供应链条上，美国红十字会占了 45% 的份额，美洲血液中心(Blood Centers of America)也占了 45%，但这后者其实是很多独立血库的联合体，类似石油欧佩克，绑在一起才能有力量和红十字会抗衡；最后的 10% 来自医院和军方的献血中心。

1997 年，一家名叫 VITEX 的公司发明了一项技术，可以“杀死”血浆中的艾滋和乙肝病毒，从而产出“无病菌血浆”（又称 SD PLASMA），这项技术立刻被美国红十字会买断了在北美的使用权。与普通血浆相比，这种血浆价格要贵上一倍，但随着这种血浆的问世，谁还再需要普通血浆？所以红十字会迅速垄断了北美血浆市场。

说过了，血液市场的主力军是“红血球市场”而不是“血浆市场”，出于对专利的保护，“血浆市场”上由技术造成的垄断并没有造

成太大的争议。有争议的是,红十字会会不会滥用自己在“血浆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将其市场势力扩张到“红血球市场”? 读者须知,这两种产品可是典型地放在一起联合生产的,而且很多时候是联合出售,所以借助血浆市场的垄断达成红血球市场的垄断,并不是难事。

1998年5月,在美国政府和美洲血液中心的推动下,美国司法部开始对红十字会进行反垄断调查。不久,五角大楼介入,因为军方特别想获得这种技术,但无奈被红十字会垄断掉了。过了不久,这调查便不了了之,原因是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技术,同样可以生产“无病菌血浆”,红十字会的“短期垄断”被打破了。但故事远没有完,现在 VITEX 对消灭红血球中病原体的技术已经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红十字会作为血液市场的巨头一直在盯着这技术。可能用不了多久,新一轮大型的反垄断诉讼又要开始了。

说到军方,讲个插曲。美国红十字会的领导者是位高权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而军方作为血液的巨大买家,一直是红十字会力求争夺的大客户。1990年代,当时的红十字会的领导者(Elizabeth Dole)就一直想借助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而让红十字会变成军方血液需求的唯一供应商,但最终未果,军方坚持血液需求应对整个市场开放。

美国红十字会作为一个庞大机构,角色是多重的。但它最大的角色是血液市场的巨头。从收入和支出数目以及比例看,与采血卖血相比,灾害救援远远不是红十字会的主要职责。这样庞大的采血

机构,一旦工作有疏漏,后果不堪设想。有本书叫做《坏血:美国红十字的危机》(*Bad Blood: Crisis in the American Red Cross*),说的便是红十字会由于管理疏漏,“脏血”流入市场的惨痛教训。此外,互联网上有一份写于 1987 年的极其详尽的报告《血液掮客》(*The Blood Brokers*),分五章,详尽记录了美国红十字会如何从从事“灾难和各类救援”一步步变成了血液市场上的巨头,非常值得一读。

注:本文写于 2008 年汶川赈灾期间,当时写作时收集的各种数据和资料今日已遗失,故无法列举,请读者见谅。对“反垄断”的经济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北京大学薛兆丰的著作《商业无边界》。

无知与仇恨

“仇恨”是非常普遍的人类情绪，相关的研究无数。我要简单地解释两件事：第一，仇恨是怎么传播的；第二，为什么某些特定群体特别容易招人恨？这些群体可以包括日本人、警察、城管，也可以包括医生、经济学家、富人，等等。

仇恨是怎么传播的呢？很简单，有人需求有人供给，一拍即合。

仇恨听起来是个坏东西，为什么会有人需要它有人提供它呢？通常来说，“仇恨的供给者”都是为了损害“被仇恨者”的利益，为达到这目的通常需要使用宣传攻势，煽动仇恨是其中之一。中国仇日的、海外反华的、中东和美国死磕的，都是这路数，大家都熟悉得很，毋需多言。相对不太好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人“需要仇恨”？心理学家认为，仇恨别人的人通常认为“自己正在受到侵害”，比如大屠杀的执行者们通常认为自己也是不公正和虐待的受害者，而“流氓、打老婆的人、暴君，以及其他有暴力倾向的人大都认为他们被别人鄙

视或侵害了”。现代心理学在分析“仇恨”时也强调“受威胁的自我”的作用，“当某人心中最喜欢的关于自我形象被别人质疑或打击之后，暴力就产生了”。

经济学家一般不关心人们的欲望或需求是怎么产生的，只关心它们是如何被实现的。就像我虽然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想吸毒，但这不妨碍我分析毒品市场的行为。仇恨产生的心理原因对经济分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仇恨的“买家”和“卖家”是如何一拍即合的。

贩卖美丽的人需要一系列载体，比如化妆品和时装；而贩卖仇恨的人也一样需要载体，这载体通常是一系列能引发敌对情绪的故事。至于这故事是真是假可能对有些人是重要的，但对仇恨传播本身而言是不太重要的。纳粹为了灭绝犹太人，编了无数荒谬绝伦的故事，这些显然的荒谬根本不妨碍仇恨的传播。

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宣扬仇恨的故事要卖得好要受众多，就需要降低自己的价格。如果人们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和代价才能了解那些宣传仇恨的故事，那它肯定不是传播仇恨的好工具。相反的，如果人们一打开报纸电视收音机电脑，满眼就都是这仇恨的故事，那它就具备了好载体的潜质。

这里说“具备了好载体的潜质”，是因为仅仅“绝对价格低”还不够，影响人行为的还有“相对价格”。苹果一块钱十个，够便宜了吧？但如果香蕉一块钱一车，那苹果的市场需求可能依然不旺，因为香蕉和苹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相取代，所以大家可以消费更便宜的

香蕉,而不是其实也很便宜的苹果。

那什么是可以和“传播仇恨的故事”相互替代的产品呢?是对事件的全方位报道和了解,不妨称之为“真相”。那些仇恨的故事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关键是我们不知情。而这“无知”才是传播仇恨的真正温床。

光有“真相”还不够,这“真相”还必须传播得足够广,才有机会打败“仇恨故事”。那是说要有一种机制把获取“真相”的成本降下来,不能让大家千方百计狗急跳墙才能知道。甚至必须要把这获知真相的成本降得很低,低到几乎免费提供才能起作用,因为普通人根本没有追求真相的动机。相反,一个情节曲折高潮迭起的虚构故事要容易贩卖得多。因为缺乏追求真相的动机,而且“真相”与“故事”相比总是比较“昂贵”(需要收集更多信息,需要更多的分析和判断,等等),所以如果“真相”的卖家(本应该是新闻媒体)效率低下不能把真相快捷方便地送到消费者眼前,那市场上盛行的就自然全是“故事”了。

很多时候,一些谣言或虚构故事的传播都是由离事件中心不远的当地人开始,这些人比外地人收集信息的成本要低很多,起码他们有条件去和相关人士四处打听。但“低成本”不代表没有成本,而且他们凭什么去打听呢?四处打听收集各种信息获得事件全景的收益在哪里?没有动机啊!所以,当地人口口相传甚至竞相行动,并不能佐证他们中流传的那个版本的故事就是真相,也并不代表他们比其他人知道更多。

我家乡所在的小镇，2007 年夏天发生了一起与警察有关的命案。天天有人讨论，全镇人都知道，但我听说的版本天天人人都有不同，甚至我所认识的两个警察，他俩的表述都各自不同。我拼凑出所有的信息也没有组成一个前后特别一致的场景，却形成了好几个版本的非常刺激的故事，而街上流传的故事，也正是这几个版本。没人知道真相，也没人在意真相。

解释完了“仇恨故事”的传播机制，我还没有解释“仇恨对象”的产生机制。哪些人更容易成为仇恨的目标？比如，为什么可恨的是警察而不是农民？为什么可恨的是日本人而不是越南人？更有趣的，为什么一旦仇恨发作，恨的就不单单是“可恨的警察”，而是全部警察？不单单是“侵华日军”，而是日本人的祖宗十八代再加无限的后代呢？

一个群体仇恨一个群体，是因为他们坏吗？不一定。犹太人好像没干什么让德国人非要把他们灭种的坏事儿。那是因为他们与众不同吗？比如穷人天然就容易恨富人，富人天然就容易恨穷人？恐怕也不是。历史上的内战杀了个你死我活，你说战场上杀得天昏地暗的士兵们有什么不同吗？还不都是穷人家的孩子。那为什么某些群体相比其他群体而言就更容易招人恨呢？

上文说过，传播仇恨的故事有一个替代品，那就是全方位的了解。如果一个人读过很多关于日本的著作，甚至曾到日本走走看看，和普通的日本百姓交流过，那他不会很容易地成为一个仇日分子，顶不济，他也应该觉得虽然很多日本人非常可恨，但不是每个日

本人都可恨。中国的警察似乎很不招人喜欢,但如果一个人身边有亲人或朋友是警察,他和他们交流频繁,他不会很容易仇恨警察,顶不济,他也应该知道虽然很多警察非常可恨,但不是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有问题。

有干坏事儿的警察吗?当然有。有干好事儿的警察吗?当然也有。几乎所有群体中都有好人天使都有混蛋败类,那为什么有的群体那么容易招人恨?两个原因:一个心理学的,一个经济学的。心理学那个不是我的专业,只简单提一下。

刚才提到,仇恨别人的人通常认为“自己正在受到侵害”,或者觉得“自我受到了威胁”,那是说如果 A 群体仇恨 B 群体,那 B 群体一定要有能侵害或威胁 A 群体。正常人不会集体仇视幼儿园的小朋友和养老院里的老人,因为他们无法对自己构成威胁。而警察不同,他们有能力威胁和侵害普通人,亲身受过侵害的自不必说,对大多数人而言,即便从来没和这类人打过交道,但感受到这威胁便足够了。为什么小说电视里的坏人大都是膀大腰圆满脸横肉的主?因为看见他们就足以引发你内心的“不适”和“受威胁”的感觉,所以自然容易激发你的仇恨。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日本人,在某些电视剧里他们凶恶猥琐,离我们又近又缺乏资源,所以从来亡我之心不死,威胁自然大大地。医生?那也是随时可以威胁每个人生命安全的主;富人和经济学家?他们抢走了本来属于老百姓的钱;各种成功人士?他们使别人感受到了被鄙视,并产生了自我认同危机。

当然,像任何一个情节曲折高潮迭起的故事虽然具备传播仇恨的潜质,但不一定真的能成功一样,这些群体只是具备“招人恨”的潜质,而真的要变成“万人恨”,还需要经济原因。这原因就是这些群体通常很难向公众低成本地提供“仇恨故事”的替代品——“全方位的了解”。

日本人不用说了,离得远,语言还不通,警察、医生、企业家、经济学家、成功人士,都具有类似的属性。就拿警察分析吧,其他类同。

警察是一项特殊职业,需要特别的训练,干的也是特殊工作。这工作和老百姓息息相关,但警察有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有枪,所以出现的时候便都带着“威胁”的气场,和拿手术刀的大夫一样,面对他们普通人感觉很无力。更要命的是,这职业天然很难让人全方位的了解。刑侦和现场取证调查这些专业技能自不必说,办公程序甚至管理户口都让普通人觉得神秘。就不说别的,那么多毛片儿中出现的“制服女警”就足以说明在普通人心中这一行业的不寻常,有些神秘。

宣传警察这行业的影视报刊资料不少,但目的却不是让大家全方位地了解他们其实也就是一坨普通人,穿的威武雄壮实际上也和你我一样大多数时间坐在办公室,跑步可能根本追不上小偷。相反的,宣传材料把他们更加神化了,变得更难让人理解了。越看越神秘,离正常人越远。这种故意制造的“神秘”实实在在造就了隔阂的温床,而且给了普通人过高的期望,一旦与现实不符,与警察有关的

负面故事自然满天飞。而一旦“仇恨的故事”散开，警察们根本没有辩解的能力。平时就因为过于神秘，谣言绯闻多姿多彩，出了事儿想出来还大家一个平淡无奇的“真相”，您这不逗我们玩儿呢么？哪怕它是真的，谁信啊！

同样地，在带有偏见的影视作品和老百姓眼中，企业家总是不劳而获日进斗金吃喝嫖赌，经济学家总是富人利益的看门狗，成功人士总是借助各种神秘力量和潜规则出人头地，总之这些人在我们的媒体宣传和印象中都不是正常人，没法儿让人全方位地了解。这些“不寻常”可以制造出由距离产生的“美”，也可以滋养出由无知而产生的“恨”。偏见一旦形成，这些群体在各种故事中就自动充当了反面角色，几乎没有翻身的机会。

注：本文应用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和一些证据均来自 2005 年的论文《关于仇恨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atred, QJE*)，作者是哈佛大学的 Edward Glaeser。此外，本文提到的对仇恨原因的心理学分析，来自 1995 年出版的书《邪恶：人类内心的残酷和暴力》(*Evil: Inside Human Cruelty and Violence*)，作者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 Roy Baumeister 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Aaron Beck。

利益与伦理

谷歌退出中国,我曾说:认为谷歌讲道义,这种态度是一厢情愿,有戏剧效果,但分析上走不远。我当然承认有商业道德这回事,但我说的是这分析走不远。如果用商业道德为分析起点,那要解释的现象是谷歌和百度为什么行为不同,分析的原因最后是商业道德不同,或者再加一层道德判断:谷歌就是刚正不阿,百度就是奸佞小人。

这分析框架是套套逻辑,没有内容。怎么定义道德?什么是好人?好人就是做了好事的人,所以是“好事”本身定义了“好人”,而不是以“好人”为起点,然后断定他所做的事情就叫“好事”,这后者是同义反复。所以,终究要以事件本身为分析对象,好人还是坏人,商业道德高低,不重要。

此外,选择商业道德为分析起点,许多重要的问题解释起来会很困难,比如:为什么谷歌“好”而百度“坏”?为什么谷歌时好时

坏？要用道德为起点回答这类问题，分析基本上逃不出同义反复或者套套逻辑。如果你认为商业伦理归根结底是人的道德问题，那么把百度和中国谷歌的所有员工对调一下，两家公司行为会有不同吗？

基于这些困难，我选择“利益”来看问题，这是经济学的分析。选择一个角度切入不等于否认其他角度的存在，而是一个理论的取舍：坚持一个基本出发点才可能逻辑一致地想下去，否则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就不能称之为分析了。更重要的是，选择“利益”做角度不仅能帮助回答以上三个我认为很重要的问题，而且“利益”的角度包含了“商业伦理”，选了前者，我不需要再考虑后者，也不会遗漏重要的分析结果。最后，相对于商业伦理，长期和短期利益都更容易观测和估计，不一定观测估计准确，但仍可以观测估计（股价就是干这个的）。这是个优势，可以据此回答更多的问题，比如：“利益变动多少行为会发生多大变化”，而“道德高低怎样行为区别多大”这问题就很难回答。

1. 为什么谷歌“好”而百度“坏”呢？

中文业务对谷歌来讲远远不是生命线，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它有选择减少中文业务的本钱；而中文业务几乎是百度的全部，是它的生死存亡问题，二者行为自然有别。我不认为谷歌就比百度更道德，都是利益至上的商业机构，二者面临的局限不同，所以行为不同罢了。

如何回应百度孙云丰的质疑：“如果谷歌占据了我国 80% 的搜

索市场份额,谷歌的高管,还会这么高调地宣称要不作恶(do no evil),从中国退出吗?”还是那句话,就算占据中国80%的市场份额,中文业务也只是谷歌全球业务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它永远有根据全球利益来调整在中国市场上行为的能力,而这能力,要比百度强很多。如果中国的业务是谷歌全球业务的80%以上,那谷歌的行为就会和百度趋同。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孙云丰有道理。但这句话应该引发更多的思考:第一,为什么谷歌在中国的利润空间有限?当然,百度的竞争是一方面,在这方面百度做得不错,但也不要由此就狐假虎威起来。如果没有很多众所周知的不可抗力因素,我想谷歌断不至于因为百度的竞争而考虑放弃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第二,为什么谷歌在中国的业务可能和它的全球盈利起冲突?诸多的经济政治因素造成谷歌在中国的困境,值得深思。

我也不认为谷歌比思科等公司更“道德”,只是谷歌的业务范围或者赚钱手段更明确地依赖于信息自由流动,在这一点上和当前的中国国情起了大冲突,所以看上去就有些斗士和悲情的意味。再加上谷歌声明书中揭露的某些细节,这意味更浓。正所谓时势造英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帕玛拉特牛奶不是在2005年退出中国市场,而是在三聚氰胺事件爆发时离开,那个转身恐怕也会相当华丽和高洁。但其实谁离开都是因为无利可图,成本太高,利润前景不明。只是时局不同,我们不明真相的群众感受便不同。

说过很多遍了,比起这些道德感受,事件背后的经济政治力量

变化会带来更多实际的变化,这是我关注的问题。

2. 为什么谷歌时“好”时“坏”呢?

谷歌还是那个谷歌,人还是那群人,口号也还是那个口号,伦理没变,环境变了。你可以形象地说当局太过分了,连老实人都忍受不了了。但是别忘了,当局在欺负人这件事上,通常是一视同仁的,欺负谷歌的同时不会忘了百度,但由于两人抵抗力不同或者成本收益结构不同,反应不一样罢了。

你可以嘲笑百度,比如十二生肖贴吧唯独没有“鸡巴”等,我也常常嘲讽它。但当我们认真思考的时候,问题就不是谁可笑,而是为什么百度更可笑。

是因为百度从上到下,总的来说人品有问题,或者特别多“软骨头”吗?当然不是的。把这茬人都放谷歌去,一样大义凛然,因为中国业务不再会伤筋动骨。这道理就跟把中国腐败官员扔到美国就会是守法好公民一样。二者行为的差别,还是业务和利益的差别。

当然可以继续赞扬谷歌谴责百度,说百度也应该当英雄而不是太监,最差还可以选择倒闭,选择不为虎作伥。这么骂政府是没问题的,因为政府强制纳了你的税收了你的钱,你天经地义地可以骂它。但外推到别的事物身上,要多想一想是不是苛责了。

3. 个人道德和商业伦理

有位 MBA 朋友留言,说“商业伦理是个人道德的最大公约数”,这句话我特别喜欢,一个“最大公约数”道尽了“妥协的艺术”。个人的道德观念不能简单外推到集体行为,本质的原因就是集体行

为是各种单个利益和力量角逐和妥协的结果,这角逐和妥协结果不是简单的个人观念的加加减减。

单个的人,可以意气用事怒发冲冠壮士断臂玉石俱焚,但集体行为通常会减少这类极端情况(在有些情况下有可能加强变得更极端,典型的比如战争),因为必须照顾各方面的利益。以商业公司看,大家是为了利益结合在一起,“逐利”是结合的根本,利益虽不等于商业道德,但商业道德如诚信合作等根源还是长期利益。没有利益,这公司根本不会存在,商业道德也就无从谈起了,这是公司和个体的重要差别。所以“壮士断腕”这种事发生在商业世界时一定是原因的,或者断腕能换来一条腿(以退为进或丢车保帅),或断的是别人的腕,或者你以为是“断腕”其实不过是“拔毛”,像谷歌这样。

4. 孙云丰的困难

百度孙云丰的文章我看了,有几个地方非常不解。

第一,在商言商,大家都是为了赚钱,而一家商业公司的高管批评另一家商业公司的理由竟然是“市侩”,这让我很无语。谷歌摆个姿态就“市侩”,百度天天屏蔽就不“市侩”了?至于用什么借口,都是老商人了,何必当回事。谷歌“拿一个高管制国家的民众感情来做台阶”就是“极其不道德”,其他公司包括百度天天喊着“保护民族工业”,然后抬高价格朝民众兜里猛捞钱就“道德”了?都是老江湖了,撒娇很难看。

第二,他又说搜索引擎最大的社会政治意义是为老百姓提供透

明的信息。反思自己的人生和意义,没问题,但之后的说法就太离谱了:“从这个角度而言,尽可能地设法为百姓提供便捷的信息获取技术服务,提供切实的价值,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地宣称自己不作恶和政府撕破脸皮搞壮烈,才是一种真切的负责态度。”

人家是来赚钱的,你也是来赚钱的,“切实的价值”就是真金白银,扯那么远,怎么听都不像是诚实的商人,而像不诚实的政客。政治家应该为选民负责,公司应该为股东负责,这才是“一种真切的负责态度”。扯什么老百姓啊,人家又没强制纳老百姓的税,和老百姓是平等交换关系,对老百姓有什么责任?是不是受压迫太久了,看谁都像是救世主,幻觉破灭了就说人家不是好人?

通篇都是这样的胡话,不多说了。有事儿说事儿,又不是竞选总统,老占据道德制高点干什么?

我以为世界上最文明的事,就是在重视彼此利益基础上的相互妥协,对抗是为了利益,谈判也是。重视利益没有贬低道德的作用,只是换了个说法,在现象上,“道德规则”的背后永远有利益。无论用传统的经济学分析社会现象,还是用更新的进化论心理学分析个体行为;无论分析的单位是经济学的“自利的个人”,还是进化论和生物学的“自私的基因”,都会导出类似的结论。

如果你觉得讲利益不谈道德让人感觉不舒服,那我还可以讲讲更让人不舒服的,比如爱情中女人的直觉,还有一见钟情命中注定意乱情迷。这种神秘和浪漫,根据 2009 年最新的女性性(进化论)

心理学的集大成之作《女人为何需要性?》(*Why Women Have Sex*), 都有极度不浪漫不神秘的进化论和基因解释,那解释和种种实验结果,说实话比经济学“自私自利”多了。但转念一想,正如黄舒骏唱的“虽然结果颇令人伤心,了解之后也没什么了不起”。其实只会让你更赞叹世界的丰富,有规律的层次井然的丰富。

常理破神圣

装神弄鬼的事情我从来不信，背后永远都是人的操纵，只要理解了这些人的动机，神话鬼话便不攻自破。

故事一：上帝的神迹和狡猾的牧师

中世纪的欧洲，如果世俗的法庭没有确凿证据不能定案，可以交给教会。当时在基督教信徒中流行的观念大概是上帝可以通过教会来判定世人的罪。教会让嫌犯将手放入沸水中捞指环，如果捞完之后手臂没有烫伤，那就是无罪，若有烫伤便是有罪。当然也不一定非得是沸水取物，还可以用火烧，这些过程统称为“神断法”(Ordeal)。

据史料记载，很多当时走这套程序的人，并没被烫伤，而事后也往往被证明确实无罪，这看起来真是“神迹”。

然而常识告诉我们，把手放入沸水，一定会被烫伤，如果没烫

伤,那水就一定不是沸水,这是个再简单不过的推理,绝不会错。

所以如果有人没被烫伤,那关键的问题就不是上帝是否显灵,而是为什么水没烧开?

道理是这样的:如果嫌犯们相信上帝确实能用这套程序来甄别罪恶,那么真正的罪犯不傻,直接招供了就完了,何苦多受一道皮肉之苦呢?所以只有无罪被冤枉的人才会去走一道程序,以证明自己的清白。既然来试的人都是清白的,那教士自然也就不必把水烧开了。

这个游戏想要玩儿下去,必须有几个条件,而这几个条件会带来额外的推论。

第一个条件是嫌犯必须相信这套程序,不信就不灵,所以我们可以推论这套程序不会用在不信的人身上。在中世纪的欧洲,谁是不信基督教的人呢?犹太人。所以“神断法”从来不用在犹太人身上。犹太人用“宣誓法”,就是当证据不足时,被告可以发誓说自己是无辜的,并且要找到另一群人,通常是12人,让他们也发誓相信被告是无辜的。

第二个条件是教士们必须时不时地把水烧开一次,烫伤一些人,否则久而久之,真正的罪犯也会觉得其中有蹊跷,会带着侥幸心理来试了。要吓阻这些机会主义者,只要偶然烧伤几个人再宣布他们有罪就足够了,不用老这么做。所以我们可以推论说大多数经历这套程序的被告都应该没有被烫伤,但肯定有小部分人曾被烫伤过。在13世纪匈牙利的史料中,研究者发现在208次神断案例中,63%(130个案子)的被告都没有被烫伤,只有37%的被告被烫伤过。

如果上帝真能在“神断法”中显灵，怎么犹太人就不用了呢？如果 208 个人中可以有 130 个人入沸水而不伤分毫，那义和团怎么就没打赢八国联军呢？

故事二：神圣的祭祀和穷人家的孩子

殖民地时代结束之后，流行开了“文化相对主义”。大概是说各种文化，不管看上去多么愚昧野蛮，都要放在该文化自己的环境中去理解和解读，方显各自的道理。这种看法总体来说当然不错，但走过头了也会带来一些判断上的失误，会带来不必要的神秘主义和理想化。

南美的印加帝国曾用活人祭祀，据说这一过程在该文化中极为神圣，所以用来祭祀的孩子都必须是“贵人”，是富贵人家甚至部落领袖的孩子，普通人家的孩子不够资格。

这些说法在我看来就很可疑，因为虎毒不食子，如果当上权贵之后还得把孩子拿出去送死，那这“权贵”有什么意思呢？

英国考古学家后来研究那些被当作祭品的孩子们的遗留毛发，同位素分析发现这些孩子其实都是农民家的孩子，不过是在被祭祀前一年送给权贵人家，好好喂养了一番，拾掇好看了再去当祭品。^①

① 朋友指出，同位素分析毛发的基本原理就是检测毛发的各个生长阶段来判断毛发主人的营养状况，如果营养状况一直在同一水平，则说明该人的食宿等情况相对稳定。上述研究的检测可能发现这些祭品长期处于营养不良，只是在生命结束前的最后一年才吃得比较滋润。

这个故事类似于中国近代革命中的“浙江人出钱，湖南人流血”。有钱人出钱，没钱人卖命，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无论传说有多神秘，都大不过人性。“野蛮”还是“文明”，是个主观判断，但其中发生的故事，必符合经济规律。

注：关于“神断法”的分析，来自 2010 年未发表的论文《神断法》(*Ordeals*)，作者是芝加哥大学的 Peter Leeson。关于祭祀的故事，来自英国考古学家 Timothy Taylor 的一篇小文章《文化相对主义的困难》(*The Trouble with Relativism*)。

建美国大业

几个数字很有趣。

数字 1:1985 年到 2007 年,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中国大陆人共计 51453 人,90%以上都留在了美国。同一时期,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中国台湾人共计 20373 人,一半以上都返回了台湾。在我们的近邻中,日本和韩国的留美博士学成后 70%以上毕业后都回国了。和我们一样不回国的留学生(留在美国的比率在 75%以上的)来自:印度、伊朗、俄罗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其他苏联和东欧国家。人才的竞争是全球性的。那些没留在美国的人中,也不是人人都回到了中国,去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的也不在少数。

数字 2:在 2006 年和 2007 年,美国培养的博士生中,中国人占 10%;英国所有在校研究生中,中国人占 6%;日本所有在校研究生中,中国人占 7%;加拿大所有在校研究生中,中国人占 6%。

数字 3:在 2006 年所有拿到美国理工科博士学位的人中,如果

我们以他们毕业的本科学校为准,清华数量第一,北大第二,韩国的首尔国立大学第三,然后才是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和加州伯克利大学。换句话说,以新毕业的美国理工科博士人数论,清华和北大领跑全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前十名中至少还有中国科技大学。^①

总结起来就是:好莱坞应该为中国国庆拍一部献礼电影,就叫《建美国大业》。与如此大规模的外迁相比,电影《建国大业》的演职员名单中受观众质疑的外籍军团,实在不值一提。国庆阅兵如果安排一个“人才方阵”,聚集所有在中国出生的全世界有名的科学家,那肯定是个大方阵,大外籍专家方阵。

这当然是调侃,但这些数字反映的现象耐人寻味。

首先,我相信人有自由迁徙的权利,所以选择住在哪里不能成为道德评判的理由。当考虑所谓“国家培养他们的支出”的时候,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国家的钱是从哪里来的。那些教育投入,来自税收,来自老百姓,老百姓有义务交税,那他们的子女也有权利移民。况且与中国很微薄的教育支出相比,这些人后来通过促进中美合作以及其他种种方式对中国的贡献,恐怕远胜。

其次,通过发表科研论文和申请技术专利,这些人对美国科技进步的贡献巨大。这还不算他们的子女未来可能做的贡献,因为我

① 数据 1 和 3 来自美国的博士生年度普查《*Survey of Earned Doctorates*》,数据 2 来自美国的两年一次的出版物《科技指标》(*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有理由相信他们子女的平均教育水准一定远超美国的平均教育水准。

这些人显然都是高级人才,为什么不肯回祖国效力呢? 经济收入上的巨大差距当然是重要的原因,详细分析请见本书《博士不值钱》一文。然而就算所有人都毫不考虑自身利益,只在乎科学研究,中国大陆仍然不能提供相应的科研条件。今天的科学研究很昂贵,离开钱和设备,科学家和工程师只能去卖鸡蛋。好在中国现在总体的研发支出水平已经是世界第三,每年都以千亿美元计。而从我知道的来美国大学招人的中国单位所开出的条件也在不断改善,有理由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中国留美博士选择回国工作。

做科研光有钱还不行,还要有高质量的合作伙伴。今天的科学研究已经不是孤身作战了,都是团队合作,分工很细。每篇论文的平均作者人数已经从 1988 年的 3 人上升到了 2005 年的 4.5 人。而从《科学》(*Science*)上发表的论文看,一篇论文作者人数在 10 人以上都不罕见。离开了美国的科研氛围,想回国组建团队,难度加大。

随着通信技术的进步,跨机构甚至跨国的科技合作已经越来越多。中美两国科研人员合作发表的论文数量从 1988 年的 521 篇增加到 2003 年的 2828 篇,上升了 5.5 倍,这和留美人员的增多密不可分。但同时也应该知道,同一工作单位内的合作仍然是主流,别说是跨国,就算在同一国家,离得远了交流起来也毕竟不便。每一篇发表的论文下面不止有作者的名字,还有作者的地址,名字数目比

地址数目多很多,这说明来自同一家机构(地址)的研究者很多,而且名字数目的增长率也比地址数目的增长率快很多。这充分说明同一机构内的合作不仅是主流,而且还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种紧密的社交网络和科研氛围,对科研人员的生产力影响极大。当然,这一点很难验证。仅仅是比较在美人员和留美后回国人员的科研生产力差别,不能证明美国科研硬件的优越。华人留美博士圈子里流行一个说法,“只有在美国混不下去的人才回国”。这是说,那些选择回国的人都是水平相对差的人,所以他们离开美国后科研水平下滑,不是因为美国的客观环境有多好,而是由于他们的整体科研能力本来就不行。然而,真是这样么?最新的研究发现,在个人科研能力和社会网络等其他条件等同的情况下,那些因不可抗力因素(比如签证到期无法续签)而不得不离开美国的外国科学家,科研生产力会显著降低,这就说明了即便抛开个人能力因素,美国客观的科研环境也的确更有利于科研产出。

人才是科技进步最重要的因素,把用美国科技投入培养的人才请回中国去,是非常划算的买卖,可惜美国纵有千般不是,中国的博士们还是愿意留下来。绿叶的生长离不开美国的阳光雨露,总不能要求人家没成为落叶之前就先归根吧?

注:关于科研论文中合作者数目的数据,来自美国两年一度的出版物《科技指标》(*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关于中美合作论文的数据,来自美国自然科学基金2003年的出版物《美国科研论文产出的变迁:1988—2003》(*Changing U. S. Output of Scientific Articles: 1988 -*

2003)。签证到期而离开美国的科学家科研生产力下降,这研究的样本是留美的富布赖特学者,取得美国博士学位后必须回国效力。这研究结果来自2009年未发表的论文《留在美国对科研有多重要?》(*How Important is U. S. Location for Research in Science*),作者是波士顿大学的 Shulamit Kahn 和 Megan MacGavie。

第二辑：非法合律

麦克：“那帮有权有势的人，那帮能罩着别人的人，比如总统或议员，我父亲其实和他们差不多。”

凯：“听听你多幼稚，议员和总统可不杀人。”

麦克：“凯，咱俩到底谁幼稚？”

——电影《教父》台词

海盗与民主

有个著名的小智力题目叫“海盗分金”，经济学的博弈理论中常常引用。我曾把这题目简化了用在给大一新生“经济学原理”课程的期中考试。让我用这个有趣的小题目开头吧。

有 4 个海盗，抢劫来 100 块金币，要怎么分呢？最后决定民主投票。由最年长的海盗先提议，如果获得半数以上（至少 51% 的票数，或 3 个人）同意，那就按他说的办，否则大家就不同意，并把他丢到海里喂鲨鱼。然后再由次年长的海盗提议，游戏规则不变，如果有 2 人以上同意，就通过，否则把提议者喂鲨鱼，剩下 2 个海盗接着分。按照这个规则，你认为最后分的结果会是什么？

很明显，每个海盗的最优提议要包含两个要件：第一要保证自己的提议通过，否则小命不保什么都白搭；第二要在保证有命的情况下，尽量为自己多争取几枚金币。

为达到这两个目的，那个最老的海盗应该如何提议呢？读者朋

友不妨先不要读下去,自己想一下。

你的直觉可能是那最老的海盗必须要讨好其他海盗,慷慨地给他们多分一点以求保命,但答案却出人意表!年老的海盗的最优提议是:自己拿 97 块金币,不给 2 号海盗任何金币,给 3 号海盗 2 块,给 4 号海盗 1 块。

这提案看起来可够贪婪的,但在逻辑上,这是唯一让所有人皆大欢喜的结果,怎么可能呢?

海盗们在提议中不仅要打好自己心里的小算盘,也要估量别人心中的小算盘,必须估计别人对自己提案的反应,并据此讨价还价。而讨价还价的不二法门就在于探测对方的底线,最终让自己的提议达到这样一种效果:如果你不同意我,那我就算死了你也绝对好不了!

如果前 3 个海盗都死了,那 4 号海盗就可以独吞所有钱,这是他的最好结局,前 3 个海盗也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所以 3 号海盗绝不能让前 2 个海盗都死掉!因为如果前 2 个海盗都死了,就要轮到 3 号海盗提案。要提案通过保全性命,他必须得到全票。因为只剩下了 2 个人,半数以上就等于是全票。这时他必须把所有钱都给 4 号,4 号才不会反对他,否则 4 号一定反对,把 3 号丢到海里去,自己独吞所有金币。

所以 3 号海盗绝不想让提案权掉到自己头上,前 2 个海盗不能都死!而前 2 个海盗也清楚地知道他们死后 3 号的窘境,自然要好好利用这一点。

往前推理一步,如果1号海盗死掉的话,那2号海盗的提议就只需两个人同意。他自己肯定同意,所以他只需要再争取一个人的同意就行。这很简单,给3号海盗1枚金币,而根本不分给4号海盗。4号当然一定会反对,但随他去,3号绝不会反对。因为如果3号也反对,那2号就死了,提案权就掉到了3号头上,那对他可大不妙!所以如果2号提案,那分赃方案一定是 $\{99,1,0\}$ 。

再往前推一步。1号海盗知道如果自己死了的话,2号的方案就一定是 $\{99,1,0\}$,而这提案就是其他三个海盗的“底线”!知道了这一点,1号想活命并争取最大数额金币,就轻松多了。不用多说,他要想以最低代价争取3票的话,方案就一定是 $\{97,0,2,1\}$,相比他死后2号海盗的提案,3号和4号各多得1枚金币,他们没有理由反对。2号反对,但没用。

这个故事很有趣,博弈论中通常用它来说明“逆向推理”(就是从后往前倒着推理)的思考方式。但这个故事还应该有更多的启示,起码我们不难想象,一堆亡命之徒聚在一起,分赃分到大家都满意,不是件容易的事。

那么,真实的海盗是怎么分赃的呢?答案还是出人意料:他们真的是用民主投票。

十七、十八世纪是海盗的全盛时期,外国有大家熟悉的电影《加勒比海盗》,而我国附近海面上有倭寇,还有横行台湾的诸位“龙王”,比如李旦和林道乾。这些海盗和现代海盗,比如索马里海盗,有很大不同。现代的海盗更像是抢银行的劫匪,规模普遍小,一般

都住在沿岸城市，有买卖来了，七八个人弄一艘汽艇连夜就干一票，然后回家分赃。过程简单，合作愉快就再来一票，不愉快下次换人再干。还有一部分海盗是直接受雇于岸上的雇主，雇主让他抢谁就抢谁，抢完之后把赃物交给雇主，然后领取报酬。

古代的海盗可不同，那是常年游荡在海上吃住都在一起的群体，小规模的好几十人，大规模的三四百人，都是亡命徒，常年聚在一起合作，没有各种规矩岂能成事？若每次劫掠后分赃都要吵，那还得了！因为海盗是犯罪团伙，分赃不均不可能到法院去打官司，所以必须自己发展解决之道。更重要的是，海盗和其他黑帮比如意大利黑手党不同，黑手党内都有家族的纽带和权威，有一套自上而下的体制来分配利益和解决争端。而海盗不同，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亡命徒，聚在一起合伙打劫，人人平等，谁都不是天然的老大。当然也需要权威，需要船长，否则打仗的时候谁来指挥？投票肯定来不及，票没投完就全丧命了。但船长的权力不能过大，毕竟除了打仗外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要照顾伤员，要分赃，要分配伙食等等。要是船长专权而损坏了其他同伙的利益，怎么办？

于是海盗们建立了民主体制，选举船长和舵工(quartermaster)，让他们之间的权力互相制衡，同时，每艘船都有内容大同小异的“海盗宪章”。这些权力互相制衡的机制，比法国和美国要早一百多年。

挑其中有趣的几点说说吧。

首先是要限制船长的权威，这和当时海上的商船很不同。海上商船，船长要不就是船的所有者，要不就是陆地上船务公司的代理

人同时拥有船的股份,这现代公司的 CEO 差不多,他们和船员的关系是雇佣关系,所以船长的权威是绝对的。

但海盗不同,船是大家一起偷来的抢来的,所有权不归船长。由于打仗指挥等需要,大家需要个权威,所以选举了船长,但他的权力大多集中在战时,平时管事的都是舵工,二者的权力制衡得很好。无论是船长还是选出来的舵工,吃住待遇都和普通海盗无异,根本没有特权,是个人就能到他们屋里破口大骂。不过在分赃的时候,船长和舵工可以个人独得双份。而且据史料记载,“弹劾船长”的事时有发生,理由千奇百怪,有因为滥用职权的,有因为表现懦弱的,等等。据说有一次几艘海盗船联手打劫,战利品中有不少漂亮衣服,晚上几个船长没和大家商量“借”了这几件衣服去岸上泡妞,回来就被弹劾掉了。

其次,海盗要经常玩儿命,有人怕死怎么办? 遇见危险干吆喝两嗓子不敢上就等着收工分钱,这种主儿肯定有。所以“海盗宪章”中都有明确的补偿与激励条款,比如掉了左手怎么补偿,掉了右腿怎么补偿,死了怎么补偿,都是明码实价,而这些钱大家平摊。补偿之外还有激励,比如眼尖的发现目标多少钱,作战勇猛多少钱,等等。

最重要的是怎么分赃,这都是在宪章中明确写好的。做饭的分多少,医生分多少,船长分多少等等。分赃最忌讳什么? 就是私藏劫掠物品! 必须把每个人劫掠的东西都全数交上来,聚集在一起平分。偷盗或私藏赃物都是大罪,被发现了有可能丢掉性命。至于那

些不能分或不好分的赃物，要上岸卖了之后再分钱。

当然还有许多其他措施。可不是嘛，一群亡命徒聚在一起，天天打架斗殴怎么办？生意还做不做了？所以各条船都严格禁止打架斗殴，船上不准赌博，过了几点后不许喝酒等等，都是为了降低冲突的可能性。还有就是绝不能带女人上船，这一条虽然附带着种种迷信的禁忌，比如女人不洁会带来霉运，但最本质的原因，还是为减少船员之间的冲突。成百个大老爷们常年流落海上，还有比一两个女人更不稳定的“祸根”么？那简直不是女人，是火药桶啊。

当然，海盗宪章里不可能把什么情况怎么处理都写全了，很多时候出了事儿还必须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时候冲突处理的方式也仍然是民主式的，大家选出来“陪审团”，由他们定夺，而不是船长一个人说了算。

就是这样一群游离在主流社会之外的暴徒，民主制度玩儿得极其高明，运转得极其高效。首先是海盗船往往很干净整洁，可谓军容整齐，比商船甚至海军都强多了。可不是嘛，这船是大家自己的，自然格外爱护。其次是劫掠有效收获颇丰，从经济收入上看，当海盗似乎比当普通船员划算，虽然目前研究的资料尚不足以定论。再次是人权平等，黑人在美国还是奴隶的时候，在海盗船上就早已经是和其他人平起平坐的普通船员了。海盗的这些民主制度和不俗的战果，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有很多人自愿加入海盗队伍，尤其是那些在商船上饱受船长欺凌压榨的水手们。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利益冲突，就有经济学。海盗的民

主,不是那么简单的吧! 梁山泊的权力分配和政治,也值得细读。

注: 本文关于海盗中权力结构的分析,来自 2007 年的论文《海盗组织的法律和经济学》(*Anarrgh-chy: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Pirate Organization*; JPE),作者是芝加哥大学的 Peter Leeson。他在 2009 年把自己关于海盗的经济学研究整理成了一本书,起名叫《看不见的钩子》(*The Invisible Hook*),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the Invisible Hand)相映成趣。普通书的扉页上都是献辞,比如作者把书献给某某人,而他在该书的扉页上印着“Ania,你愿意嫁给我么?”Ania 是他女朋友,这样的求婚怕也是史无前例吧。据报道说,为了不让这求婚的消息走漏出去,出版商很是费了一番功夫,包括早期印出来拿给别人征求意见写书评之类的版本上都没有这条,终于成功制造了惊喜效果。后来,Ania 同意了。

估价太子党

“太子党”，富且贵，巨额财富往往引来羡慕的口水和怀疑的目光。这亿万财富中，有多少是靠个人能力打拼而来，又有多少是其拥有的背景所值呢？这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能给出一个精彩且有说服力的答案，不容易。

必须承认，“太子党”的个人能力一般在平均线以上。首先可能因为他们基因优良。毕竟，在任何体制下，能爬上高位手握重权的父母都不是等闲之辈。如果不发生特殊变异的话，“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一般遗传规律还是存在的。其次，太子党一般所受后天教育优良，无论是早期家庭教育，还是后来的高等教育，再加上种种包括社交能力在内的“非认知能力”的培养，太子们通常要高人一筹。这些能力能换来市场回报，所以全世界的太子党们一般都喜欢标榜自己的成功来源于个人奋斗，可以理解。

然而，家庭背景又价值几何呢？口说无凭，拿到市场上验验吧。

先让我用一个虚构的故事来解释一下如何检验,然后再回到真实世界的例子。

某太子,能力出众,开了家公司在海边开采石油,不妨叫“贵公司”。公司上市,市场一片叫好声,每股股价卖到 50 元,太子身价一夜暴涨。同时,某平民,能力也出众,率领精英团队多年奋斗打拼,清白勤恳,业界口碑出众。开创“勤公司”,也在同一片海洋中开采石油,公司上市之日,市场也一致看好,股价同样 50 元。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场惊天海啸卷走了两家公司的油井和其他巨额资产,让两家公司损失同样惨重。消息一出,市场大哗。“勤公司”股价一路跌到 5 元,平民老总宣布破产;而“贵公司”股价虽然也下跌,但跌到 40 元便停了下来。显然,市场认为“贵公司”靠山未倒,东山再起指日可期。虽然都是跌,但这其中的 35 元之差,恐怕便是“贵公司”太子老总“背景”之价了。

换个角度说,海啸没有发生,两家公司运行良好。但太子的老爸忽然一夜驾崩,政坛地震,市场大哗。“贵公司”股价一泻千里跌到 5 元,而“勤公司”受政局不稳之累,股价也下挫到 40 元。这其中的 35 元之差,也同样可以反映市场对太子“背景”的估价。

这故事逻辑清楚简单,但还要拿到真实世界来检验一番才真正过瘾。

让我们看看印度尼西亚独裁者苏哈托主政的 1990 年代。没有意外,苏家子女个个是商界骄子,财富惊人。太子汤米更是世界瞩

目的明星人物。因为喜欢跑车,1994 年汤米出手 4000 万美元买入大量意大利兰博基尼跑车的股份,成为最大股东。和世界各地的太子党们一样,汤米太子和他的兄弟姐妹们自然也认为自己的财富主要是靠自身努力奋斗和天份所致,和老爸无干。

然而,市场并不这么看。

1996 年 7 月 4 日,市场传来惊人消息。苏皇要去德国检查身体!到底是什么病,居然能让苏皇不得不远走德国?莫不是要龙驭宾天?消息传来,雅加达综合股指一天下跌 2.3%。然而同一时间,太子汤米的公司股价却暴跌 10%!

在这一场风波中,综合看来,与苏家有关的公司股价平均下跌 4.5%,而和苏家无关的公司平均股价甚至小有上升 1%。一里一外,仅仅因为苏皇要检查身体,就有将近 6%的股票市值一夜蒸发,而且蒸发的市值全来自太子党羽控制的企业!

孤例不成证。所幸,在 1995 年到 1997 年前,苏皇先后有 5 次龙体欠安,每一次都伴随着汤米太子及其亲朋好友的公司股价下跌,而其他公司则安然无恙。

万恶的六亲不认的市场,就是用这种方式来为“太子党”估价的。真正是,人未走,茶就凉。

注: 以上的故事,来自 2001 年的论文《估计政治背景的价值》(*Estimating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AER),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 Raymond Fisman。

扎堆卖毛片

2008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没有几个真材实料的经济学家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就被大众熟悉的，克鲁格曼是个例外。原因大概有两个：长相比较好，有几分神似乔治·克鲁尼；文笔极佳，擅长推销自己的观点。后来美国经济危机，他更是声名大噪，至于说多错多，那是后话。

他得诺奖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对“新经济地理学”的开创性研究。这学问有另一个名字叫“空间经济学”，我更认可这名字。因为所谓“新经济地理学”实际上和“地理”扯不上太大关系，里面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没有什么“地理”的观念，就是研究抽象空间上的一堆点怎么聚集的问题，应用在经济学中就是想知道为什么很多经济活动往往要“扎堆儿”？比如北京买毛片儿要去中关村，各种小玩具小商品都在浙江义乌等等。

以卖毛片儿为例，为什么卖家都集中在中关村一带？要回答这

个问题，必须回答三件事儿：扎堆卖毛片儿有什么好？不扎堆卖毛片儿有什么不好？要扎堆的话应该往什么地方扎，为什么是中关村而不是天安门？这都是在说收益和成本了。

扎堆儿好！俗话叫“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行话叫“规模收益”，是说大家聚在一起工作的收益会大于每人分散工作收益的总和。比如一群人聚在一起卖毛片，每个人都可以怀揣几张盘，有买家问货的时候可以随时互相借调。

那不扎堆儿有什么不好？不扎堆儿的话，卖毛片儿的人之间互相借调货源就不方便，会因为空间阻隔而加大成本。为交流货源，怀揣十张盘满北京乱跑需要坐个地铁，背着两麻袋毛片儿可能就不得不打个车，这都必须支付交通运输成本。为了把这运输成本节省下来，大家干脆就聚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了。

如果把北京看成一个平面空间，卖毛片的人是分散在这平面上的很多散点，那么上面提到的“规模收益”就是把这些散点吸引在一起的一种引力，而“运输成本”就是阻止它们分开的另一种引力，两种引力一结合，卖毛片儿的人就聚在一起了。

最后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聚在中关村？为什么不聚在天安门？

一个解释是中关村离“市场”近，毛片儿需求旺盛，周边北大人、大清华、中科院等大学院校，多的是没有女朋友的单身男生，业余娱乐离不开毛片儿。离市场近是非常重要的，就算毛片儿的货源都在塘沽，大家也宁愿花这运输成本把碟片运到买家多的地方，而不会在塘沽就地开卖。

再举两个例子。中国的有色金属矿藏资源集中在西南,所以相关采矿业自然也集中在那里。但以这些资源为第一原材料的有色金属锻造延压加工及冶金业,并不集中在离矿产资源近的西南地区,而是集中在离其最终产品需求近的地方,比如江浙一带。再比如,中国的葡萄以新疆的最佳,但中国的葡萄酒业都集中在山东,因为这行业严重依赖出口,要走海上运输。

另一个解释是“天知道”。这是说,虽然出于成本收益的经济考虑卖毛片儿的人最终会扎堆儿,但扎在哪里取决于很多偶然因素。比如,最早的毛片儿帮老大可能天天要去北大上课,所以大家就聚在了中关村;如果他当年要去北师大我的话,那今天的毛片儿重镇也许就是小西天。

这种历史和文化的偶然性因素在决定最初的扎堆儿地点时可能作用很大,而一旦起先的聚集点确定下来,经济力量就会加剧这类聚合。当中关村成为中关村之后,再想把毛片儿转移到小西天就难上加难了。就算对毛片儿的需求均匀分布在北京城各角落,也恐怕难以撼动中关村的毛片儿龙头地位。因为一旦聚合起来,规模收益就形成了优势,不容易再分散到其他地方去了。

一个例子是中国的啤酒和白酒行业。全国各地都是酒宴,所以酒鬼的分布应该比较均匀,但白酒产值的90%左右都在四川,这和四川历史上积淀的白酒文化密不可分。而啤酒的扎堆儿生产现象非常不明显,一般都是各地人喝各地产的啤酒。这可能是因为啤酒一来没啥历史二来不需要文化,所以也就没扎起堆儿来,分散全国

就地生产。

除了上述的规模收益和运输成本之外,产品的多样性是扎堆儿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毛片儿”只是个抽象的集体概念,而扎堆卖毛片的地方毛片儿产品一定是多种多样的,内容上有卡通的,日本的,欧美的,偶像的,群众的;格式上有 DVD, VCD, 压缩盘, 等等,这才能让卖家聚在一起互调货源互通有无,发挥规模经济的作用。而且毛片儿扎堆的地方靠近市场,中关村高校林立单身男青年无数,自然对毛片的需求也是多样的。如果毛片儿也只有八个样板戏,那引起扎堆儿的规模收益互通有无就要大打折扣。

所以“扎堆儿”可不是大家聚在一起卖完全一样的东西,饭馆儿扎堆儿的地方肯定各家菜式不同,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产品种类也是极大丰富,这是规模收益互通有无的表现。大家扎堆儿生产一大类东西,但具体产品之间一定区分很细,这其中的效率和福利收益很大。

总结一下:扎堆儿的规模收益和分散生产的运输成本是造成扎堆儿的经济引力,再加上一套计算机模拟程序来计算和模拟往哪里扎的过程,便构成了“空间经济学”的核心。^①

① 这种计算机模拟的演化路径有着广泛的应用,英国的道金斯写过一本进化论的书叫《盲眼的钟表匠》(他最著名的作品是《自私的基因》),里面便讲述了一种“动物空间”。在这空间里,所有类型的动物都是其中的一个点,而模拟演化路径就是模拟某个点向另一个点的靠拢过程。这里头随机性非常大,演化起始的一点微小扰动就可能变鹿为马。

这套“扎堆儿经济学”革命性地修改了过去三十年的国际贸易理论：不同的产业扎堆儿在不同的地方，所以为互通有无，要在生产之后进行贸易，这就从一个角度解释了地区间贸易的成因。这理论不仅可以解释贸易模式，还可以用来理解城市的形成等扎堆儿现象。

注：以上的分析逻辑，出自克鲁格曼 1991 年发表的著名论文《规模收益与经济地理》(*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PE)。关于中国冶金和酒行业的数据，来自我 2006 年的硕士论文，收录在 2007 年出版的《中国产业集聚，增长及效率》一书中。

走私与腐败

人们对走私的看法一般很复杂，主要是价值判断问题。先有限制交易的禁忌，然后才有走私。对走私的态度取决于你对禁忌本身的态度。比如，有禁酒令就一定会有人贩私酒，而你对私酒的态度取决于你是否认为政府有权力禁止人民饮酒。

明朝初年海禁严厉，几乎所有从海上来的私人商品都成了“禁”。明朝中后期海禁再度加强，于是倭寇横行，其实其中很多是中国私人海商。时人有云：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本来都是老老实实的买卖人，一旦被禁，就不得不铤而走险。而一旦冒起险来，就容易产生暴力对抗。于是就有了两百年间纵横东南海面的“七海龙王”们：倭寇头目徽商汪直和徐海，据说把荷兰人引进了台湾的李旦，传说在高雄打狗山中埋下巨额财宝的海盗林道乾，“国姓爷”的老爷郑芝龙，等等。对了，还有永远不死忽男忽女的东方不败。

今天,毒品违禁,走私毒品是重罪。但和色情行业一样,始终没有观点能说服我到底凭什么要把毒品和色情业非法化,大多数支持者都不过是把道德大棒挥舞得虎虎生风,嗓门大,道理小。

避开违禁品不提,正常产品的走私都是为了躲避关税,比如汽车和化妆品的走私。这些走私是好是坏,取决你认为目前的关税水平合不合理。付比国外高两倍的价格去买一台进口车或者一条破烂牛仔裤,是为国家关税收入做贡献。但我想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做这贡献的。

据估算,当年赖昌星总共走私了 60 亿美元的正常产品。而他倒台之后,当地很多中小企业也受到冲击而倒闭,因为有了走私来的低价格原材料。如果你觉得这有点夸张,那是因为你低估了赖昌星的能量。要知道,他可是华夏五千年来的走私第一人。60 亿美元有多少呢? 1991 年到 1996 年,中国的进口额加起来也才 2500 亿美元左右。

非法活动一向很难度量,走私也不例外。常见的度量走私的方法是比较出口国的海关数据和进口国的海关数据。因为出口国卖东西一般都光明正大,走私不过是为了偷偷绕开进口国的海关。所以如果出口国那里说某件东西卖了 100 万件,进口国那儿只报收到了 50 万件,这差距就可能是走私造成的。

这个度量原则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两国贸易额一般巨大,测量误差也不会小,所以两国海关衡量的差距也许不过是测量误差罢了。但诡异的是,这“误差”水平竟然随着关税税率的增大而增大!

须知,关税越高,走私越有利可图。如此看来,这“测量误差”可就不仅仅是误差了。举个假想的例子,如果女用香水的关税是 50%,男用香水的关税是 20%,二者都是瓶装,度量难度差不多,这时如果女用香水的两国海关数据差别远比男用香水来得大,那这差别就一定有鬼!而研究者从 1996 年到 1998 年香港和内地之间的进出口数据中发现,关税税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这进出口的测量误差就增大三个百分点。

大规模的走私进海关,没有内部官员的配合根本不能成事。这从远华案落马的高官数目可见一斑。要反贪,用重刑的效果有限得很。明朝刑罚够重,可嘉靖年间走私网络照样朝野相通。要根除与走私相关的腐败,还是要靠降低关税水平,让走私无利可图。可这不容易。

“权力滋生腐败”,这句话只说了故事的一半,另一半是“腐败维护权力”。因为有利可图,所以取消权力无异虎口夺食,既得利益者一定会奋力反对。要是关税都取消了,海关的油水不也就小了么?今天打着“保护民族工业”等各类旗号支持政府维持高关税的利益集团中,有海关官员的影子吧?

“非法进口”算走私,另一种是“非法出口”:偷偷摸摸出口,但可以光明正大地进口,比如文物走私。

文物出口的价值判断,吵起来又是一锅粥。炎黄子孙在大英博物馆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看到华夏祖先的宝贝,可能总有些心里不适。但不适归不适,现实地说来,如果这些文物没有被非法地或偷

或抢或买走,今天的问题恐怕就不是在哪里能看到它们,而是它们是否已经毁灭了。我看不出禁止文物出口的道理在哪里,只看见一堆金光闪闪的大词,晃得眼睛疼。愿意出大价钱购买文物回去好好珍藏传世的外国买家,敌不过高举民族旗帜却无力维护文物任由其腐坏破落的“守财奴”,这也算是宁为瓦碎不为玉全?

对于正常商品,要用出口国的海关数据减去进口国的海关数据来看走私。而对文物,这减法要反过来。偷偷摸摸出口,光明正大进口,所以走私存在于进口国的数据减去出口国的数据中。例如,若出口国的数据中只出口了 100 件文物,而进口国的进口数据说收到了 200 件,那这 100 件的差距就可能是走私造成的。当然,有国际间的合作及各种协定,某些国家也不进口非法文物,但美国不是其中之一(只禁一小部分,大部分敞开大门欢迎)。

用美国的进口文物数据减去出口国的出口文物数据,这差距仍然可能只是“测量误差”,但这里可没法参考利用关税税率了,因为美国对文物进口的关税是 0。那么,怎么知道这差距不只是“误差”呢?答案是:一个国家越腐败,这个国家和美国的文物进口出口数据差异就越高!这个关系就不仅仅是“测量误差”那么简单了。既然出口文物非法,那么这么多文物是怎么溜出国境的?海关没人,不太方便吧?

1996 年到 2006 年,中美两国文物进出口的平均衡量差距是 7%,这可不是个小数目。而其他盛产文物又比较腐败的国家,比如埃及和叙利亚,和美国的文物进出口衡量差异都在 10%左右。

让大规模走私成为可能的技术变革是集装箱。香港港口每年流动的货物价值在 7000 亿美元以上。2006 年一年过港的集装箱数目超过 2400 万只,平均每小时 2700 只。想从审查技术上杜绝走私,几乎没有可能,因为根本查不过来。

注:这里的资料出自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 Raymond Fisman 和他的同事魏尚进合作的两篇论文:2004 年的《税率与逃税:中国“丢失的进口”》(*Tax Rates and Tax Evasion: Evidence from “Missing Imports” in China*, JPE)以及 2009 年的《走私的艺术和艺术的走私:解密文物和古董的非法走私》(*The Smuggling of Art, and the Art of Smuggling: Uncovering the Illicit Trade in Cultural Property and Antiques*, AEJ-Applied Economics)。

恐怖分子考

从1980年到2003年,全球范围内共有315次自杀性恐怖袭击事件,造成了超过6000人死亡(含“9·11”事件)。这些恐怖分子究竟是些什么人?为什么不好好活着而要去把自己炸成碎末末?

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那这些恐怖分子应该是很穷的吧?这似乎也符合经济学道理,人穷命贱才更容易轻生啊,有钱人都忙着享受生活呢。这些人肉炸弹们应该也没受过什么教育吧?要不脑子怎么不开窍呢?穷且没文化,这恐怕是大多数人对恐怖分子的印象。

外国的恐怖分子咱虽然不熟悉,但可以想想咱们前朝皇上眼中的“恐怖分子”们:“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陆浩东,富家子弟,受教育良好;刺杀摄政王载沣的汪精卫,商人子弟,日本留学生;女的有秋瑾,官二代,日本留学生……这么想下去,好像这有名的“恐怖分子”里头真还没什么泥腿子。再想想,“9·11”开飞机撞大楼,那可是顶尖的技术活,别说是文盲了,弄个工程师过去也且得培训

好些日子呢。至于小规模爆炸活动,安装炸弹、选址、选时机、引爆,还得避过政府情报武装人员的围剿,想成功,那真得是人才。

事实上现代的恐怖分子们也确实不是又穷又没文化的人,大多是中产阶级并受过良好教育。以新闻里经常报道的巴勒斯坦人体炸弹为例,在有资料记载的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的 48 个人体炸弹中,穷人只占不到 15%,而同一时期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的人口中,贫困人口占 30% 以上。在人体炸弹中,中学以下教育水平的只有 2%,而同一时期和同一地区的人口中,中学以下教育水平的占到将近 50%。可见与普通人群相比,恐怖分子一般又有钱又有文化。

这事儿实际上并不难理解。“恐怖活动”虽然极端,但说到底这是一种政治行为,恐怖分子们一般有很多政治诉求。而与这些诉求相比,穷人的首要任务是吃饱饭。搞什么对美帝国主义的圣战? 还没吃饱呢,不撑。

对穷人来说,恐怖活动其实和民主投票差不多,都离自己的生活比较远。偶尔听听知识分子们宣传,有道理的时候跟着起哄,没道理的时候随着骂两句,不太热衷。但受过教育的人就不同,“有更高的精神追求”,激动起来可就不得了。先识“大义”,而后“凛然”,那些个饿得獐头鼠目笨得目不识丁的,“凛然”不起来。

在约旦、摩洛哥、巴基斯坦、土耳其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待在伊拉克针对美国和其他西方人的自杀性爆炸事件? 你个人认为这些行为是有正当理由的么?”在所

有四个国家中,与低教育人群相比,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人回答“有道理”的比例要高得多。而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进行的一项民调中,与文盲相比,高中以上学历的人更加支持对以色列的目标进行武装攻击;而与无业人员相比,学生们更支持类似攻击。

为什么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反而更加极端呢?不妨先再来看另一项相关研究。

恐怖活动的根源是仇恨,但仇恨又是怎么来的呢?在对犯罪的研究文献中,有一类犯罪叫“仇恨犯罪”(hate crime),就是那些针对被仇恨群体的暴力行为。比如美国早年的 3K 党,就是白人对黑人的仇恨犯罪。1997 年发表的一项对德国青年袭击外国人的仇恨犯罪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这类犯罪发生在“东德”的比例远远比在“西德”高。当然这可能是经济原因,东边儿刚推倒柏林墙不久,还很穷,所以可能各类犯罪都多,仇恨犯罪也并无特殊之处。然而,东德也不是铁板一块,如果经济发展水平是原因的话,那在东边的发达地区的犯罪率应该比同在东边的欠发达地区低,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实际上,已经有很多研究指出,与民主制度相比,专制的政治环境更容易培育仇恨。而在一个专制的环境中,受教育的人心中的仇恨往往比文盲更深。想想那些行为残暴的红卫兵,多少来自大城市多少在农村?多少人受过教育而多少人目不识丁?是谁出手揍死老师们的呢?再想想时不时举着反日大旗上街的爱国青年,多少是学生多少是民工?

然而,为什么专制会培育仇恨呢?可能有三个原因。

第一,专制环境中,教育不仅仅是开民智的工具,也是根植偏见的工具;第二,专制环境中,信息的流通往往不畅,这为谣言和仇恨的生长提供了进一步的土壤,详见本书《无知与仇恨》一文;第三,专制环境中,权力的分配极度不公。这最后一点,美国历史学家孔飞力(Philip Kuhn)的分析很精彩。

孔氏在中国,以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知名。这场妖术恐慌,是乾隆皇帝领导的,各级官僚都调动起来的,有广泛群众参与的,对流浪无业人士进行的一场大迫害,主要对象是和尚和乞丐。乾隆的动机不难明白,“反清复明”一直是清朝统治者的心头大患,所以对“妖言惑众”的人一直非常警觉,谁知道这里面有没有谋反的行为?

无论是妖术恐慌还是“文革”,上层都有政治动机,可是普通老百姓跟着起什么哄呢?这和权力结构的分配有关。孔飞力说:“作为现代中国的前奏,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愿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和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

妒忌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在帝制后期的中国,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也就不能以此通过各自的利益相较去竞争社会资源。对普通臣民来说,仅仅是组成团体去追求特殊的社会利益便构成了政治上的风险。有时,人们便会到旧的帝国制度之外去寻求这种权力,其结果就是造反和革命。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权力通常只是存在于幻觉之中;或者,当国家清剿异己时,他们便会抓住这偶尔出现的机会攫取这种自由漂浮的社会权力。只有非常的境况才会给无权无势者带来突然的机会,使他们得以改善自己的状况或打击自己的敌人。即使在今天,让普通民众享有权力仍是一个还未实现的许诺。毫不奇怪,冤冤相报(这是‘受困扰社会’中最为普遍的社会进攻方式)仍然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特点。”

孔氏的这两段话,可以传世。

注:本文关于恐怖袭击次数的数据,来自2005年的一本书《死也要赢》(*Dying to Win*),作者是芝加哥大学的 Robert Pape。而民意调查,恐怖分子教育和收入水平,德国仇恨犯罪等数据,来自2007年的一本书《谁是恐怖分子》(*What Makes a Terrorist*),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的 Alan Krueger。引用孔飞力的话,来自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第300页和第302页。

女巫与女婴

生存需要耗费资源,当资源匮乏到不足以让所有人活下去的时候,族群中大多数成员就会牺牲掉那些“最没用”的人,比如饥荒来临的时候率先牺牲老弱病残。而这资源匮乏的原因不一定仅仅是自然灾害,人为因素也可以在一夜间让资源匮乏。比如计划生育,每家只限生一个,这时候想要男孩的父母不小心生下个女婴,想节省生育指标,怎么办? 本书《生命价几何》一文中对生命价值和取舍的疑问,并非纸上谈兵。

农业社会,看天吃饭,一旦遭遇灾年,一般总是先抛弃老人。比如生活在北极圈冰原冻土的某些爱斯基摩人部族,在食物紧缺的时候,就会在外出打渔时把老弱抛弃在与陆地没有连接的浮冰上冻死。而古代日本,在灾荒之年也会把老人扔到山里冻死或被野兽吃掉。

“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古代农业社会一旦遭遇饥荒,迷信和巫

术必随之兴起。因为统治者在无法做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时候,往往必须找人来背黑锅,而在大多数人都无知而迷信的年代,巫师和术士,是最好的替罪羊。而那些随后被迫害的巫师和术士,大多数是对社会生产没有贡献的人,无权无势无家无业,杀了他们不仅没人在意,大家还乐得省下口粮。

从 13 世纪到 19 世纪,整个欧洲大陆大约有一百万人被当成巫师。而 16 世纪和 17 世纪是迫害巫师的高峰,在德国的某小镇,最多的时候一天竟有 400 人被当作巫师杀害。被迫害的巫师绝大多数是女人——贫穷的女人或寡妇。为什么是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呢? 因为那时候食品最紧缺。

全球气温在 14 世纪初开始下降,到 18 世纪初开始回升,这一阶段史称“小冰川期”,其中气候最冷的时候就集中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虽然女巫自古有之,但对女巫的大规模追捕和迫害发端于 1560 年,正是气候最冷的那段时间,而之前已有 70 年没发生过女巫迫害事件。气候变冷,农业歉收,生存环境恶化,疾病流行。在这个时候杀死那些在食品分配中没有发言权的女人,尤其是贫穷的女人和无依无靠的寡妇,并不难理解。

对女巫的迫害并不限于古代,在当代的非洲也时有听闻。不奇怪,被迫害的女巫绝大多数都来自最贫穷地区最穷困的家庭,而让她们好端端的突然变成巫师的,正是自然灾害。以坦桑尼亚为例,像非洲的很多其他国家一样,这个国家也流行关于女巫的传说。然而杀死女巫的事儿并不常见,在大多数时候,平均而言,每个村子每

13 年才会发生一起处死女巫的事件。可是在干旱或洪涝灾害的年份,处死女巫的数目就翻了一番,而在 1998 这个大灾之年,处死女巫的数目是平时的三倍。

这些女巫是谁呢?几乎清一色都是最贫穷地区最贫穷家庭中的老女人。但这也许还不是最残酷的事实。欧洲被迫害的女巫大都死于陌生人之手,而坦桑尼亚被杀死的女巫几乎都是死于自己家人之手。那些最贫穷的家庭,食品极度匮乏,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能借女巫的名义把家中长者活活砍死。就算偶有侥幸脱逃的,也大多困死于丛林之中,或流落到其他城镇。而一旦背上女巫的恶名,没有人会和她们接触。

农业社会中女人的生产价值有限,每当饥荒来临,就算不被当成女巫处死,也会被以其他方式“优先抛弃”。比如在逃荒的难民队伍中,女童被遗弃而死的概率要比男童大许多。

1935 年山东黄河大水,时任省主席的韩复榘救治有方,广设难民收容所救济灾民,并详细记录被收容难民的资料,编写成《山东黄河水患救济报告书》两册。其中的数据显示,难民中女婴的死亡率是 67%,而男婴的死亡率只有 33%。而且,越是年轻的母亲,越不愿意保留女婴,很显然,这是要把未来的生育资源留给男童,而在灾害逃亡中顺便“扔掉”自己的负担:女婴。

中国女人自古倒霉,没有地位,命如朝露。好不容易熬盼到了新社会,经济发展了,没有大饥荒了,偏偏又赶上了计划生育。一家只能生一个,那生育指标的匮乏造成的对女婴的伤害,恐怕不输自

然灾害。

正常社会中,男女的出生比例大约是 103 到 107 比 100,也就是说每出生 100 个女孩,就会出生 103 到 107 个男孩。男孩的出生数目虽比女孩略多,但男婴比女婴更为脆弱,更容易夭折,而且女性的寿命通常比男性长,所以成年人中男女比例差不多是一比一。1982 年,中国的男女出生比例为 108 比 100,稍高于正常水平,但不算离谱。在那之后,计划生育变得严格,所以到了 2000 年,这一比例成了 117 比 100,而在海南和广东,这一比例高达 130 以上。

130 比 100 是个什么意思呢? 正常比例应该是 130 比 124,也就是说每年每出生 124 个女婴,其中的 24 个就莫名其妙地不见了! 为了让读者对这个抽象的数字有个感性认识,让我来引用苏轼《与朱鄂州书》中的一段话:“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鰥夫。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

上文的基本论点是当资源(或生育指标)有限时,女人因为生产价值有限,被率先放弃。如果这个推论正确,那么当女人的生产价值上升之后,她们的存活率也应该随之增加。

农业社会中,女性的生产价值不大,主要功能是生孩子,而就这一功能而言,所有女人都差不多,所以女性“不值钱”。然而就算农业生产也不是铁板一块,虽然大多数生产都是更需要男人的粗重农活,可在某些生产中,女人比男人更好用。比如采茶,因为茶树低矮茶叶柔嫩,自古就是女人干的活。当茶叶价格上涨时,在那些盛产

茶叶的地方,女婴的存活率就上升了。

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作物比如茶叶和水果的价格上涨,所以很多农民由传统的农作物转行种植经济作物。虽然同时全国都在推行计划生育,但在那些盛产茶叶的地区,女婴的存活率明显偏高,而且教育水平也有提升。然而,这真的是因为女性在茶叶生产中比男性更有价值么?倒也不一定,原因也可能是这样的:因为茶叶价格上涨,所以茶农的家庭收入提高,而有了钱之后就负担得起孩子的教育,也就不在乎生男生女了,女孩的存活率和教育水平就都提高了。

然而研究者发现,随茶叶价格一起上涨的,还有水果价格,而果园的生产和采茶不同,主要劳动力是男性。在那些盛产水果的地方,虽然果农的收入也上升了,但女婴的存活率和教育水平反而下降了。这么一比较,采茶业确实有其特殊性,那些采茶女生存状况的改善,确实源自她们自己的生产优势,而不是靠父兄的仁慈和施舍。

迫害女巫也罢,杀害女婴也罢,这些暴行,都会随着女性生产能力的提高而绝迹。2002年,美国58%的学士学位授予了女性,而同一年,中国在校大学生中的女生比例也占到了44%。

未来是女人的。

注:关于欧洲迫害女巫和气候的分析,来自2004年的论文《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巫术,气候,与经济增长》(*Witchcraft, Weather and Economic*

Growth in Renaissance Europe, JEP), 作者是芝加哥大学的 Emily Oster。关于坦桑尼亚女巫的描述, 来自 2005 年的论文《贫困与杀巫》(*Poverty and Witch Killing*, REStudies), 作者是加州伯克利大学的 Edward Miguel。关于山东大水中难民营的资料, 来自 1991 年的论文《中国饥荒中的生死: 1935 年黄河水灾后的杀婴》(*Life and Death in a Chinese Famine: Infanticide as a Demographic Consequence of the 1935 Yellow River Flood*,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作者是 Swarthmore 学院的 Lillian Li。关于采茶和女婴存活率的研究, 来自 2008 年的论文《消失的女性与中国的茶叶价格: 男女收入差异对性别比例的影响》(*Missing Women and the Price of Tea in China: the Effect of Sex-Specific Earnings on Sex Imbalance*, QJE), 作者是耶鲁大学的 Nancy Qian。文中其他关于中国男女比例的数据, 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 2004 年的出版物《中国社会的女人和男人: 事实和数据》。

谁在打假球

全世界赌球的人可不少,这是个大市场。然而十赌九骗,若想长期取胜,没有参赛球员的配合,难以成事。那么,什么样的球员最可能配合打假球呢?

首先当然是手头比较缺钱的球员,打假球一经披露很可能会毁掉职业生涯,所以如梅西或小皇帝詹姆斯之类的球员,打假球的可能性不大。第二是从技术上讲,篮球运动员可能比足球运动员更容易打假球,这既和赌球的规则有关,也和球员的动机有关。

赌过球的人都知道,赌球很少单纯赌谁输谁赢,那样太容易。一旦劲旅遇上鱼腩,大家都赌劲旅赢,庄家怎么赚钱?所以大多数赌球都是赌比分。比如赌足球,两队若一强一弱,那一般强队需要让一两个球。比如,若开出的盘口是强队让一球半^①,那在最后的比

① “让一球半”而不是“让一球”是为了避免平局。如果只让一球,而结果真是一比零,算谁赢呢?

分中,强队必须赢弱队两个球以上才算赢,否则算输。

对参与赌球的球员来说,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是自己又赢了钱,自己的球队也赢了比赛。比如在上面的例子中,若市场上普遍看好强队赢两个球以上,而强队的队员又参与了赌球,那他们最好就只赢一个球。这样既赢了比赛不损害本队成绩,又赢了市场上那些认为他们会赢两个球以上的人的钱。

但问题在于,这事儿好说不好做。足球比赛瞬息万变,胜负就是一两个球的事儿。强队队员若只想赢一个球,然后在领先一球之后就消极怠工,那火候把握一旦稍有差池,就会被对方扳平甚至反超,那球队就倒霉了。所以,除非赌博金额巨大而且比赛场次无关紧要,否则这么玩儿火的风险可不小。可世上哪儿有胜负无关紧要而赌博金额巨大的比赛呢?是以为难。

篮球便容易些。强队一旦遭遇弱旅,赌博盘口往往动辄就让十几分。这就给强队参与赌球的球员提供了很大的空间。比如你让15分,那我赢个10分就差不多了,而且差距拉到10分之后,控制场面保证别输要比足球容易得多。

所以,一旦篮球比赛强队遭遇弱旅,强队队员参与赌球的可能性就会提高。若这些球员手头还缺钱,那赌球的可能性就更高。那么又是谁最穷最缺钱呢?当然是大学生运动员。以上推理如果正确,那我们在美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强队遭遇弱旅的比赛中发现强队老是放水,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曾经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中观摩过赌球过程。在巨大

的赌场中,赌球的场所是单独圈起来的,其中不准使用任何通讯设备。很多巨型银幕环绕,播放各类体育比赛的直播和比分,供你下注,场面像极了股票交易所。因为赌博是真金白银,所以下注的人往往小心谨慎,比满嘴跑马的侃爷们谨慎得多。这样一来,赌场在收赌注定赔率的时候,就相当于收集了所有赌徒经过精心考虑后的预测信息。久而久之,赌场赛前开出的盘口和赔率,就会极其接近赛后的真实比分。

以足球比赛为例,若你买强队让弱队一球半,而市场赔率只是略高于一赔一(比如你买一块钱,若买中,赌场赔你一块一),那多半事后的比分就正好是 2 比 0。当然不可能做到次次准确无误,但成千上万场比赛放在一起看,世界上没有比赌球赔率更精准的比分预测。

这也是现在流行的一种数据分析方法:用赌博的数据来做预测。各路赌注汇集在一起后,市场上的盘口和赔率就相当于汇聚了所有赌徒的预测后得出的预测。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但比其他预测手段的误差要低很多。比如在 2010 年后半年,赌博市场上有人赌“美国会不会在 2010 年年底之前对朝鲜动武”,赔率低于 0.2。意思是说,你若赌美国会动武,那只需要花不到两毛钱买上一注,一旦最后美国动武了,你就赢一块。为什么赔率这么低呢?因为市场不相信美国会动武。赔率低于 0.2 的意思就是市场认为这事儿发生的概率小于 0.2。反过来,若市场认为某件事几乎确定会发生,那赔率就很高了。比如 2008 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前期,市场上买奥巴马获胜

的,买一注只要差不多 0.51 美元,一旦奥巴马获胜就能赢一块,这说明当时市场认为奥巴马和麦凯恩半斤八两,获胜概率一半一半。可是随着大选的推进,买奥巴马赢的价格越来越高,直到投票前夕,价格大概涨到了九毛多:你花差不多一块买一注,最后要真赢了你也只能拿回一块,没什么收益。也就是说,市场当时已经认为奥巴马一定会赢了。

回到美国大学生男篮联赛(NCAA)上,有人研究了 36000 多场比赛的数据,通过对比比赛结果和赌场上的赔率,发现市场让球超过 12 分的强弱分明的比赛中,强队放水的可能性显著升高。基本的经济道理就如上文所述:强队队员在赌场大幅度让球的比赛中,很容易就能放水而少赢几分,这样既赢钱又赢球,自然参与赌球并放水的可能性增加。

简单地说,研究者从数据里发现了两件事:在赌场让球低于 12 分的比赛中,赌场开出的让球数基本上完美地预测了实际比赛的结果;而在赌场让球高于 12 分的比赛中,实际的比分系统地比让球数低,也就是说胜方的球员们很有可能在放水。

当然,很多人质疑这种说法,他们反驳说:“在领先 10 分以上稳操胜券之后,教练就换板凳队员上了,所以最后实际上赢的分数没有想象的高。”但这种说法不能解释数据中出现的另一种离奇状况。比如说,那些让球 12 分的强队中,很多时候都能赢对手 20 分,这说明上不上板凳队员的关系不大。想想看,强队大比分领先后换人,弱队大比分落后之后难道不也是直接认输换板凳队员么?板凳对

板凳,相对实力应该不会大受影响啊?而在绝大多数时候强队都赢的比 12 分少,却基本上从来不赢 13 到 16 分。也就是说,围绕着赌场上这 12 分的赔率附近,有一些异常的现象出现,似乎只能用打假球来解释。至于为什么是 12 分,而不是 9 分 10 分,我想可能对大学生联赛的年轻球员来说,三个三分球的差距和四个三分球的差距,是一道心理上的坎儿吧。

又有人问了,既然你认为赌场的预测那么准确,它们怎么没预测出有人打假球呢?如果他们已经预测到有人会打假球,那盘口应该做进一步调整啊?如果这种调整也是有效的,那最后的比赛结果还是应该和赌场的盘口一致啊?

这是个好问题。我能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参与赌球的人系统地低估了球员造假的可能性。毕竟,体育比赛内幕重重,而且由于竞技体育的特殊性,很难找到确定无疑的证据来证明球员在打假球,毕竟谁都有不在状态的时候。就算在媒体高度发达的美国,体育丑闻也很罕见,普通民众对复杂的情况估计不足,也是有可能的。

当然了,也许世界真的很美好,体育竞赛真的很公平,真的没人打假球。不过我想中国的球迷,肯定没有这种幻觉。

注:关于 NCAA 打假球的研究,来自 2006 年的论文《比分放水:NCAA 篮球的腐败》(*Point Shaving: Corruption in NCAA Basketball*, AER),作者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Justin Wolfers。

他来自街头

作为一名研究社会科学的学生，我向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杰出的黑帮研究者，素德·文卡特斯（Sudhir Venkatesh），致敬。

张五常曾经写过一篇短文叫《学术上的老人与海》，讲学术研究不易而学术生命短暂，三下两下就已薄暮西山，所以应该全力投入“搏一尾大鱼”。但大鱼岂是易与？我想文卡特斯就是那老人，扑的是大鱼，搏的是性命。他为了研究芝加哥黑帮，用六年的时间混迹芝加哥街头黑帮，从老被人欺负的中产阶级家庭好孩子书呆子变成芝加哥贩毒第一大帮龙头们聚会的座上常客，从第一次目睹暴力斗殴事件害怕到呕吐到从黑帮枪战的流弹下救人，从害怕黑帮混混到开始害怕警察，从懵懂无知幼稚可笑的呆研究生变成名满天下的黑帮研究权威。20年后的今天，文卡特斯教授终于出版了自己那段诡丽奇异的经历——《黑帮老大的一天：一个玩儿命街头的社会学家》

(*Gang Leader For A Day: A Rogue Sociologist Takes to the Streets*)。

从2005年读《魔鬼经济学》中得知文卡特斯教授其人其事之后，就一直盼望着他能将自己的经历出书。四年后终于拿到成书，几乎一气读完。六年时间记录的芝加哥底层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娓娓铺开：沉毅机智将自己幻想成社区保护神的黑帮老大，边贩毒边攒钱读书希望有朝一日脱离黑帮但终于身死狱中的年轻黑帮财务主管（《魔鬼经济学》中那篇黑帮经济学的数据就来自这位主管，他在对自己的命运绝望之后将手里的黑帮财务记录交给了文卡特斯教授），老谋深算有时狡猾毒辣但用尽全力保护社区中妇女儿童的贫民窟房屋主管老太太，为抚养孩子不惜和任何人睡觉的年轻黑人母亲，喜好洗劫黑帮成员随意欺压黑人的警察，各色流落街头在夹缝中挣扎的流浪汉……比任何的小说电影更加真实精彩。而作者，本来作为一个客观的观察记录者，后来也不由得深陷其中。就像一直罩着他的黑帮大哥反复说的那句话：“在这个世界里，记住，你不是我们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

书中精彩的段落层出不穷，而书名则来自于作者在一次早餐时随口和黑帮大哥 J. T. 开的一个玩笑：“我觉得你挣钱太多太容易了，你的工作也太容易了。你总是和我说你工作多辛苦多艰难，但我看到的不过是你开着好车在街头闲逛，和人握手打招呼，和朋友开派对。”J. T. 于是说：“哦，是吗？如果你觉得容易的话，你来试试？”在随后属下来汇报今天一天需要做的十几件事的时候，J. T. 把决定和

处理权都交给了作者。都不是什么杀人放火的犯罪事件,全是处理各种看似鸡毛蒜皮的小纠纷,但背后却是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厉害考量。果然,作者一件都处理不了,最后还都是 J. T. 出手搞定。这黑帮老大的一天,可真不容易,看过电影《教父》的人,都知道那是项高技术活。

我曾经一个人站在芝加哥大学附近的黑人区里等公车,那里破败不堪,周围全是四处游荡看上去无事可做的黑人兄弟,让人感到紧张。而现在读着他们的挣扎和悲欢离合,想象着从这样一个让人绝望的社区中走出的第一位黑人总统,很感慨。

希望这本书能早日翻译成中文。^① 为了表达对这份记录的深深敬意,我这里翻译一段。作者当时在教几位黑人年轻妈妈写作,讨论“我如何生存”这个话题,全世界的穷人都一样,读来让人心酸。后来的故事是作者被怀疑和这些姑娘们睡觉,被她们的男友们唾骂谴责,要不是有黑帮大哥罩着多半早已喋血街头。

以下为翻译

====
(部分需要阅读其他部分才能理解的内容省略)====

本周写作的主题是“我怎么活下去”。坦雅第一个朗读她的作文。她 20 岁,高中辍学,有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她和妈妈

① 该书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译名《黑帮老大的一天》。

住在一起,但最终她在那幢大楼里有了自己的寓所,并在那里生下了第二个孩子。第一个孩子的父亲早就不知所终,第二个孩子的父亲死于街头火拼(译者注:这里的每一个女人生命里都至少有一个男人或者火拼被杀或者在蹲监狱)。她在文章中炫耀说自己通过让人暂住在自己公寓而赚到了比福利救济金多两倍的钱。(译者注:这幢大楼的公寓可不是大家在美剧里看到的那种又漂亮又舒适的。几乎每一所都破烂不堪,没水没电,几家人通常要共享一个洗手间、厨房或冰箱)

“事情可不是总这么顺啊。”另一个女人萨利娜说,她在讨论中喜欢充当理性的角色。她说话时俯视着坦雅。萨利娜有三个孩子,而三个父亲一个在监狱,一个死了,另一个不肯付赡养费。她自己 also 靠让人暂住在自己公寓来赚钱。“我记得我兄弟住进来的时候,开始在房间里卖粉,最后被抓了。我的租约也差点儿完蛋。”

“哦,但那是因为你自已没给够大楼管理员钱,”坦雅说,“要不就是你没跟他睡!”

“嘿,这两件事儿我可不稀罕做。”萨利娜摇着头,语气里颇有些道德优越感。

“你挺行啊,”凯莎打断她。“萨利娜,不管哪个男人来看,你都把屁股撅过去。”凯莎 26 岁,是这个讨论小组里年龄最大的人之一。她在这个组里作文写得最好,有两个女儿。她高中毕业,现在正在计划申请罗斯福学院。“都是扯淡,妓女卖尿和你为了钱把男人领进家门没区别。”

“嗨，那是生活逼的！”坦雅说，“这不正是我们在这儿说的吗，对吧？”

“行了，”我插嘴，试图让讨论有点儿秩序。“不管你们需要什么，你们认为最好的得到它们的方式是什么？给我说说你们生存的十大技巧吧。”

萨利娜第一个说：“一定得在房管会有认识人，这样在你付不起房租的时候就能找他。这个管用，要不你就得被赶走。”

“嗯，要是你非得和城里的某个黑鬼睡觉不可，那就得睡，”凯莎说，“因为如果你不睡，他们就会把你孩子弄到街上去和他们鬼混。”

萨利娜没理会凯莎，接着说：“你得保证能给孩子找来衣服，食品，和尿布。就算你没钱你也得把这些东西弄来，所以一定要和杂货店搞好关系。”

“还有，要保证给房管那老女人弄来鸡巴。”凯莎大叫，然后大笑起来。

“唉，有一次我不得不让我男人和她睡一晚上，这样她才没把我踢出去。”夏泰儿说。

“真硌应。”我说。

“是啊，”夏泰儿说。“我男人和我也快过不下去了。那老女人能给他份儿工，让他有地儿呆还让他在她家吃东西。”夏泰儿 21 岁。她儿子有学习障碍症，所以她正在拼命给他找一所能帮他的学校。她在快餐店有份儿零工，她妈和她祖母给她带孩子，也贴补她娘俩

儿的生活。

（接下来两段分析那老女人的权力，每个人都得服从她，因为这个住房体制本身充满了讹诈和腐败，无人可以帮她们只能认命，略过）

女人们的生存技巧可远远不止十条。家里得存着烟，这样家里东西坏了让一些流浪汉来修的话，可以用这个顶钱。让小孩儿在楼道里撒尿，这样妓女们就不会在晚上聚在家门口。家里给黑帮藏毒品和现金，这样他们也能付点儿钱给你（女人们都说，被搜查的可能性很低）。

不管什么东西，最终都能用身体做交易：和西班牙商铺主睡，和房管的人睡，和发放福利的小官僚睡，为了监狱里亲人的特殊待遇和警察睡。女人们说起用性当钱的时候观点都一致，非常现实：如果你孩子有可能挨饿的话，不管做啥都要解决这问题。当她们说起用身体来交换这些必需品的时候，表情都很难过。很明显，这不是她们的首选方式，连第一百个选项都不是。

“一定得认识医院的人，”坦雅突然说，“一定得有某个人的电话，因为救护车从来不来这儿。就算你到了医院，你也得认识人才能给他们钱，否则你得排队排死！”

“没错，医院的人还能给你些免费婴儿食品，”萨利娜说，“一般你得到医院后门找他们。还有，万一你男人开始揍你的话，你得在家里藏把刀或者枪。因为有些时候你得拿点儿东西让他停下来。”

“你以前用过刀？”我问。她们以前从来没说过这件事儿，“用过

几次？”

“很多次！”萨利娜看着我，好像我是火星人。“当这些男人开始喝酒的时候，你没法和他们说话。你只能保护你自己——别忘了，他们也打孩子！”

这时凯莎开始哭。她把头埋在膝盖中间，用手抱头，不让人看见。萨利娜靠过去抱住了她。

“最轻松的时候就是他们睡着的时候，”坦雅说，“他们躺在那儿，大多数时候是醉过去了。那时候你就开始想‘在这儿做个了断吧。现在就杀了那个狗日的。这样他就不能再打我了’。我这么想过很多回。”

凯莎擦了擦眼泪：“我捅了那个黑鬼，因为我再也受不了了。没人帮我。那老女人说她没法帮我，警察也这么说。这男人动不动就打我，打我孩子，丝毫没有理由。我想不出其他办法，没其他办法……”

她又开始抽泣。萨利娜护着她去了洗手间。

“她把她男人弄进了医院，”坦雅平静地解释道，“差点儿弄死他。那天晚上他睡在沙发上——这之前他已经好几次把她弄进医院，打断她肋骨，她全身都是缝口和伤痕。她提了把刀，一直往他肚子里扎。他醒了，跑出了公寓。我觉得是J. T.的一个小弟送他去的医院。他是帮会里的人。”

因为这男人是帮会里的老混混，坦雅说，J. T. 拒绝劝他停止毒打凯莎。所以凯莎一直活在恐惧中，害怕这男人哪天回来。

第三辑：少迷多思

权威的意思是不思考——不需要思考。权威就是无意识。

——乔治·奥威尔

逻辑和因果

在我看来,分析和思考的第一重困难便是把客观分析和价值判断混为一谈。这个困难往往会困扰人一生,因为人总离不开道德和价值判断,但分析却要求把这些个人判断丢在一边,这很难。比如我的一些女性同学虽然已经受过很多经济学训练,但对关于婚姻的冷冰冰的经济学分析依然很抵触,认为那里没有“爱情”,没有“价值”,都是胡说八道,这是让价值判断左右了客观分析。

经济学家常常也分析社会问题,比如毒品、离婚、色情业、战争等等。而分析的唯一目的是想知道“为什么”,这和他们到底“好不好”、“道德不道德”毫无关系。事情发生必有原因,经济学给寻求这种原因的人提供了一种视角(只是一种视角,不是唯一视角)。个人的行为,时时会带有道德判断,然而想分析任何问题,必须要不偏不倚不带个人偏见,不预设道德立场,这是两回事。分不清楚,便无法深入思考,因为道德代替不了理智,而后者才是分析思考的必备

条件。

不管中华文化多博大精深，这文化缺少科学传统。张五常洋洋洒洒三大卷的《经济解释》以“科学的方法”开头，含有深意。第一卷《科学说需求》的第一章《科学的方法》是很好的普及科学观念的读物，只有十几页，共分八节，分别是：现象必有规律；事实不能解释事实；特殊理论与套套逻辑；可能被事实推翻的重要性；模糊不清与互相矛盾；非事实与无限制；理论的真实性和结论。

这里说说关于“逻辑和因果”最常见的两个困难吧。

第一，前提错了，结论不一定错。

常常听到人们争论：“你的前提（或者假设）错了，所以你的分析满盘皆输，结论站不住脚，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建立在你的前提之上。”听起来很好很强大，但这里的逻辑是错的。

从前提到结论，虽然中间的逻辑推理确实是建立在这些前提之上，但前提错了，结论不一定错。这里引用一个张五常老先生常举的简单例子说明一下。我们说：“如果下雨，天上就有云。”这个命题的前提是“如果下雨”，结论是“天上有云”。如果这前提不成立——“如果不下雨”，结论就不成立了么？“天上就没有云”了么？这当然不对，还有不下雨也有云的阴天嘛。所以从逻辑上讲，前提不成立，结论不一定不成立。

正确的思路是这样的：从前提推出结论，倘若中间的逻辑推理没有错，那么如果结论错了，前提就一定有问题。实际上我们在初中代数课上便学过这条最重要的逻辑：“命题成立（下雨就有云），逆

命题(有云就下雨)不一定成立,否命题(没雨就没云)也不一定成立,但逆否命题(没云便没雨)一定成立。”

回到上一个例子,我们说“如果下雨,天上就有云”。这个命题的等价表述是:“天上没有云,就一定没有雨。”我们可以用这个等价命题去验证这个命题的含义是否正确,从而判断前提是否合理。

所以遇到一个分析,如果你想反驳它,可以暂先不要管前提,先从验证它的结论入手。可问题在于,我们怎么判断“前提”、“结论”是对是错呢?这就要求理论的核心前提和主要结论都必须是“可以观测并且验证”的。前提和结论都还没有被验证的理论也是有的,比如很多理论物理学的理论,但目前没有验证是因为技术条件不允许,但这些理论起码在原则上应该是可以验证的。

第二,判定因果关系不容易。

并不是每个命题都涉及“因果关系”,我说了“天上下雨就有云”,我可没说“下雨是有云的原因”,你自己据此非要联想到天庭之上,比如“云公永远像一条发情的公狗跟着美丽的雨母屁股后面跑”的凄美爱情故事,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

一件事发生在另一件事之前,也不代表先发生的就是原因。“鸡叫”然后“天亮”,“鸡叫”不是“天亮”的原因。

判断因果关系很不容易。晚上回家,按电灯开关,灯亮。我问:“‘按电灯开关’是‘灯亮’的原因么?”你说:“你有病吧?”我死缠烂打:“如果你每次按开关灯都亮,我就相信按开关是灯亮的原因。”于是你连着按了一千遍,次次都行:“这还不是原因么?”你已经不耐烦

了。我变态地要求再按一次，你一按，灯闪坏了，“因果链条”便崩溃了。

所有关于因果关系的判断，都“假设了其他条件不变”。比如开关和灯亮之间的因果关系，就至少假设了开关和电灯都没坏以及有电。若这些前提条件变了，因果关系可能就完蛋了。比如我读本科你读博士，后来你工资比我高，能据此判断说“念博士”是“工资高”的原因么？不能。因为真实的原因可能是我老爹在乡下务农而你家老爹是银行行长，所以你工资高可能和你的博士头衔一点关系都没有。要建立学历和工资之间的因果关系，起码还要假设家庭背景相似。

自然科学常常用实验数据来验证因果关系，这在原则上非常简单（虽然“实验”本身有时需要非常复杂的技术）。如果科学家认为 A 这个因素是 B 发生的原因，那他们就可以控制实验环境，保持所有其他条件不变化，单单让 A 变化，如果结果发现 B 也变化了，那就可以说 A 变化是 B 变化的原因。

社会科学数据与自然科学数据最大的不同在于：社会科学绝大多数数据不是实验数据，而是观测数据。比如国内生产总值（GDP），比如学生考试成绩，这些数据都不是做实验做出来的，而是靠观测得到的。

要从“观测数据”入手分离因果关系就非常困难了，你说一个学生考试成绩好，是因为他学习用功呢还是因为他天生聪明呢？还是因为他运气好呢？还是因为他事先偷了考题呢？再比如：我看到一

个人站在镜子面前，镜子里是他的影像，他和他的影像总是同时移动。于是我问：是影像带动人动么？是人带着影像动么？是某种外力使得人和影像一起动么？为了得到结论，我反复观察，可是每次结果都是他们一起动，就算观测无穷多次也得不出问题的答案。使用“观测数据”的困难，就是仅靠观测本身，我们看不出因果关系。

再多举一个例子。有两个高中，“好高中”的学生成绩好，“差高中”的学生成绩差，那么是什么造成这种差异呢？有三种可能的解释。第一，两所学校的学生能力不同。好高中的学生比差高中的学生聪明，或者好高中的学生家庭条件都比较好，从小受的教育就好，当这些好学生聚在一起，成绩自然就比差学生扎堆的学校成绩好。第二，两个学校的学生能力都一样，但好学校的老师啊教学设备啊都好，所以学生成绩好。第三，两个学校的学生整体能力差不多，硬件设备也差不多，但是“学风”不同。好学校的学生都和学习好的同学比超赶帮，而差学校的学生都喜欢和成绩不好的同学浪迹街头，所以整体成绩就差。

这三种原因的含义很明显不同，如果是第二种原因，那提升差学校的教育就很容易，换老师和硬件就行了；如果是第三种原因，那就可以帮助一部分差学校的学生，让他们成绩提升，然后带动“学习气氛”；但如果是第一种原因，那外部的改革就很难有效果了。

问题在于，当你只观测到好学校的成绩比差学校的高时，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原因呢？也许三个因素都有，同时起作用，如何能分离开呢？可见想从数据中分离因果关系，很不容易。

总结一下:任何科学的命题,必定长成这个样子:“如果 A,那么 B”。A 错了,B 不一定错;但 B 错了,A 一定有问题。所有的科学判断都是这种“条件”句式,谨慎小心且带有局限性。要验证这个命题正确与否,很不容易,而在社会科学难以做实验的条件下,就更不容易。所以,对社会科学感兴趣的人,不应该轻易地接受任何结论或主义,要小心谨慎,多从不同的角度想问题,把想到的结论和现实多多对比,才可能对思考有益。

注:最后一部分关于好高中和坏高中的例子,来自 2003 年的一本书《社会科学中的识别问题》(*Identification Problems in the Social Sciences*),作者是西北大学的 Charles Manski。

顽固的脑壳

人的思考过程往往带有各种偏差,这里讲其中常见的三种。

故事一:直觉

有个问题是这样的:某女,31岁,单身,外向,聪明伶俐。大学时主修哲学。做学生期间,非常关注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公正问题,并参与了“反核游行”。以下八种对该女的描述中,你认为哪一种最可能对(概率最高)?请按照这可能性由高到低排序。

A. 她是小学老师; B. 她在书店工作,平时还练瑜伽; C. 她是活跃的女权主义者; D. 她是社工,做心理辅导; E. 她是“女性投票者联盟”的成员; F. 她是银行出纳; G. 她是卖保险的; H. 她是银行出纳,并且是活跃的女权主义者。

在很多人的答案中,H项排在了F项前面,但是没人把H项排

在 C 项前面。

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 H 项不过是 F 项和 C 项的合并,逻辑上,“既是银行出纳又是活跃的女权主义者”的 H 项概率绝不可能大于 F 项。

在日常生活中也有类似的现象。当某人向你讲述一件事时,他讲的细节越多,你越容易相信他讲的是真的。但是,细节越多,也意味着这些细节同时发生的可能性越小,所以他讲的事越不可能是真的。

这则故事常被用来说明古典概率论无法描述人类的决策过程,在起点和直觉上就可能错得离谱。这个实验是 Tversky 和 Kahneman 在 1974 年做的,后者后来在 2002 年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前者本来应该分享这一殊荣,可惜没能活到得奖那天。

故事二：固执

某人不知道电视机的工作原理,他相信那个小盒子里肯定有许多小人儿,不停地在做高速运动来更换图像。这时候来了个工程师,一点点向他解释电视机的工作原理,频谱啊,发射接收啊,信号扩大啊等等。工程师讲得生动浅显,这个人也听得很认真,每一步都使劲儿点头。最后,这人觉得很满意,认为自己完全明白了电视机的工作原理。他说:“但是我觉得说来说去,也就是说那小盒子里其实只有很少几个小人儿,对吧?”

这个故事更像个笑话,不过它揭示了一个道理:第一印象是很

难改变的。第一印象一旦形成就很难彻底消除,以后就算接受了新信息,也往往不过是基于这第一印象进行调整。用现在流行的术语,这叫“锚效果”,第一印象就像一只锚,一旦抛下,很难撼动根本。用贝叶斯的理论说,如果这第一印象(先验概率)很强的话,要消除它或者大幅度地修正它,需要很多很强的新信息。

举个例子,法庭在进行审判的时候,如果犯罪嫌疑人面相凶狠,给法官和陪审团留下了很不好的第一印象,辩方要翻案的困难就会加倍。所以诉方通常一上来的策略就是把嫌疑人描述成一个恶棍。而嫌疑人要正装出庭不止是因为尊重法律,也是希望尽量消除在外表上的差异,避免偏差的第一印象。

这个故事转述自理论物理学家 Garrett Lisi 的小文章《人不是有效的推理引擎》(*We Are Inefficient Inference Engines*)。

故事三:谋杀

在审理谋杀案时需要大量证据,很多时候要利用逻辑推理来在这些零散的证据之间建立因果链条,也要用统计数据来增加说服力,而用错数据和推理,结果可能是致命的。

20 世纪 90 年代,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杀妻案轰动美国,各种证据都似乎证明凶手就是辛普森,而最后辛普森的“梦幻律师团”帮助他成功脱罪。林达曾用了半本书来讲这个故事,主要讲这个案子的审理程序,说明当国家机器想给个体定罪是多么容易,个体是多么无助,所以那些必要的法律程序每一步都疏忽不得。

但是林达没有讲下面这个故事。

为了证明辛普森有罪并给陪审团留下他杀妻的印象,检方举证说辛普森之前有家庭暴力行为,而“扇耳光是谋杀的前奏”。但辛普森的辩护律师说,检方不过是在误导陪审团。辩护律师说:截至1992年,美国每年有400万女性被丈夫或男友打过,但是根据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其中只有1432人被丈夫或男友杀死,这概率大概二千八百分之一。怎么能用这么小的概率来推理呢?

这个辩护看起来很有说服力,但实际上完全与案件无关。问题根本不在于打过女人的男人有多大可能性杀死这女人(这概率,如上所述,是 $1/2800$),而在于被打过且被杀死的女人中,有多少死于打过她的人之手?这后者的概率,根据1993年的美国犯罪报告,是90%。在辛普森案中,检方从来没提起过90%这个数字,显然中了辩方的招。

换句话说,如果这女人被男人打过,但还没死,我们推断她被打死的概率是 $1/2800$,这没错。可如果这女人已经死了,那她的死亡就又提供了新的推理信息,给定她已经死了,那她死于打过她的人之手的概率,就是90%。

90%这概率听起来挺大,其实也正常。在美国75%以上的谋杀案中,凶手都认识死者。毕竟,无怨无仇而杀人的人,是少数。

这个推理听上去有些绕,让我再多举一个例子。

现在桌上有两把左轮枪,一把里有6颗子弹,一把里没有子弹,但你不知道哪把有子弹。你想自杀,从中挑一把朝自己开一枪,如

果挑中那把没子弹的就死不了,如果挑中那把有子弹的就必死无疑。所以在没开枪之前,你死亡的概率是 50%。但如果你拿起其中的一把朝自己开了一枪,发现自己没死,你就知道如果拿同一把枪再开一枪打死自己的概率是 0,因为第一枪没打死自己这个事实,为你的推理提供了新的信息——你知道你拿的是空枪。

稍微再复杂一点。现在桌上只有一把左轮枪,你知道里面有一颗子弹,朝自己开一枪的话,死亡概率是六分之一。如果你打完一枪之后没死,那下一枪打死自己的概率会加大到五分之一。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这支枪里有几颗子弹或可能干脆就没有子弹,你开完第一枪没死,你就知道再开一枪打死自己的概率变小了,因为头一枪没死这件事儿,就说明了枪膛里有很多子弹的概率很小。这个逻辑推到极致就是上一段中的故事,你不知道你拿的是空枪还是上满了子弹的枪,所以在开枪前你预计的死亡概率是 50%,可一旦开枪后安然无恙,你就知道这枪是空枪,再开一枪打死自己的概率是 0。

我做过两学期初等概率论和统计学的助教,讲辅导课时,条件概率和贝叶斯定理很难教。这些概念和推理是合乎逻辑的,但它们和人类直觉相悖,人通常不这么思考问题,人很容易被愚弄。

那个辛普森的故事来自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 Leonard Mlodinow 的畅销书《醉汉走路:随机性如何左右我们的生活》(*The Drunkard's Walk: How Randomness Rules Our Lives*)。

尾 声

当辛普森脱罪之后,几乎所有的老百姓都认定他就是杀人犯,因为证据实在太多了,但大众也都尊重法律,接受陪审团对他无罪的判决。林达认为这是文明社会的表现。而对研究人类“决策行为”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经济学家 Itzhak Gilboa 而言,类似的事件有不同的解读:每个人都坚信嫌疑人有罪,而每个人又都接受法庭判处嫌疑人无罪,并认为这判决遵守程序而合理,这个区别,类似于贝叶斯决策和经典统计学的区别。这也是为什么在贝叶斯理论大行其道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学习那个经典的大数定律。

专家的意见

“专家”在中国几乎是个贬义词，除了“经济专家”一向是贬义词之外，还有宣布地震不可预测的“地震学家”，得出与民间流传版本不符的调查结论的警方“刑侦专家”，等等。各种专家言论，招来各种飞砖，非常热闹。

关于如何对待“专家意见”，我有如下专家意见：

第一，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会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观点，因为他若不愿意相信，就基本不会认真思考，更别提接受了。“兼听则明”是句格言，而“格言”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饿了就吃，困了就睡”这句话成不了格言。

第二，为穷人代言的专家和为富人代言的专家同样可耻，为政府说话的专家和为老百姓说话的专家同样不道德，真正的专家只为自己的专业知识说话，只为他坚信不疑的事实和学科逻辑说话。但事实和学科逻辑可能出错，所以任何科学家和科学理论都可能错。

但只要专家是出于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做判断,那无论事后证明他是对是错,他都没有对自己的专业撒谎。

第三,有人说“没有良心的专家不如一条狗”,如不如一条狗我不知道,但没有良心的专家仍然是专家。因为专家和普通人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良心,而在于是否具备专业知识。传说中的雷锋道德高尚,但如果他非要给你做手术的话,你会落荒而逃。你信任他人品么?当然信任!你信任他医学知识么?当然不信任!专业知识就是专业知识,不会因为它是否被用来造福社会而增减半分它作为“知识”本身的价值。

判断立场比判断知识要容易得多。迅速识别好人和坏人是我们从小就没间断过的训练,而识别谁是有道理的谁是没有道理的,是我们从小就没怎么见过的训练。那么自然的结果就是:说“地震不能预测”的专家都是没有良心的,说“地震可以预测至少可以提前××分钟预测”的专家都是有良心的。进一步,站在权贵立场的专家都是没良心的,站在老百姓立场的专家都是有良心的。

任何科学家,当他评说一件事的“好坏”时,他就已经超出了自己的专业,也就是说,他说的是个人看法而不是专业意见,因为几乎没有任何科学是研究“好坏”的,科学的世界里只有“为什么”和“怎么办”。但是,科学家也是人,在他们不谈论科学的时候,他们也经常会评判“好不好”。所以,当爱因斯坦站出来反对原子弹的时候,他不是作为最伟大的科学家来证明原子弹不科学,而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反对,这和刘德华站出来反对原子弹没有差别。

比如说 2008 年厦门的 PX 化工厂事件,化工项目永远是有风险的,所以化工专家和院士们需要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来评估风险的大小。但在评估风险之后,对是否能建和建了之后好不好的论断,都不属于他们的专业范畴。因为全方位的成本收益分析不是这些化工专家的专业。我个人的经验是,很多优秀的科学家对成本收益的看法非常不靠谱。

最后厦门政府在民众的反对声中终止了该项目。这件事情的意义不是“正义的专家”战胜了“御用专家”,而是公开的争论和最终决策过程中考虑的民意。民众的反对意见可能错了,可能让厦门损失巨大,我们无从证实这一点。但在这件事儿上,政府对了还是民众对了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这是厦门人的家,厦门人有权反对建立化工厂,就算损失惨重他们也愿意,政府必须尊重这一点。

第四,对于“不明真相的群众”,判断专家意见正确与否是很难的。但有一条标准可以用,这条标准是判断专家意见是否专业的必要条件。这标准是:任何真正的专业知识,都应该是这样表述的:在怎样的条件下,会发生什么;而在另外的条件下,这可能不会发生。

举个例子,刑侦专家说:基于各种具体的迹象(这里应该有详细的尸检的描述),我们认为××确是溺水而亡。这就具备了专家意见的必要条件,但它究竟对不对,是不是真的,对不起,老百姓只能自行判断。相信不相信,与这意见正确与否,没有关系。

第五,专家学者,在理想的社会中他们应该活在象牙塔里,不食人间烟火,衣食无忧,既不鸟政府也不鸟群众,只为真理服务。“路

见没道理一声吼”那可能值得称道,但“不理不睬”也算是本分。因为现实世界运转自有其力量,要说专家学者为谁谁谁代言就能改变些什么,那简直是太藐视世界也太瞧得起专家了。

但现实社会不是理想社会,大部分专家要为饭碗担忧,想靠自己的知识给老婆孩子求个荣华富贵。可惜除非遇上好买主,“知识”本身从来不值钱,所以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利益代言人”。一旦下决心出来卖,自然优先选择帝王家,银两和黄马褂可比什么“民意和良心”实惠多了,反正都已经无耻在先背弃自己的学术规范了嘛,为什么不干脆卖个好价钱呢?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出来“代言”的专家大多数是为政府和富人服务的。老百姓其实也没什么好愤愤不平的,出不起价钱嘛。

市场上这类为谋取私利的杂牌专家一旦多了,整个专家行业信誉就很差了。而我们的教育系统偏偏缺乏“独立思考”这门儿课,所以识别“假货”就更加艰难。但识别好人坏人依然是容易的,“和自己一伙儿的就是好人,和敌人一伙儿的就是坏人”呗。一旦把专家的结论预先划分了立场,他们说什么就不再重要了,反正你也只能听到你想听到的。

性别与语言

让我先用三个小故事来讲讲男女思维的差异。

故事一：男人接到老同学电话，说周末过来出差，好久不见，聚聚。男人说：“行啊哥们儿，没问题。住我家，咱哥俩好好聊聊！”老同学欣然应允。男人回家和女人说了这件事儿，女人有些不快：“你怎么不和我商量商量啊，我什么事儿都和你商量后才做决定。可你总这么自作主张，你心里有没有我啊？”男人也有些不爽：“那我总不能和我哥们儿说我得问过我老婆之后才能决定吧？”女人生气了：“问老婆怎么了？我们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商量事儿，每个人都会说要和老公商量商量啊！”

故事二：男女在街头闲逛。

女人问：“你想看那个××电影么？”男人：“不想。”于是二人继续前行。

回到家里，女人抱怨说：“你从来都这样，一点不关心我的感受，

我想看那电影!”男人:“我靠,我说你怎么总是这样?! 你想要什么能不能直说?!”

故事三:女人很不耐烦,总觉得这男人怎么回事儿,一件事和他说了好多回,就是光说不做,还得说多少回啊?! 男人更不耐烦,总觉得这女人怎么越来越唠叨了……

类似的故事我可以再讲几百个,相信每个经历过两性关系的男女都有切身体会。两性之间的沟通常常出现问题:“你怎么死活就不明白啊?!”更要命的是,双方都认为自己的语言和行为模式是正常的,而对方“不正常”肯定是有某种原因的。女人倾向于认为男人和自己不一样是因为“他不够关心我”,而男人倾向于认为女人和自己不一样是因为“她老想控制和改变我”,于是起了冲突,然后就是每个人都熟悉的无数经典争吵场景。

成熟理智的人慢慢地会学会接受这种男女差别,不再尝试强行让对方适应自己。满足现状,能沟通就沟通,不能沟通就沉默是金,否则说多错多。但在汲取教训的基础上被迫接受并不代表真正理解,依然糊里糊涂沟通不畅。我自己虽然标榜理性和沟通,但也常常觉得过去的经验支离破碎,简单地说“男女有别”算不上是什么理解,所以我一直想找到一个角度帮助我阐释这种经验,把所有的支离破碎串成一副明确的图景。女社会语言学家 Deborah Tannen 就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清楚的视角,世界一下明朗了许多。

她的理论非常简单:男人思考和说话时,第一角度是上下高低的等级观;而女人在思考和说话时,第一角度是远近亲疏的平行观。

这不是说男人从不考虑远近亲疏而女人从不考虑等级,而是强调不同性别有不同的“第一视角”。

任何的分析都有个起点,让我们先不去探究为什么会有这种角度的不同,而是先接受这种角度,试试它能否帮助我们理解现象。

从这个角度出发,面对任何场景,男人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在其中的“独立位置”(status),而女人首先考虑的是“关系的强弱和远近”(connection)。所以男人更倾向于寻求“独立”(independence),而女人更倾向于寻求“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这种第一视角的不同,带来了对于同一事件的不同解读。不一定是相互误解,但确实是不同的解读。

故事一里,男人的行为是在寻求自己的“独立决定”能力,而女人则认为这种行为首先拉远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和“独立”、“权威”,或者“面子”扯不上关系,因为她认为就算商量了,她也一定会同意的,没什么好丢面子的。故事二里,强调“相互关系”的女人总是试图先试探商量,结果也许不重要,但商量这一行为本身就会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所以事无巨细总爱先商量。而男人对这种无论多琐碎的小事都要讨论的行为很不耐烦,认为有损他的“独立位置”。故事三里,强调“联系”的女人认为男人没做事是因为“联系”还不够,所以继续加强“联系”;而男人认为这种不断加强的“联系”是一种外力,在干扰自己的“独立位置”,为了突出自己的独立性,本能的要拖延一下,让自己最后的行为看起来像是自己的选择,而不像是在执行女人的命令。

这个理论当然很简化,但很有用。就像经济学全部的精义就一句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乍听没什么稀奇,好像常识,但如果能一以贯之地用这个角度看所有的问题,理论的力量就会慢慢显现。在所有的狂热和不理性中能看到“不免费”,总能看到成本,那常识就会变成清醒。在所有的大事小事中都能看到成本,用这个角度去分析,那常识很多时候就会变成深刻。同样地,把这个“位置和关系何者为先”的角度贯彻到底,能帮助我们理解很多事情。

再举两个例子吧。

我个人的经验中,最让我迷惑的是女人们对安全感的强调,而我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不能提供安全感的人。这让我很迷惑,因为我认为安全感只能是自己给自己的,把这种感觉交给别人的行为本身就非常不安全。而现在我知道,男女各自理解的安全感完全是两个概念。我的安全感首先强调的是有自己独立的位置,不在重大事情上依附任何人,有独立决定和行动的能力,而这一切当然要靠自己给自己。而女人的安全感首要强调的是关系的亲密程度,要在各种事情上建立坚固的关系,通过紧密的关系来应对外部世界,预测对方的行为,所以关系的疏远,交流的不畅,以及行为的不可预测等等都会带来安全感的丧失。对女性而言,就算是寻求到自己的独立位置,安全感也仍然来源于巩固的关系。

另一个例子来自男女离婚后的不同感受。婚姻双方在离婚后,一般都会表示自己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解脱了。但是,到底是从什么中解脱了呢?这个答案男女有别。女人们说:再也不用担心丈夫

对自己行为的反应,同时再也不用担心自己对丈夫的行为该怎么反应了。而男人的回答是:感觉不受束缚了,不用好像每天被关在家里了,责任也轻了。由此可见,女人的婚姻负担是内在推动的,总是要担心怎样建立和丈夫的种种联系,怎样回应对方的行为。而男人的婚姻负担是外部给予的,是强制性的角色扮演以及行为受束缚后的种种不快。

这样看来,不同话语方式的交流就像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交流,也难怪,words(语言)和 worlds(世界)长得很像。每个人都想找个能倾听自己的人,有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爱上了男主人公,原因只是因为他有一双巨大无比的耳朵。但是倾听不等于理解,希望精彩纷呈的社会语言学杰作《你误会了我:交谈中的男人与女人》能帮助你理解对方,从中也理解自己。书里无数个生活场景我都似曾相识,相信你也是,因为那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男女的差异是跨越文化和国界的。

注: 这里推荐的书《你误会了我:交谈中的男人与女人》(*You Just Don't Understand: Women and Men in Conversation*), 作者是美国乔治城大学杰出的社会语言学家 Deborah Tannen, 中文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出版。书名翻译得不够形象,更好的译名是《你怎么死活就不明白:对不上话的男女》。

活在比喻中

常常看到各种各样的论战或口水仗,让我们从比喻的角度看待这件事吧。比喻不仅仅是语言和修辞,比喻还塑造我们的思维,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无时无刻不活在比喻之中。

“论战”是个比喻,以“战”喻“论”。这个比喻不是孤立的,而是一套巨大的系统,有“论战”,有“口水仗”,有“舌战群儒”。有“战”便有武器,于是有“唇枪舌剑”,“火药味十足”,有鲁迅的“标枪和匕首”;有“战”便有攻有守,于是有“言辞咄咄逼人,让对方忙于招架”;有“战”便有输有赢,于是有“得理不饶人”和“拱手投降”;有“战”便有损伤,于是有“驳得对方体无完肤”和“让对方的理论土崩瓦解”。

以“战”喻“论”,“论”“战”结合,是我们思考“论”这件事的基本方式,“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何其形象!

用一种事物形象化另一种事物,或者说用“喻体”形象化“本体”,进而用感受“喻体”的方式思考、对待和理解“本体”,是我们思

维和行动的基本模式。多举些例子吧。

“爱情”是什么？是物理现象吧？“爱的火花”啊，相互“吸引”啊，“不能自拔”呀。是病吧？恋爱症候群嘛，爱得“疯狂”嘛，治不好的话，爱还会“枯萎”甚至“死掉”啊。是魔术吧？“着迷”啊，“爱的魔咒”啊，“神魂颠倒”呀。要不是战争吧？“被她征服”了，“伤痕累累”了。这很多的比喻就是我们看待“爱情”的方式，我们用语言把它固定下来，然后传下去，继续影响下一代人思考“爱情”的方式。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用比喻思考，心情好的时候，想“开”了，积极“向上”了，这是借用空间来比喻；心情不好了，就“失落”了，“钻牛角尖”了，也是空间的比喻。

这种用感受“喻体”的方式思考、对待和理解“本体”的模式有个固有的特点，就是对“喻体”的体验常常会主导我们对“本体”的认知。比如，一旦接受了“论战”以及与此相关的一整套比喻之后，“战”就成了常态，“论”就不得不退居二线了。所以在争论中，脸红脖子粗全力争胜是常态，而平心静气的“论”少之又少。“真理越辩越明”的意思也常常变成“在不断的战争中，最后存活下来的那个就是最强大的”。与此类似的，一旦我们接受“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以及相关的诸如“围城”、“囚鸟”等比喻之后，婚姻生活中的麻木和消极也许就会不知不觉成为常态，反正没人会责怪坟墓里的人不活蹦乱跳。

我们都用语言思考，而各种各样的比喻是语言中最重要的一环。说话需要语言，说话也需要时间，所以话语中有无数利用时间

长短的比喻。写作需要语言,写作也需要空间,所以关于文字篇幅有无数利用空间大小的比喻。这种时间和空间的形式,直接影响了我们对内容的感知。

我跑!

我跑啊跑啊跑啊跑……

这就是空间形式的差别带来的理解差别。

我们总是用我们能感受和体验到的东西做“喻体”来理解其他的一切,而毋庸置疑,每个人的感受和体验都非常有限。所以,无论是文字的作者还是读者,都应对语言小心一些,对基于语言的自己的认识水平谦虚一些。

注:如果你对比喻的话题有兴趣,对这种无所不在的思维方式产生的原因和结果有兴趣,对由此引发的哲学争论有兴趣,并想看到更多精彩的例证和清楚的分析的话,推荐一本 30 年前出版的经典《无处不在的比喻》(*Metaphors We Live By*),作者是加州伯克利大学的 George Lakoff 和俄勒冈大学的 Mark Johnson。今天,它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语言学和心理学的范围。不知道这本书有没有中文版,我觉得很难翻译,因为它着重的是英语中的语言现象,书中无数的比喻,汉语中没有对应物。

近代史教育

我业余喜欢读历史,尤其喜欢读中国近代史,一是因为很开阔眼界发人深省,毕竟是“三千余年的大变局”;二是因为能激荡情绪净化心灵,有文艺作品的功效,毕竟讲的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所以在阅读的时候常常投入感情。

我读中学的时候,中国近代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阵地,教材和文艺作品轮番轰炸,对幼小的心灵冲击巨大:眼见尽是帝国主义列强,内心尽是深深的屈辱和熊熊的怒火。话说这本也是激发进一步思考乃至奋发向上的强大动力,可“进一步思考”这本领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少年人一般没有这等耐心,倒是教材里通篇“都是你的错”的调调更加能引起共鸣。这个“你”可不单指帝国主义列强,还包括清政府,还包括民国,还包括蒋光头。所以,我们的近代史教材就像一则朴素的道德故事,恶人层出不穷,小英雄们在抗争中一个个地死去,直到最后大英雄出现,人民从此过上了快乐的生活。故

事结束,历史到此为止。

这么讲历史从而宣扬所谓的“爱国主义”,是一种道德教化而非智识教育。道德教化的核心问题是“忠奸善恶”,这一套我们从小耳濡目染,那真是深入骨髓了。只要善恶一分,其他的都只是细节;只要我们是好人,那无论怎么样,主要责任都肯定在坏人一方。唐德刚先生曾戏言:共产党怪国民党,国民党怪袁大头,袁大头怪西太后,西太后怪洋人。反正“都是你的错”。

后来我再读近代史,又是一次天翻地覆,可依然逃不出“道德教化”的框框,只不过好人坏人掉了个儿:洋人骂西太后,国民党骂共产党。读得自己很迷惑,因为分不清忠奸了。而人本性上都痛恨谎言,所以最初制造谎言的人就成了罪魁祸首。

然而学习历史不是为了道德教化,而是为了智识教育,是为了不断去提出问题并寻求答案。一百多年前的问题,今天解决了么?一百多年前的梦想,今天实现了么?西方有句话叫:“任何复杂问题都有一个简单答案,那答案都是错的。”探索和思考都重在过程而不在结果。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教授煌煌巨著取名为《追寻现代中国》(*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而英文原著封面上更用了一个大大的汉字“争”,这英文的一“寻”和汉语的一“争”,都是动态过程,作者可谓煞费苦心。而这一寻一争,自然也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推脱不得。多读诚实的近现代史,很难不体会到这种历史责任感。

“诚实”首先来源于自省。“落后就要挨打”这个朴素的道理是个结论,而自省则意味着更多更广的思考,哪里落后了?怎么落后

了？落后怎么就要被打了？

郭廷以先生的《中国近代史纲》和李剑农先生《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都以鸦片战争的背景开头，都是自省的姿态，不仅一条条分析了怎么怎么落后，更说明了“落后不仅要挨打，落后还会自己讨打”，因为清廷外交全面失败，给脸不要脸还要蹬鼻子上脸，最终加速了战争爆发。这完全和道德无关，就是愚昧无知。唐德刚先生后来洋洋洒洒万余字的《外交学步与历史转型》，更是纵横捭阖喜笑怒骂，历数从清廷到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得失。所谓国际大赌局，没有赌本就需要赌技高超，可怜我国既无赌本又无赌技，那真是输掉裤头了。

（唐先生前些日子去世了，余英时先生说他有“史学的信念，文学的才能”，夏志清先生也评价唐文有“唐派散文”的赞誉。我等业余人士读史，要听的就是好故事，读的就是好文笔。那篇《外交学步与历史转型》，有朋友读后写道：“唐德刚功底是扎实。层次清晰，逻辑清楚。半文半白，半中半西，但是一点不露怯；洋洋万言，但是没有有一个长句，没有一段废话。处处透着灵气，巧劲。这将来完全可以编进中学课本。”我想他说的是语文课本。）

“诚实”还来源于去除神话。余英时先生曾说“不说神话，不说鬼话，只说人话”。对我等业余历史爱好者，历史的真相那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难以分辨。我曾开玩笑说：“中国近现代史可以分为三种：英文的，简体中文的，和繁体中文的。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里每一个专题都是三种放一起的，很热闹。比如繁体三卷版张

国焘写的《我的回忆》，旁边就放着简体版的《回忆叛徒张国焘》。”相信哪个当然要读者自己判断。但读来读去的好处是脑子中定了型的历史人物形象一个个走了样，面目不清起来。这是好事，因为可以激发质疑和思考。

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我听过很多国内专业研究历史的人说到西方汉学，总有些许不以为然，以为隔靴挠痒。我是外行，不敢评判。但我自己读西方学者写中国历史的书，大受启发。当然也曾感觉过“隔靴挠痒”，后来一细想，这多半是因为西方学者笔端不带感情，又非常谨慎只摆事实不敢乱下判断，让我读来读去分不清好人坏人了。那按照我原有的思维定势，既然善恶未分，那故事就肯定还没讲完，还没讲透。再后来自己多受西方学术训练，对这类写法也就习以为常了，反倒是对道德判断更加警惕起来。

还以史景迁教授的著作为例，西方人讲我们中国人的故事，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自省，他们也在自省，所以他们的落笔重点常常在西方，这就为中国读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比如鸦片战争前英国好几次派使节访华，谈贸易合作，包括我们都知道的马格尔尼和乾隆爷“天朝上国”的接触。这些事件，郭廷以李剑农唐德刚等诸先生写起来，主要是从各种制度和文化入手，分析清廷为何那么愚蠢，那是我们的自省。而史景迁写起来就不一样，他着重谈这些使节回去之后在西方世界引起的反响。比如马格尔尼之行虽然没有什么实质成果，但带给西方一套大清的法典。当年“国际纠纷”不断，洋人动不动就在大清朝莫名其妙地被杀了头，他们自然

对大清律法要做一番研究。可拿回去这法典一翻译一读就傻了眼，这根本不是一个体系，没法沟通嘛！

然后史景迁笔锋一转，讲起中国对西方知识界的影响，从莱布尼兹到伏尔泰到亚当·斯密再到黑格尔，从伏尔泰一直崇拜中国并借中国为自己的思想鼓吹，到黑格尔基本判处了中国的“死刑”，这重重的纠葛和影响，读来深受启发。

这么自省来自省去，读者最后的判断便可能更加平衡。我们落后是我们的错，但这不能抹杀殖民者的种种劣迹；抗日战争起因一波三折过程迷雾重重，各方势力勾心斗角互相扯皮，但这也不能洗净日本军国主义的血手。

1986年，李敖《蒋介石研究》自序是这么开头的：“二十二年前，我出版《胡适研究》；二十二年后，我出版《蒋介石研究》。研究的对象虽然每况愈下，自己的成绩却扶摇直上。换句话说：被研究者的人格，跟我的文格适成反比。”接下来三个排比句排山倒海地吹捧自己。1995年，李敖和汪荣祖合作，再写上下册的《蒋介石评传》，序言的最后一句是：“我终于结束了蒋介石，同时也结束了我一生中最快意恩仇的一页。他死了，但我青春已去，我老了。”

连这些当事人都老了，快意恩仇都兴味索然了，我们这些后辈读历史，自然应该有更多高于快意恩仇的启示。所谓以史为鉴，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快速读书法

我读书的方法和别人不一样,很少一句句的看,所以一本书读完,如果能看过其中 20% 的内容,就算读得比较仔细了。当然也有一句句读的东西,大都是本专业的一些重要论文和书的重要章节,或者是杰出的文学艺术作品,一句一句读能感受到文字本身的魅力。但对其他著作,尤其是我经常阅读的各种其他专业的科普读物,都只是翻阅。

对自己不懂的领域,我通常会花很长时间去选择读物,要看很多的推介和评论,然后才选一本公认的有分量有启发并且行文清楚的书。这选书的时间一般都比读书的时间长。

精选之后也不精读,就是翻,每一段只看头一句,这样的好处是思维连贯,框架清楚,能知道作者的思路。我读书容易走神,要一句一句读的话,用不了 20 分钟就忘了前面说什么了,再继续 1 小时的话,都该打呼噜了。

这样读书,大概不用10分钟就能翻完一章吧,然后开始想这章说了些什么,为什么这么说,提出些问题,再去寻找书里是否给出过答案。这时候好书和烂书的差别常常一目了然。好书通常思路清晰,就算每段只读一句话,那错过的也只是细节,不会错过重要的逻辑链条。如果你在快速阅读之下掌握不了作者的思路,章章稀里糊涂,那这书多半是垃圾,写书的人算不上专业精深且能深入浅出的高手。书那么多,赶紧换一本读吧。

但是,如果翻阅了一遍,提不出问题怎么办?这一般是由于两个原因:或者你对作者谈的东西不感兴趣,或者作者组织的材料和叙述的方式没有启发性。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如果粗翻提不出有意思的问题,进一步精读只会浪费更多时间。

如果能提出问题也能在书中找到答案,那印象一般就很深,也很有收获。但是万一有没想到的问题怎么办呢?书里如果也给出过答案呢?我没想到也没读,不就遗漏了么?这种思考方式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如果我仔细读了,我就知道了并且记住了,就不会遗漏什么了。

这个假设太离谱,原因有三个。

第一,人的记忆力不行。我少年时代过目不忘记忆奇佳,但今天如果不是自己思考所得,绝对记不住。我能记住的是什么内容应该到哪里去找,这不需要精读。如果不是我自己想知道的问题,而是别人既给问题又给答案式的灌输,我多半记不住,转眼就忘。

第二,人的精力集中程度不行。一句一句读一定走神很多次,

只过眼不过脑子,读了也白读。一本书,如果能让你想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并能给出一个有意思的答案,那就是很不错的阅读经历了。书的作者洋洋洒洒下笔万言,可能并不是故意要说废话,他确实想给出更多信息。但对读者而言,大部分信息是没用的,是阅读噪音。除非你突然想到某问题而再去重读某一部分,又受到新的启发,否则那些多余的信息并没有用处。经典的著作,不仅含有大量信息,更能不断引发思考,所以总是常读常新,就是这个道理。一次阅读就能尽览精华的作品,基本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成不了经典。

第三,人的时间有限。一句一句读完一本书需要很长时间。刚读完,提不出问题,再过两天,细节就都忘了。可如果不花时间阅读细节,而每段只读一句的话,那着重的便是作者的思路。如果这思路清晰连贯,一般就一定会引发你的思考和追问。如此一想一问,回头再精读几段,便容易有忘不掉的收获,这收获会进入将来的思考过程,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至于其他细节,与其看了就忘,不如干脆不看。用在阅读上的时间如果太多,那自己思考的时间就少了,我个人认为这样既没有趣味也不划算。

举个例子吧。阅读美国独立战争,我对《独立宣言》的文本本身就兴趣不大。“下述真理不言自明”?世上只有说不清的东西,哪有什么“不言自明”的东西啊?可见“下述”的内容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是大忽悠,简单看看就算了。对我而言,好的介绍独立战争的历史读物,必须清楚简单地回答下列问题:

好端端的为什么打仗?什么问题解决不了?谁挡了谁的财路?

谁那么着急想打有什么好处？谁是被动卷进来不得不打？这是解释战争的原因。

真正打起来之后，谁掏了钱？谁卖了命？这是过程。至于什么战役死伤了多少人，战术如何运用，那是军事迷感兴趣的东西，我一概不看。

战争打完，谁得益了？谁受损了？这纠纷怎么处理？什么处理得了什么处理不了？隐患在哪里？这是战争的后果。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会解释以后发生的事，比如制宪会议和南北战争。

这样一读，历史就是个连续的一环套一环的过程，内容简单逻辑清楚。当然遗漏了很多东西，认识上也因此会有偏差，但好处是简单明了，还不会忘。我又不想成为历史专家，要求那么多干吗？以后想知道细节，随手谷歌就行了。

选择的困难，从来不是在好与坏之间选，而是在很多好的东西之间选。时间有限，好书无限，更重要的，书本之外美好的东西无限。如果不为稻粱谋不为专业，字斟句酌的读书，并不值得。业余读书，除了天才诗人的诗歌，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一个字一个字读的。而若为增长见识，那最重要的是主动思考而不是被动阅读，要努力提炼自己的东西，与别人互相比照，否则不如放下书本出门去旅行。

与学友共勉

自己和一些朋友都曾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挣扎,颇不易。读者须知,美国所有进入博士项目的人,最终能拿下学位的不过 50%,萌生退意再正常不过,于是写下这篇文章鼓励自己,也和朋友们以及所有有志求知者互勉。

耶鲁大学的 Peter Philips 是名满天下的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者,贡献等身,并以善于指导和鼓励学生著称。2008 年他 60 周岁生日,世界各地的学生(今日大多已卓然成家)纷纷写信道贺,其中一位华裔学者的信我印象尤深。这位先生回忆自己当年正是博士三年级,惶惶然不知所措,以为自己天资所限终难有所成。而像所有知难想退的人一样,他开始追问继续下去的意义,认为博士学位终究对人生幸福助益不大,于是决定暂时离开一年,好好想想。打定主意之后,去和导师 Philips 教授摊牌。

教授听后立刻神情严肃,站起身来关上办公室门,问:“××,我

是不是对你太严格,要求太高了?”这位先生急忙摇头,说自己只是需要静下心来好好想想。于是教授开始和他说起自己曾经的研究进展如何缓慢,觉得怎么做都没有效率,而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阶段,这是做研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等等。这位韩国先生自然认为这不过安慰之辞,不足信。须知说话的教授已发表了二百多篇论文,其中三十多篇都发在计量经济学最顶级的学报上,这些贡献完全改变了相关领域的研究。他说他自己没效率,学生岂能相信?

教授苦劝之后,说了下列一番话:“××,请你留下来完成你的博士学位,如果你不想为了自己这么做,那么请你为了我这么做。我这么坚持是因为我知道,有一个博士学位的话,你的人生成就将会大不相同。而且我也知道,你一旦走了,就绝不会再回来。”

后来这位先生留了下来,现在已经是得克萨斯奥斯汀大学的教授了。成与不成不过一念之差。

王国维先生和唐君毅先生都谈过学问的境界,殊途同归,但唐先生说的更详细些。学问有成者,必经历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信”,真心地信,诚心诚意地信,觉得太有道理太有意思了,于是入行。我和我的朋友们都经历过这个阶段。张五常先生在谈论今日中国学子的求学心态时,也反复强调过这一点:切忌一上来就“疑”,一上来就“不屑”,一上来便认为教授水平不过如此,不过故作高深。这种心态只会导向虚无,毫无助益。他常说见了真正的学问高手,要懂得“跪”下来。那是说要诚心诚意地先拜师学习了。懂得先“跪下去”,最后才有机会真正“站起来”。

第二阶段是“疑”，觉得曾经所学皆不可信，都是胡说八道。而“疑难疑难”，之所以“疑”，多半是因为“难”。学多了，学久了，学深了，越学越难，每前进一步付出的代价和努力越来越大，往往还不甚了了。此时忍不住怀疑起来，其实多半是一种消极的心理作祟。唐先生所谓：“烦闷之极，常会生何必读书何必治学之感。”

我经历过这个阶段，怀疑所学毫无用处，真的不过故作高深，其实不过谋口饭吃，何须如此卖命？况且精彩学问那么多，把所有时间用来深究一点，错过其他，越学越窄，又如何对得起博士头衔中的那个“博”字？真的是患得患失，寝食难安。

其实，世间学问千万，让人眼花缭乱。不抓住一点深究下去，如何能在其中立足？所谓“举一反三，一通百通”，没有一个坚实的立足点，没有真正“深”过，又如何能以点带面，真正达到“博”？东拉西扯，看似博杂，其实不过人云亦云。你再“博”，“博”得过谷歌乎？

第三阶段是“悟”，所谓深入过后，终究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其后则“谁谓河广，一苇航之”。然而便是这“一苇”，寻的人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有时真想不如让水蒙了双眼，视而不见随波逐流算了，乐得轻松。

但这“一苇”非同小可，达摩渡江东来，靠的也不过是它。唐先生说：“人在学问中，真有真知灼见，便可以虽千万人吾往矣。人由此而自己做自己思想的主宰。而人只要真能为其自己思想的主宰，人遂皆可在其独立苍茫自用思想时，自觉上天下地，唯我独尊。”

第四阶段是“博”，站立一苇之上，以点带面，一路扩展开去。

“乃由心之广大开展，化出一涵容他人相异思想的度量胸襟”。然后知一苇之外，尚有坦荡乾坤。以前大多荒诞不经自己不屑一顾的东西，如今再看，不过是因为当年看错了角度。指鹿为马，错不在鹿，也不在马。

第五阶段是“言”，在知道对的为什么对，错的为什么错，以及如何纠错之后，方可“知而言”，能答疑，能教人。

自己一苇渡江之后，转回头看，方知“条条大路通罗马”，自己所行之路不过一条。既然自己已经知道了罗马的方位，不如离开罗马，再到别的路上走走看看。才能把别的路上的行者指引到罗马，也才知道有的人完全走错了路，需要指正。

“由此而后，学者成为真正教育家。人要当教育家，亦才真知学问艰难，学问的无穷，与教人之不易。因通罗马的大路，莫有人走的完。而走上崎岖小路背方向而行的人，是太多了。”

而要做教育家，要指引人前行，便会带你到学问的最后一个阶段，“无知”。

“他之无知，是因为他之不能定居在罗马，而要离开罗马，去重走生疏的其他的道路；重与未到罗马的人走错的人，站在一起。这样，他是不能免于无知之感的。因为他人的无知，即是他自己的无知。于是他与他们不免同样的要处处感到惶惑与疑难，并沿路问人。由此而到学问最高境界的人，看来便与无知无识的人一样。曾到罗马者与未到罗马者一样。你说你到过罗马是无用的，因为大家同在一生疏的路上。”

以前我一知半解的时候,常常会质疑那些学问的顶尖高手,觉得他们都是瞎蒙,挺无知的。其实原因不过是他们已经离开罗马了,跌跌撞撞地冲进未知世界的黑暗了,正好碰上了走错了路不自知还在路边沾沾自喜歇晌的我罢了。

这些阶段是循序渐进的,努力和天资只能决定各个阶段的时间长短,不会让人“跨阶段发展”。捷径多歧路,想从零层直接进入第三层“唯我独尊”的人,可能误以为拿到了自己的“一苇”,但忘了身边的不是江水,而是井水。

呜呼,我用了五年去“信”,花了两年“疑”,现在仍然“疑无路”,不知何时能到达“又一村”。夫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以我的愚钝天资,走一步退两步的学问进展,倘真能到达“闻道”那一天,也恐垂垂老矣,想不死都不行了。

注:上述引文,均来自唐君毅《说学问之阶段》。

青年探索者

早上五点送一个朋友去机场,他正为了学问的理想四处奔波,开口闭口的知名教授,崇拜理论。

回来后煮咖啡,发现原来天亮之前的星星是最多最亮的,突然就很想回山里住一晚上,因为只有那里能看到真正的银河。

开灯读书,是这几天一直在读的《致青年探索者》(*Advice for a Young Investigator*)。作者是百年前的一位诺贝尔生物学奖得主, Santiago Ramony Cajal,这本书的第一版成稿于 1898 年的西班牙马德里。

110 年前的书,写满了作者对青年学生学者的建议,如今丝毫感觉不到过时。就像一位学术声名显赫的伟大导师,在冬夜的壁炉前和自己心爱的学生对话,抛开所有的专业术语,历数一生的学术心路历程:勇气,失败,坚持,面对权威……都是些已经快被遗忘的智慧。现代的导师们太忙学生太多,已经没时间再和学生说这些了,

只能预设他们都已经懂了。所以结果经常是当学生们终于挣扎地“开始懂了”的时候,已经要毕业了,已经受尽折磨决定和学问永别了。

诚实,勇气,坚持,健全的人格,责任,不懈的工作……好像都已是陈词滥调。但一路读下来,很多话都像在对我自己说,感悟良多。

该书第五章名为“意志之疾”(diseases of the will),历数为学大忌:

一、满眼桃心儿的半吊子(*contemplators or dilettantes*)

这种人只知道发感慨,“自然多美啊”,“这证明太漂亮啦”,“经济学太牛啦”,满眼桃心儿,谈起学问来永远如初恋人般的心如鹿撞满怀激情。可惜初恋只能是初恋,经不起真实的蹂躏,脱不下美丽但虚假的面纱。沉迷其中的人无法踏下心来承担责任,一点点应付真正研究的枯燥。所谓“欣于所遇,不知老之将至”,没注意到才华和年华都在飞快地流逝。

二、饱学的书虫(*bibliophiles and polyglots*)

顾名思义,读书读死了,最大的成就也不过是考据癖,“知道先生”。你知道的再多,多得过互联网么?

三、好大喜功(*megalomaniacs*)

练剑数载,要名动江湖,立志第一战便要单挑西门吹雪。这种人有两种下场:第一种是被西门吹雪一剑封喉,所有的努力都激不起半点涟漪。第二种是永远无法出师,因为想不出如何破解西门吹

雪那一剑的风情,无奈之下只能弃剑或沦为西门的超级粉丝,毕生和西门吹雪的相像之处就只是在饭店里高傲地对店小二说:“来一碗清水,两颗鸡蛋。”

做学问如打麻将,非大和不和的人,一定输掉裤头。

四、沉迷于工具(*instrument addicts*)

“工具”不一定是有什么特定器物,也可以是各种方法论。不久前我还是“结构模型”的粉丝,写了一些肉麻的吹捧文章;但阴差阳错,自己的第一篇论文用的是“简约模型”,才有机会慢慢学习体会其中的精巧。如今对这两种工具(方法)都有了更多的认识,各自的得失心中有数,不会再不齿于简单的回归而为符号漫天的复杂模型目眩神迷。

五、入错行(*misfits*)

我没觉得学术有什么特别高尚的地方,就是一个普通的职业。喜欢不喜欢,不会因为它“高尚不高尚”而改变。用学术谋生就像娶了一位美女当老婆,所有的神秘和美丽都会在短时间内耗光,剩下的只有三种结果:真心喜欢,凑合过日子,或者离婚。

我甚至觉得与其他职业相比,“学术”更加不自由:给私人公司老板点头哈腰的时间毕竟有限,然而面对书本或思想,人却可能沦为终身的奴隶。

六、理论家(*theorists*)

我对纯理论家没有偏见,对这本书的作者也没有,我只是不喜欢奥林波斯山的理论家,发明的理论完全和实际发生的现象无关。

我对理论和实证的态度,两句话可以概括。一句话出自这本《致青年探索者》:“铁打的数据流水的假说。”另一句来自《最无害的计量经济学》(*Mostly Harmless Econometrics*)一书的结语:“如果应用计量容易的话,理论家都能做了。”

不说了,天亮了,该工作了。

科研伦理观

在美国,要做和人类行为直接相关研究的人,大都必须学习“人类行为研究伦理”的知识并通过考试。这是为了保证研究者知晓科学研究的伦理观,懂得保护被研究对象的隐私和权利等等。

从两个有趣的问题中,我们可以了解一点科学研究的伦理知识。

问题一:“如果你正在对某一群体进行问卷调查,从调查结果中发现其中某人正在虐待儿童或从事其他非法活动,这种情况下,你应不应该举报他?”

问题二:“如果你以前调查过的一个对象犯了法,法庭发现你们以前的调查记录可以用来指证这位犯罪嫌疑人,所以法庭要求你提供这些记录,你应不应该提供?”

这两个问题都和“保密”有关,所以必须先强调“保密原则”随行业不同而不同。这里说的只是学术研究过程中如何保护被调查者

的隐私,这里适用的规则和法律可能并不适用于其他行业,比如心理医生和顾客,律师和客户,神父和告解者之间,都有其他的保密规则。

对第一个问题,法律规定对某些特定的犯罪嫌疑活动,研究者有举报的义务。而这些特定的犯罪嫌疑活动,每个州的法律有不同定义。比如“正在计划伤害他人”和“虐待老人”在某些州是有举报义务的,但在有些州则不是。

但绝大多数州的法律都有一项共同的必须举报的犯罪嫌疑活动,那就是“虐待或忽视儿童”。我们在影视节目中都听说过有些华人父母由于不熟悉美国法律,对自己的孩子忽视或者轻微虐待(打孩子)而被邻居举报身陷官司的故事,严重的还会失去对孩子的抚养权。在学术调查中,如果被调查者有虐待儿童的嫌疑,研究者也是必须要报案的。

因为可能会被举报,所以参与学术研究的调查工作对被调查者来说有一定风险。因此远在调查开始之前,研究者和被调查者就要对所进行项目的风险达成共识。研究者必须告知被调查者他们可能面临的风险(比如新药实验的潜在风险),包括一旦发现虐待儿童研究者会被举报。换句话说,被调查者必须在参与研究之前,就需要明确了解自己所面临的潜在法律风险。而法律又规定,被调查者有权利随时中断与研究者的合作,而研究者不能强制被调查者完成所有问卷的问题或实验的步骤。

所以,就“虐待儿童”来说,被调查者在参与研究之前就知道一

旦他表达出类似行为,他会被举报,而在参与研究的过程中他有权利不回答相关问题。

如果研究者事先没有和被调查者进行充分沟通,未告知他们所应该知道的信息,而在后来的调查中举报了被调查者。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取得的调查资料本身不能成为证据,因为取得证据的程序不合,而研究者本人也可能因此吃上官司。

关于第二个问题,对律师和客户或心理医生和病人之间的资料,答案是简单的,这些资料受法律保护,法院无法强制当事人提供这些资料作为证据。

但对学术调查所得的资料就没有这样的法律保护。很多学术研究本就受纳税人的钱财资助,所以其调查所得在一定条件下应该公开。而法庭对于这类证据,一般是有强制力要求研究者必须提供的。

如上文所言,在调查之前研究者必须告知被调查者所面临的风险,而调查者有权利不回答可能带来风险的问题。但在有些研究中,比如对黑社会成员或其他从事非法活动(比如色情行业)的人员进行的学术调查中,调查不可避免的要涉及这类“敏感问题”,而被调查者如果在得知其回答有可能成为“呈堂证供”之后一律拒绝合作,那这调查根本就进行不下去。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呢?

在这种处境下,研究者可以申请一份特定的法律文书,这文书可以让调查内容豁免于来自任何法庭(地方法院,州法院和联邦法院)的“强制令”。有了这份文书,研究者就可以在调查开始之前告

知被调查者：他们的“隐私”和“合作”是不会被强制公开的，所以被调查者可以放心大胆的说话。任何的研究，无论其资金来源是不是公共机构，如有需要都可以申请这文书。

最后，研究者不能强制被调查者完成实验的全部步骤或问卷的全部答案，但“强制”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一个病人病人膏肓无钱看病，而免费试用一种新药是救命稻草，这算不算“强制”呢？另一种情况是，研究者财大气粗，给被调查者异常丰厚的回报，要求他们完成所有有风险的问题或实验，这算不算“强制”呢？

就我目前看到的很少材料而言，这两个问题仍然是有争议的。您觉得呢？

神秘的点球

时间:2008 年

地点:莫斯科

事件:欧洲冠军杯决赛,切尔西对曼联。

决战前夕,切尔西主教练格兰特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报告,这份报告有四点内容:

1. 与其他守门员相比,范德萨(曼联门将)通常扑向射手的“自然角”,也就是说,右脚射手射门时,范德萨通常扑自己的右边,而左脚选手射门时,范德萨通常扑自己的左边。因此,如果切尔西派出去的射手是右脚将,那想得分的话,最好射范德萨的左边。

2. 范德萨扑出的绝大部分点球,都是中等高度的射门,也就是球离地面距离一米到一点五米之间。所以,面对范德萨射点球,最好贴地,或打得更高一些。

3. C 罗(曼联射手)射点球时,往往要在助跑后和射门前停顿,而他之后的射门 85%都射向了守门员的右边。而且,C 罗似乎总是在停顿的那一刹那才做方向的决定,所以守门员一定不能先动。在 C 罗射过的所有点球中,如果守门员先动的话,他的点球命中率是 100%!

4. 在射点球之前要投硬币决定谁先射,永远选择先射! 先射的球队 60%都赢了比赛,因为第二个射的压力总是比较大。

如果你上网搜索这段这场比赛的点球视频的话(到处都有),会看得一身鸡皮疙瘩,那感觉只能用惊悚来形容。

经过加时赛,曼联和切尔西进入了点球决胜。

曼联队长费迪南德和切尔西队长特里扔硬币,费迪南德赢了,问教练怎么办,特里上前说“我们先射吧”,费迪南德当然不傻,不会让切尔西先射。

曼联先上,他们的胜算较大,特维斯先上,射中。

切尔西巴拉克上,右脚将,按照报告第一条,打范德萨左边,按照报告第二条,打高球,中。

切尔西贝莱蒂第二个上,右脚将,按照报告第一条,打范德萨左边,按照报告第二条,贴地,中。

这时曼联的 C 罗上场,助跑,停顿,而按照报告第三条,切尔西门将切赫纹丝不动,连眼珠都没眨一下,然后想都没想就扑向了自己的右边,扑出了 C 罗的射门,C 罗石化。

接下来,切尔西兰帕德,阿什利科尔,特里,卡卢,无一例外地射

向范德萨的左边。可惜特里的射门滑出了门柱,但范德萨仍然扑错了方向。这里唯一的例外是阿什利科尔,他是左脚将,踢左边是他的“自然角”,而根据报告第一条,范德萨面对左脚将时通常会扑向自己左边,他也确实扑向了左边,可惜没扑住。

六轮过后,不分胜负。这时切尔西的阿内尔卡上场,这场大戏也到了最高潮。

范德萨不傻,六个人都射到了他左边,那一定是有预谋的!范德萨大吼一声,狠狠地击掌。站在球门前,伸展双臂,对着阿内尔卡指了指自己的左边,好像在说:“你们不就是要踢这儿么?来呀!”

这时,可怜的右脚将阿内尔卡陷入了博弈论的经典困境:阿内尔卡知道范德萨爱扑右边,而范德萨知道阿内尔卡知道范德萨爱扑右边,可阿内尔卡知道范德萨知道阿内尔卡知道范德萨爱扑右边,怎么办?

没按报告,阿内尔卡踢向了范德萨右边,更要命的,那个球是中高距离。

范德萨扑出了这点球。

电视机前观看比赛的一个人大怒拍案而起,大骂阿内尔卡的愚蠢。

这个人就是那份神秘报告的作者,美国布朗大学的经济学家 Ignacio Palacios-Huerta,他从 1995 年开始收集了上千场职业足球的点球数据,并做了很多研究,来验证足球射手的策略和经济学博弈理论的推测是否一致。

更耐人寻味的是，赛后曼联主帅弗格森说：“救(阿内尔卡)的那个点球，不是意外。对于某些射手，我们就是知道他们会往哪里射点球。”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 2006 年世界杯德国对阿根廷的四分之一决赛，点球大战，当时德国门将雷曼的袜子里有一张纸条，那是德国队门将教练赛前写下的，交代了面对阿根廷的射手时应该怎么扑，上面有七个名字：里克尔梅、克雷丝波、海因茨、阿亚拉、梅西、埃玛尔和罗德里格斯。

这七个名字里，最后真正主罚的只有两个，阿亚拉和罗德里格斯。阿亚拉的名字后面写着：2（阿亚拉的号码，可能害怕雷曼搞混），长时间等待，长距离助跑，右。罗德里格斯：18，左。结果大家都知道了，阿亚拉被扑出，罗德里格斯扑对了方向，但没扑住。

这时坎比亚索上场了，雷曼拿出了纸条，上面字迹潦草，他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坎比亚索的名字。

而坎比亚索慌了，“雷曼在看什么？肯定是秘笈！他究竟知道什么？”

高手对决，心乱的一方，死。于是雷曼扑出了坎比亚索的射门。

注：这个故事来自 2009 年出版的《足球经济学》(*Soccernomics*)，作者是记者 Simon Kuper 和英国的体育经济学家 Stefan Szymanski。这本书已经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0 年出版中译本。

钱都哪去了

2009年2月，奥巴马总统签署了《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ARRA)，斥资7870亿美元，刺激经济。

7870亿，我拿到了大约22000块。准确地说，是我导师和密歇根大学的另外一位教授一起拿到了199951块，付给我这研究助理大概22000块。学校也申请了110万美元用于翻新教育学院大楼，我以前的办公室在那里，前几个月刚换了地毯，大概用的也是这钱。

这里我要说的是透明度的问题。7870亿美元是个天文数字，但你只要轻轻一点鼠标，就可以在网上查出其中每一笔钱的去向：给了什么机构或个人？数目是多少？这些机构和人都在哪里？详细地址是什么？为什么给？要用这钱干什么？怎么干？能解决几个就业岗位？这钱是哪个政府部门给的？在什么时间以何种形式给的？是贷款还是直接资助，是签合同合作还是税收减免？等等。

7870亿美元，其中的每一笔，都记录并公布出来。每一笔记录

都包含以上全部信息,甚至更为详细。你只要进入美国政府专门建立的网页就能看见每一笔钱,这网页的名字就叫“钱都哪里去了?”^①

我不是宏观经济学家,不研究乘数效应,也不关心这巨额支出对 GDP 等宏观数据的影响。但我拿了人家 22000 块,工作就是追踪给高等教育机构的每一笔钱,看看这些钱是怎么花的。这里头牵涉到很多的法律法规和制度细节,所以我很兴奋,每天都能从追踪钱的数目中看到很琐碎很微观的美国,那是这台庞大机器的血管。

透明度很重要,但仅仅是程序透明并不一定意味着钱花得有效率,而快速的巨额支出几乎一定伴随着巨大的浪费。比如 1998 年到 2003 年间,美国议会大力扶持生命科学研究,科研投入翻番,而且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花出去。最后多砸出的上百亿美元,增加科研产出的效果甚微。

花纳税人的钱,程序应该要透明,以便于监督。如果透明的信息披露仍然免不了浪费,那不透明的情况下效率就更成问题。巨额资金,如果来无影去无踪缺乏监督,那其中上下其手腐败贪污就一定会发生,这是和自然科学规律一样“过硬”的铁律。

不仅政府花钱需要透明,就是各路去争取政府资金的机构,也要对自己人有个交代。人们尤其关心的是:“在政府大手花钱的时候,我们自己的领导是不是努力为我们尽量多争取了?”

本校有一个“联邦政府刺激经济和弗吉尼亚大学:基本问答”的

^① 这网站的地址是 <http://bit.ly/716oqE>。

页面,上面第一句话就是:“奥巴马总统刚一签署 7870 亿美元的复苏法案,我校早已待命的由各机构组成的委员会就立即行动起来,尽可能为我校多争取资金。”

有钱的地方就有官司。据《波士顿环球》报道,复苏法案刚出炉的 2009 年 3 月,公立的麻省大学系统很兴奋,因为麻省州长许诺拨给该大学不少钱,用于缓解财政压力以尽可能少增加学生的学费。可短短两个月后,《波士顿环球》又报道,麻省大学把州政府告上了法庭,因为州长计划把部分许诺给该大学的钱挪用在别处,这还得了?!

答应拨付的钱就必须落实,否则就算是政府也要吃官司,这是法治社会。

附注:除了财政拨款,学费和社会捐赠之外,美国高校还可以借助公开发行债券来融资。为渡过经济危机,我所在的弗吉尼亚大学在 2009 年 4 月发行了两亿五千万的债券,为在建的 19 个基础工程融资,三个主要债券评级机构给出的风险评级均为 AAA,债券期限 30 年。上市后的一个小时内,主要承销商 JP 摩根就收到超过 12 亿美元的订单,这在推高债券价格的同时也降低了学校负担的利息,现在的年利率大概 6% 多一点。因为这债券是政府“建设美国债券”的一部分,联邦政府还会帮助偿还利息的三分之一。

纪念钟开莱

今天才知道钟开莱(Kai Lai Chung)先生上个月^①在菲律宾的家中去世了,享年 92 岁。

全世界学习过些概率论的人,大概没有人不知道钟先生的大名。他一生传奇无数。早年在西南联大求学,吊儿郎当,和华罗庚先生叫板,嫌老头子讲课罗嗦,搞得很不愉快。还给沈从文的文章挑毛病,说里面讲古代犯人掷爻定生死的概率,沈算错了。后来去了美国,只两年便拿下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学位,但依然和教授不和。写了篇论文,交给一位牛教授,那牛教授向来也瞧不起钟,所以狠批了他一通还指出了他的很多语法错误。钟大怒,跑到图书馆找到了这位牛教授的所有论文,从中一一挑出语法错误,用红笔批注后交给了这位教授。

① 这里的“上个月”,说的是 2009 年 6 月。

他的八卦还有很多,比如妻子出生菲律宾豪门,儿子是某个华尔街大亨,他自己平时总是吊儿郎当,但还常保持法国绅士风度,讲话写作都爱冒法文等等。

当然最牛的还是他的学问。我记得曾经有句话描写陈省身先生(20 世纪最伟大的几何学家),大意是说:美国的几何学界曾经如何如何,直到陈省身来到了美国,改变了这一切。我想同样的话大概也可以用来描写钟开莱先生,只不过“几何”要换成“概率”。现代的概率论本是苏联人的学问,而钟先生后来被誉为“美国概率论的教父”:美国数得上的概率论高手,不是他徒子就是他徒孙。在全世界数学家“家族树”网站中输入钟先生的名字,会看见他的 13 位门生和随后的 120 位“学术后代”,整整 120 位啊!

在中国,钟先生不像陈先生那般妇孺皆知,这大概和他的性格有关,说话总是得罪人。作为概率论大师,他的一句名言竟是:“我最讨厌统计学家了!”

他曾写过两本有名的概率论教材,一本给本科生,一本给研究生,前者我详细念过,后者我详细念过前三四章和最后忘了是第几章了。今天回忆起我当年作为一名数学白痴苦学他教材的情景(而今内容几乎都忘光了,再次证明了我还是数学白痴),还是有些感慨。

概率是门很难的学问,就算是初等概率也不容易,往往和直觉相悖。入门教科书很重要,不仅要精彩易懂,还要抓住概率论的要害,否则会传达很多错误的第一印象,妨碍以后进一步的学习和理解。要在基础教科书中树立牢靠的基本观念,是各专业都重视的目

标。所以各专业中经典的入门教科书往往出自大师之手,貌似浅白实则深刻。可惜初学者常常无法领会其中的深意,要经过后来长时间的学习和思考之后,才能理解当年初等教材中的字字珠玑和作者的匠心。钟先生的初等教科书,我读过两遍,后一遍学到的东西更多。

我是个数学白痴,从小数学就很少及格,中考的时候数理化三门相加才刚得到一百分,属于智商奇低的品种。回答和数学有关的智力题也从来答不上,要想很久,魔方什么的更是从不得要领。后来参加高考,数学试卷后面的两道大题是根本不做的,因为知道必然不会,所以干脆用那时间去检查前面的小题,减少错误。大学毕业后喜欢上了经济学,不得已而“强”学数学,这个“强”是“勉强”的意思。我的长处是早年记忆力好,而且算是用功,所以就用死背硬记的方法来学数学。教材是看不懂的,那就抄写一遍。一个定理说什么完全看不懂,怎么证明更是云里雾里,那就不管它,先照着抄一遍,然后再抄一遍。

课后习题根本不用想,因为肯定不会。好在是自修,可以拿着答案集一遍遍抄答案。后来发现数学定理和唐诗一样,多抄几遍也就了解个大概了。反正我也不打算自己证明什么东西,就是为了看懂经济学家用的数学,所以这么学也就差强人意了。我唯一自己想出来的一个比较花哨的数学模型是我第一篇论文的第一版中的模型,用了很多概率知识,自己当时很是得意。不过后来觉得不实用,删掉了,改成了初中代数水平的加加减减。

2005 年我随中国人民大学的龙永红老师学习高等概率,当时用的便是钟开莱先生的研究生教材。从初级教材到高级教材,钟先生行文风格大变,惜墨如金。内容就是定理加证明,顶多加一两句解释,像本字典。对我这种外行加笨蛋,学习这本书简直是赶鸭子上架,这回怎么抄都抄不懂了,完全不知所云。幸运的是,教课的龙老师课讲得非常清楚,于是我就忙着抄笔记。龙老师是烟鬼,课堂中途休息要抽烟,我就蹭过去陪着吸一口,顺便请教问题,久而久之倒也似有所悟,乐在其中。

麻烦的是作业和考试。大多数作业来自钟开莱先生的教材。他写证明非常简洁,有些地方就直接说“此步非常简单,跳过”。而很多作业就是去补充这些简单得不值一提的步骤。可那对我也是大考验,常常苦思冥想,摸不着头脑。还好同班有些数学高手可以请教,算是一一应付了过去。

考试更麻烦,只能靠自己。虽然龙老师说大部分的考题都只不过是作业的问题,加些简单变化。但这“简单变化”可不得了。要是作业原题,我还可以记住;可一旦“简单变化”了,我很可能就不认识了!不过终于也算侥幸过关了,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蒙的。

想来钟先生写这研究生教材的时候,脑子里的读者都是全世界数学研究院的那些达人们,压根没有我这样的笨蛋。只是阴差阳错,这两本教材都成了我这位数学白痴难以忘却的经典。

所以用这篇文章纪念伟大的概率论学者钟开莱先生。

撞开那扇门

我自己的博士论文和中国人在美国的移民历史密切相关,虽然我研究的是当代社会,但也阅读了大量史料,对早期定居美国的华人移民有浓厚兴趣。在读那些跌宕起伏的经历时,常夜不能寐,这篇文章便是那时记录下来的。起名为《撞开那扇门》,模仿鲍勃·迪伦名曲《叩击天堂之门》,同时也模仿美国经济学界当代移民研究模型的奠基者乔治·博尔哈斯(George Borjas) 2001 年的著作《天堂之门:移民政策与美国经济》。不过,早期在美华人的血汗经历,实在不算轻巧地“叩门”,用“撞门”来形容,更贴切。

容闳的梦和黄遵宪的诗

所有在外留学的中国学子,都不应该忘记容闳(Yung Wing)这个名字,是他只手创造了“幼童留美”奇迹,以此拉开了百年华人留美大幕。1854 年,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并连续两年拿到该校英语作

文第一名。他当时写道：“大学四年来，尤其是临近毕业这一年，中国的惨状时时浮现在我眼前，沉重不堪……我坚信中国的新一代应该如我一般享有良好的教育；‘西学’或可给中国新生，启迪民智，重整国威。这已是我一生事业所系。”

1870年，他终于说动曾国藩，上书奏请朝廷派遣子弟出洋学习。十年后，远在日本的黄遵宪写下了他的长诗《罢美国留学生感赋》，回忆当初这上书的前因后果。该赋开篇追忆汉唐盛世各国来朝，各国蛮夷只有来我国留学的份儿，所谓“各遣子弟来，来拜国子师”。可惜如今风水轮流转，强敌环伺，国势日渐不支，科举之下都是酒囊饭袋之辈，不足扶大厦于将倾，所以“欲为树人计，所当师四夷”。

（当年我游北京国子监，逢科举历史展。其中最后一届的科举考试有命题论文曰“项羽拿破仑论”，有学子奋笔疾书，大意：项羽霸王盖世，有万夫不当之勇，如今拿一破轮，实乃大材小用云云。）

当年的留美是流放加要命的活，可远不像今天这般荣光。海上漂泊三数月，远离故土生死未卜前途难测，高官富贾子弟哪个会去？所以清廷在一开始就遇到了生源不足的麻烦。于是黄在诗中感叹道：“茫茫西半球，远隔天之涯，千金不垂堂，谁敢狎蛟螭？惟有小家子，重利轻别离，纡千山头雀，短喙日啼饥，但图飞往乐，不复问所之。”

所以“留学”这件事从一开始就带上了“自我选择”的烙印：一个人自己选择离去，那他对故土的牵挂必然少一些，所以后来不想回去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就像今天进城打工的农村子弟，谁没有怀揣

一点在城里过好日子的梦想？哪个又想回去？

清廷在内地招不到人，就只能转向沿海。所以第一批留美幼童的30人中，有25人来自广东。当时容闳的宣传口号只有一个：学成归来，必能成为朝廷命官。

如今出外留学，家长要负责提供足够的财产证明；而当年家长所要做的是，签下一张“生死状”。比如詹天佑的老爷子就要签字画押：“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最终，这批孩童集结上海，朝廷在那里设立预备学堂，抓紧最后的时间进行“洗脑”——大讲四书五经也。

1872年，留美幼童们抵达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受到容闳事先安排好的美国借宿家庭的热烈欢迎。那些拥抱和亲吻，对这些害羞的梳着辫子的小男生们造成的心理冲击可想而知。但孩子终究是孩子，他们迅速地融入了美国生活。虽然每年夏天他们仍然要聚在一起学习四书五经，并朝着北京紫禁城的方向行礼，但这并不能阻挡他们变成“洋鬼子”。黄诗有云：“乡愚少所见，见异辄意移。家书说贫穷，问子今何居。我今膳双鸡，谁记炊糜。汝言盍无粮，何不食肉糜？客问故乡事，欲答颜忸怩。嬉戏替戾冈，游燕贺跋支，互谈伊优亚，独歌妃呼豨，吴言与越语，病忘反不知。亦有习袄教，相率拜天祠，口嚼天父饼，手繙《景教碑》。楼台法界住，香华美人贻。此间国极乐，乐不故蜀思。”

我相信黄遵宪这段话只是讽刺某些朝廷人士对留美幼童的歪曲之辞，实际上当年那些幼童大多学业优良，高中毕业后，九人进了

耶鲁大学,其他去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布朗大学等美国一流名校。

但这种忘记祖宗堕落变质,甚至信奉异教的举动引起了朝廷的极大不满。1875年,新一届驻美公使吴嘉善到任,此人乃著名的保守派,一切均以“天朝上国”为准,自然与容闳不和。在召见这些留学生时,这些小子尽然不行跪拜礼,吴大人自然怒不可遏。黄遵宪描写当时情景:“新来吴监督,其僚喜官威,谓此泛驾马,衔勒万能骑。征集诸生来,不拜即鞭笞。弱者呼暑痛,强者反唇稽。汝辈狼野心,不如鼠有皮。谁甘畜生骂,公然老拳挥。监督愤上书,溢以加罪辞,诸生尽佻达,所业徒荒嬉,学成供蛮奴,否则仍汉痴,国家糜金钱,养此将何为?”

于是吴公使上奏折,说留美幼童“腹少儒书,德行未坚,……实易沾其恶习”,这就埋下了朝廷后来死令召回这些幼童的伏笔。而黄诗中这“蛮奴”和“汉痴”的标记,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里也就一直打在留学生身上。至于之后的种种标记,如“资产阶级走狗”,“卖国贼”,“假洋鬼子”,“不懂中国国情”等,无非都是“蛮奴”和“汉痴”的不同组合罢了。

吴公使奏折之后一系列的外交风波,加上美国民间对在美二十几万华工的敌视和不断冲突,最终导致了1882年的《排华法案》,禁止华人进入美国,连容闳的美国国籍都遭剥夺。黄遵宪就此写下名作《逐客篇》,感慨世界之大,龙子龙孙竟然无处栖身!所谓“倒顷四海水,此耻难洗濯。他邦互效尤,无地容飘泊。远步想章亥,近功陋

卫霍。芒芒问禹迹,何时版图廓?”

苦力? 妓女? 百年的恐惧

1872 年第一批清廷小留学生到达美国,而之前的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之乱,以及 1868 年取消中国人出境限制的《蒲安臣条约》,早已驱使大批中国劳工进入美国。有数据称,在 1849 到 1882 年间,已有 28 万以上中国人进入美国。

就在小留学生进入美国的三年后,1875 年美国单方面通过《佩奇法》(*the Page Law*),禁止中国妇女入境,原因是美国当局认为她们都是妓女。1882 年美国更是单方面通过《排华法案》,遣返在美华工,并禁止华工入境。所谓“单方面”是比较而言,虽然当年日本妇女在美国的妓女比例并不比华人妇女低,日本劳工抢占的美国工作机会也不比华工少,但美国与日本之间处理这争端的手段是“好说好商量”,在 1907 年签署了所谓的《君子协定》,而不是一杆子驱逐所有日本人。弱国无外交。

就如中国百年前的历史今天还在影响当代中国人一样,百年前投下的被驱逐的阴影在美国华人圈中也一直没有散尽。这《排华法案》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 1943 年才被废止,客居他乡寄人篱下的不安全感,今天依然。

让我先讲一件 1996 年发生在加州的旧事。

以前我在国内听过很多中国移民的奇闻轶事,其中一大类便是移民过去之后“吃政府救济”:就算砸锅卖铁去外国也很划算,反正

过去饿不死,政府总是要发放福利金的。这种由于福利丰厚所产生的“磁石”效应,吸引了大批来美国大吃救济的移民,让美国政府头疼不已。移民群体这救济也是吃得够坦然,不吃白不吃嘛。1996 年以前,移民家庭中吃救济的比例已远高于美国本地人。

读者可能要问:“这救济嘛,救急罢了,还真能成为生活来源?”虽然相比欧洲的一些所谓“福利国家”,美国政府的福利救济不算慷慨,但那数额却也不小。在有些移民聚集的大州,比如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福利尤其慷慨,甚至连非法移民也能领到救济。1990 年代中期,一个四口之家(两个小孩),如果各项主要救济项目都参与的话,每年可以领取一万二千多美元,怎么也不算是小数目了。

领取救济的移民给政府带来了不小的财政负担,于是克林顿总统在 1996 年签署通过了《个体职责与工作机会调和法》(*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大意是宣布联邦政府不再给“非公民”发救济了。至于各个州嘛,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像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这种移民大州,自然不可能对移民群体下此“毒手”。但在此政治大气候之下,加州也提出了著名的“187 号提案”,要禁止一切非法移民领取几乎所有的政府救济。在 1994 年 11 月的投票表决中,加州选民 59%投了支持票,于是该提案得以通过。

虽然该提案只针对非法移民,并且在通过之后也从未严格执

行,但此举仍然吓坏了移民们,一夜之间,合法移民也停止了领取救济,这现象在研究的文献中叫“惊悚效应”(chilling effect)。这效应在华裔移民中尤为明显。虽然此时《排华法案》已经终止了半个多世纪并且也不太可能历史重演,但拿人家的手短,客人终究是客人,万一真惹毛了主人,可就因小失大了。

这次事件也给华人提了个醒:“做客”终究不是长久之道,“反客为主”才是百年大计。虽说绿卡在手,太平洋两岸随便走,但绿卡终不过是一张签证,没有投票权,命运就还是掌握在别人手中。不如再进一步,入籍了事。于是 1996 年之后,华人圈开始流行入籍。有数据显示,1994 到 1995 年,只有 48% 被调查的在美华裔入籍,但 1997 到 1998 年,这比例升到了 69%,同时,来自前苏联、古巴、伊朗等国的移民的入籍比例也大幅攀升。既然故国不堪,漂泊不定,不如干脆咬咬牙扎根美利坚算啦。而英国人、日本人、德国人却不买这个账:“妈的,歧视老子,老子还不呆啦!”同一期间,这三国移民的入籍比例各自下降了十多个百分点。

百年之后尚且如此紧张,而百年前的大排华,又给“在每根铁路枕木下都埋下了一具尸首”的华工带来了怎样的大灾难? 1875 年作为中国驻华盛顿副使的容闳,在国会力阻“排华”之时,突然发现那些平时风度翩翩的议员,竟然风度尽失,说话做事都活像西部蛮荒之地的牛仔。“妓女”、“猪猡”、“苦力”,这一连串的侮辱性字眼是当时数十万在美华工的标签。

当年坊间流行的小调是这么唱的:“(18)49 年来了苦力,51 年

又来了妓女，酒吧间里一滚地，咦，儿子倒成了美国籍！”^①

谁说中国人就不是“白人”？

“我想，有朝一日，中国教育普及，人人都懂得公权和私权的意义，那时无论什么人，谁敢侵害其权利，必有胆力奋起自卫！”（容闳，19 世纪末）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一个历史阶段，黑人就没有力量，只是他们的力量是无声的。黑人的力量就是他们失去的自由，就是他们所承受的苦难。他们以深重苦难凝聚起一个巨大的质量，逼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检验人类对于人性的自省能力。”（林达，20 世纪末）

1875 年，《佩奇法》先驱逐中国妇女，禁止她们进入美国，原因荒诞不经：她们道德败坏尽是妓女，其家庭不符合美国的家庭观念，所以不能永久定居在美国。这都是借口，真实的原因无非是“大陆铁路”建成后的卸磨杀驴。华工勤劳顺从并且廉价，抢了美国工会工人的饭碗。当大陆铁路建成数万华工埋骨他乡之后，急迫的劳工需求暂时得到缓解，“排华”浪潮遂一浪高过一浪。

早有不少美国学者撰文指出，当年中国女性中虽然不少沦落风尘，但比例并不比其他族裔（比如日本）更高。其中不少是被人贩子拐卖而来，迫于生计不得已而为之，这行当数千年都是如此悲惨，又与虚

^① The miners came in forty-nine, the whores in fifty-one, they rolled around on the barroom floor, then came the native son!

假的观念何干？1870年，在美华裔的男女性别比在20比1以上，沦落风尘为保持庞大的华工独身男人的群体稳定贡献又何等巨大？

《佩奇法》一遭通过，华工实在已难以立足，只有单身男人的社会怎么维系？随后的全面排华无非顺水推舟，更进一步罢了。

然而就算遭人唾骂，沦落风尘，也不能阻挡她们争取自身的权利，当年旧金山的名妓“亚彩”（音译）就是这样一位奇女子。1849年，她抵达旧金山，不久就成为当地“头牌”。据说仰慕者为一睹芳容，不惜排队一个街区，花费一盎司黄金。古今中外，妓女虽然传奇不断，但嫖客素质却一直有待提高。就算在中国的传统中，“欠过夜钱”也是令人不齿，连手持“人民英雄纪念刀”的星爷也是要拿猪肉抵债的。话说当年旧金山虽黄金滚滚，但不少嫖客却常以铜充金，骗取这些可怜女子的血汗。被骗的女子也常是敢怒不敢言，因为警察和“城管”，大都是连“铜”都不给的货色，实在招惹不起。这位亚彩姑娘却与众不同，她精研美国法律并“深深为之折服”，于是常将个人纠纷诉诸法律解决。据说她多次出入法庭为自己的行业辩护，起诉那些用铜充金的人渣败类，在当地颇负盛名。

此外，当年的美国法律并不承认华人拥有公民权，也拒绝把公民权给任何“非白人”的已经入籍的移民。1870年，法律修改，把这公民权延伸到以下外国人——“非洲当地人，或有非洲血统”。当时“人类起源于非洲”的人类学观点还没有出现，否则法官肯定崩溃。至于为什么是非洲不是亚洲，林达用了大半本的《我也有一个梦想》来讲其中的纠结，非常精彩，读者不要错过。

可法律就是法律,不是儿戏,就算华人没有非洲血统,但华人算不算“白人”呢?多白算白?谁规定华人不够白?当年就有三位勇敢的中国人(可惜我不知道名字)在旧金山的联邦巡回法院挑战这一规定,而当时的巡回法官索约尔如此回答:“无论在日常语境还是在科学文献中,‘白人’都是个约定俗成的字眼,它的外延很少或者从未延伸到包括蒙古人种。”^①

1882年《排华法案》通过,排华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作为驻美副使的容闳在华盛顿难挽狂澜,上文已有记述。但这里我想提一个几乎已经被忘却的人,被清廷召回两年后重返美国的“留美幼童”,耶鲁大学1887级毕业生,李恩福。

李恩福,语言天才,精擅拉丁文。从美国著名的语言学校霍普金斯语法学校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耶鲁,1887年从耶鲁以顶级成绩毕业,时年26岁。同年,美国出版了他的书《我在中国的童年》(*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讲述了他从中国南方小镇走到美国的经历,这可能是华裔在美国出版的第一本书。此外,李更与新英格兰名媛丘吉尔家族的伊丽莎白小姐结成连理,在当时的排华浪潮中备受当地媒体瞩目。这个年轻人当时的前途可谓不可限量。

可这个人,抛弃了他一生所有最美好的东西,为在美华工争取

① “(white person) had a well-settled meaning in common popular speech and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 and “were seldom if ever used in a sense so comprehensive to include individuals of the Mongolian race”.

权利,四处演说。为赴反华浪潮最为激烈的西部,闹得妻离子散。而在西部,他的同胞终究选择躲在了中国城里战战兢兢,没有聚集在他的旗下为自身的权利奋斗。最终,他希望成立的中国劳工工会无果而终,他在 66 岁的 1927 年离开美国,1938 年死在香港。

我翻译了他的著名演讲——《中国人必须留下》,是为纪念早期华人移民在美国的艰难岁月,也是因为这篇百多年前的演讲内容,很多今天仍不过时。其中的很多争论,今天在世界各地对移民的态度和讨论中,仍时有耳闻,无论是欧美人对待外国移民,还是中国大城市居民对待农民工。

中国人必须留下!

(李恩福, Yun Phou Lee, 1889 年。本书作者译于 2008 年)^①

没有一个国家能承受放弃原则的后果。美利坚共和国的国父们曾坚持“人生而平等”的原则,把这片美好公正的土地变成全世界的避难所。因此,这片土地注定要成为所有自由国度的导师和领袖。这尊崇的地位端赖于良好的信念和正当的行动,而非彰显自私和贪婪。但今天,让我们看看这一代美国人是如何对待其他种族的? 谁能否认:这亚伯拉罕·林肯口中的“孕于自由”的国度,是在压迫他人中才不断得以扩张,它真正追求的根本不是什么“人生而

^① 懂英语的朋友绝不应该错过学习这位语言天才铿锵有力的原文:<http://bit.ly/dI4fH2>。

平等”，而是“人生而掠夺他人”？

看看那各项已经通过的排华法案，我们也许就知道美利坚共和国已经在背弃原则逆转传统这条路上走了多远。

中国移民们只是些普通的农民、商人、工匠，他们也从未要求更多。诚然他们并非王侯，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就是苦力和奴隶。正如他们的通关文牒所言，他们皆自愿前来。背井离乡不过为了来这里诚实劳作。他们听说美国的工资比其他地方高，他们听说美国人对中国人友好，他们听说是美国人诚邀他们前来。而中美双方签署的某些条款又告诉他们：两国子民在对方国度内能享有如对方子民一般的权利，于是他们才放心前来。没错，我们都知道是美国促成了这些巨大进步，而中国因此放弃闭关锁国也是因为她信任美国人的名誉和良好意愿。

在和后来进入加州的一些黑恶势力发生冲突之前，中国人一直安分守己，而加州人也对他们毫无怨言。是啊，他们凭什么抱怨呢？曾几何时，加州一半的收入都来源于中国窑工的血汗。但当工资随着生活成本下降而下降时，他们开始抱怨了。那些游手好闲的人越来越多，于是政客们开始寻求他们的选票，关心他们的要求。他们的抱怨也因此变成了政治行动。这些人齐声反对华工，他们人多声音洪亮，宣称如果哪个党派敢不把他们的诉求当成己任的话，就根本不可能在西岸立足。如果没有任何党派能在西岸立足的话，那联邦不就又要分崩离析了么？

一群工人反对另一群工人，对还记得 35 年前旧事的人来说一点

儿都不稀奇。反对中国人和当年反对来自欧洲的自由移民,尤其是爱尔兰人,毫无二致。那时候反对跨大西洋移民的人们用的不也是同样的理由么?什么大批廉价劳工将“削弱美国工人的价值,让他们一蹶不振腐化堕落,最终沦为赤贫;而且也会在很多行业取代美国的脑力劳动者”。当时冲突虽然比今日更烈,但理智的观点终究占了上风。因为人们终究发现是大批廉价的体力劳动者才让技术工人们享受到更高的工资和更稳定的就业。

(译者注:这种反对声音今天依然通行国际,也通行于中国的城乡。即便今天的美国,雇主在雇用一个技术移民之前,也必须向劳动局证明两件事:第一,本岗位确实雇不到合适的美国人;第二,必须发给被雇用的外国人和美国工人同工同酬的工资,所谓“行业通行工资”是也。而因为不能降低移民工资,雇用外国人又要支付额外的法律成本,这就降低了对移民工人的需求,部分地保护了本地人的就业。)

为什么美国人无论在社会还是工业链上都迅速上移,从而不再惧怕和爱尔兰人竞争,而爱尔兰人今天还依然惧怕和中国人竞争呢?一句话,爱尔兰人不如他们的竞争对手美国人。他们没本事像美国人一样跳出这低水平竞争,所以,为生存计,他们就必须和中国人争抢伐木工和汲水工的职位。

这些业内争斗无日无之,贸易工会和“工贼”(译者注:就是不参加罢工的工人)在争,爱尔兰人和德国人在争,昨天来美国的意大利人和今天来美国的意大利人也在争。让他们用法律手段去争吧,让

适者生存;但你们当年没有站在一边去反对另一边,至少没有站在强势的一边反对弱势。那么今天,你们为什么要站在欧洲移民一边来反对中国人呢?什么?你是说中国人和欧洲移民不一样,他们值得反对的地方就是多?他们干的坏事儿就是多所以就应该被反对?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那咱们就先一起来一条一条看看这些反对华人的理由,然后再做判断,这才公平,对不对?

1. 中国人的大批流入是对太平洋沿岸的共和制度和基督教文明的持久威胁。

我认为鼓吹这一条的人严重不信任共和制度和基督教文明。共和体制已经包容了来自欧洲底层的一千三百万人,他们中既有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虚无主义者,也有政治刺客和亡命之徒;可这体制却无法承受几万名世界上最平和最容易统治的人的“进攻”。在征服和教化了半个世界之后,基督教肯定已经丧失了其“源之力”,所以才在一小撮中国人面前束手无策!那中国人肯定不是天使就是邪魔!如果他们是天使,你们无需多言他们也自会离去。如果他们是邪魔,你们将无力驱逐他们。某些议员反对中国移民的论调说白了不过就是:“中国有四万万饿民,她可以轻松输出一千万人。而来到美国只需花费微不足道的 60 美元。所以,萨金特议员断言:‘最终,西岸要成不了美国的话就会沦落成蒙古。’”如果你知道中国人其实并不好迁徙的话,那这种论调的高妙就不过是昙花一现,经不起推敲;在过去的百年中飘扬出海的中国人不足一百万;即便在中国国内相邻省份之间的迁徙也是数目有限;在广东

的周边地区,想过这种外出历险生活的人实属特立独行。

再者说,中国的“饿民”们一天所得不过区区 10 美分,虽够糊口,但一年不见得能攒下 3 美元。照这速度,要多少年的积蓄才凑得够这 60 美元旅资?

2. 中国人有自己的“准政府”。

如果我不承认这一点,你们也许不相信我。威廉·斯皮尔牧师的人格无可挑剔,这里让我引用他写给《纽约先驱报》的话。他说,“六大公司”被看作是华人聚集区的政府,但它们实际是纯粹的慈善联合会。他经常出席这六大公司的会议,而且在中国传道多年,足够资历发言。可就是这样一位传授福音并且熟知事实的牧师,那些无知叫嚣的民意领袖们也不相信他。无知已占了上风。

3. 中国人这人种好像没有进取心。

在过去的十五年里,中国政府已经向欧美国家派出了二百多名留学生,建造了兵工厂和海军船坞,成立了西式的学校和大学,训练出了大败俄国人的军队,拥有可与美国海军一战的海军,铺设了数千英里的电报线;而现在,她正忙于开矿,修铁路,并借助美国的资本和经验架设电话机,并成立一家全国性的银行。中国人想拥有美国让人称羡的一切。

4. 借助低工资和低生活水平,中国人已经取代了白种工人。中国人的出现让白种移民对西海岸裹足不前。

提出这一条的人对事实和政治经济学原理几乎一无所知,简直不值一驳。请记住,建造铁路开垦沼泽也好,开采矿场种植果园制

造工业品也好,是中国“廉价劳工”的劳动为白种人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他们的劳动让今天数百万人舒适而奢侈地生活在昔日冒险者和亡命徒们从野兽和土人手中夺来的土地上。纵然“中国佬”工作卑贱(他做这些活因为他必须生存,他诚实所以他不甘沦为偷儿,他骄傲所以不屑领取救济),雇用他们也还是因为这种劳力稀缺。事实证明,正是由于他们的劳动,很多人才能集中精力干其他工作,而就算地痞流氓也能至少每月一次穿件儿干净衣裳(译者注:早年华工大量开设洗衣店,所以“洗衣”也常常出现在对华工进行侮辱的语境中)。你也许既不喜欢机器也对中国廉价劳工不屑一顾,但机器也不领工资,机器也取代了数百万劳工,为什么不干脆消除机器呢?

此外,你能保证一旦鼓起勇气,中国劳工们不会要求加工资?你能保证一旦有能力得到,他们不会拿走更多?

不是中国人一直在取代白种人,而是白种人一直在取代中国人。一旦某一行业在中国“廉价劳工”的帮助下起步,站稳脚跟后他们就开始辞退中国人,为给白种人让位。

5. 中国人不想成为这国家的公民。

他们为什么想成为这国家的公民?动力何在?让我来引述一些法律法规你们便知原因,这些律法虽然冠冕堂皇,实则都为特殊利益而设。《外国矿工执照法》强制每个中国矿工每月为别人已经抛弃的“工作权利”付费,这一过程持续 20 年,每月所付金额从 4 美元到 20 美元不等。

加州立法机构 1855 年的一项法案对每个中国移民征税 55 美元。而 1862 年的另一项法案则对每个年满 18 岁的中国人征收 2.5 美元的人头税(有少数例外条款)。

旧金山市 1876 年 3 月 15 日通过了一项规定,对所有的洗衣店征收执照费,标准如下:使用单匹马拉车的,每季度 2 美元;两匹马的,4 美元;不用车的,15 美元。这简直是报复性的歧视!(译者注:大多数中国洗衣店不使用马车,而用人力运输待洗衣物)

朴素、勤劳、和平的人,比如中国人,他们在意自己的生计,同时也不干涉他人,我坚信他们和那些吵吵闹闹、无知、烂醉如泥、唯教士之命是从的欧洲人一样适合拥有投票权。你怎么知道中国人不想要公民权?几年前,一些住在加州的中国人认为他们之所以受迫害是因为别人认为他们丝毫不关心美国公民权,于是他们递交了入籍申请。可那些迫害他们的人吓了一跳,要求议会援手,结果他们修订了加州宪法,把中国人排除在公民权之外。

看看加州对华工的种种“关照”,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少数华人举家迁来美国了。如果他们确实能受到保护的话,本应该有更多华人携家眷前来。

6. 中国人居所肮脏,食不果腹,居处拥挤不堪,对卫生和防火的规定视若无睹。

中国佬们并不排斥美食和豪宅。但加州政府对他们实在是照顾有加,一上岸便开始征税,时不时地就派人去敲诈,他们抱着客人的待洗衣服奔走街头还交税 15 美元,他们交纳累进的人头税却没有

哪怕一所学校为他们的子女提供教育,他们还没开始旅行就要缴纳道路税,他们去采矿时要交每天 30 美分的用水费,每月 4 到 20 美元的累进的执照费。这样一来,就算他们每天挣 5 美元,留到手里的怕也不过一毛五。

明智的人可能要问了:为什么你们允许中国人住在你们的城市里,却任由他们违反卫生和防火规定的? 惩罚这些违反规定的行为难道不是市政当局的职责么? 仅仅因为你们市政官员的玩忽职守,就要让整个国家蒙羞,然后不履行它签署的国际条约中规定的责任,禁止华人入境么?

7. 中国人从不和白人交往,将来也不会融入白人群体。

这话没错,但是想想吧! 中国佬们乘的船甫一入港,市民委员会便上船向他们展示这城市的自由(收费 5 美元)。码头上人头攒动,迎接中国佬的欢呼声此起彼伏(还有无数投来的石块)。当地望族竞相涌入中国佬住的客栈为他们接风(顺手牵走纪念品)。白人社会如此欢迎中国佬,如此稀罕中国佬,你说怎么就转不过他们的头呢(怎么就拧不断呢)?

如此款待,中国人还是“自顾自”,继续无视美国社会。对了,你们知道犹太人也曾谴责撒马利亚人拒绝和他们来往么?(译者注:实际上是撒玛利亚人想和犹太人交好,被拒绝)

8. 中国人来来回回都是异教徒。

对于这项指控,Beecher 先生说:“我们用棍子抽他们,用石头砸他们,烧他们的房子,还杀了不少人;但他们就是不肯皈依。我实在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除非拿炸药把他们全炸死，我看那是唯一送他们上天堂的办法。”虽然这些诱使中国人信教的种种努力非常可疑，但仍然有五百多中国人入了教会。

9. 大部分中国移民都是罪犯。

这不是真的。中国本土是有犯罪团伙，但是对那些越洋而进入这里的罪犯，你们该怪罪的是玩忽职守的海关官员。

1860年，加州的人口是38万人，加州的中国人口是35000人；关在监狱里的罪犯共616人，其中中国人28人。

虽然中国人口是加州人口的十分之一，但中国的罪犯数却只是加州罪犯数的十八分之一，这还不算法官和陪审团在审判中国人时往往多少带有偏见，否则这比例可能更小。那些愿意说句公道话的人，都可以出来作证说中国人是他们社区中最守法的人，他们性格平和，面对侮辱和伤害也一再忍让（唉，实在是忍让得过分了！）。他们很少被告上法庭。你一辈子也看不见他们酩酊大醉。

不过，你又说，他们吸鸦片。这件事，要我说，是他们的私事。法律可没说要惩罚个人的不良嗜好。你从未听说过中国佬组织罢工，选举舞弊，腐化司法。可为什么人们不讨厌其他移民却讨厌中国人呢？难道勤勉、忠诚和守法，都是犯罪？兢兢业业赚钱养家，而不是花钱买醉寻欢作乐，这难道也不对？这就让我想起了下一条罪状。

10. 中国人每年从这个国家带走大量财富。

1877年11月15日，加州参议院在给国会的备忘录中说，加州

有 18 万中国人。而海关和最权威的专家则说,1877 年,整个美国只有十万零四千中国人。嘿,全美国有十万零四千中国人,光加州就有 18 万!局部大于整体嘛。这备忘录还说,每年,这 18 万人带走一亿八千万美元。这数字够吓到任何人了吧?一亿八千万美元,那 18 万中国人平均每人每年就要往中国运 1000 美元,那每人每年就得赚 1250 元,也就是说,平均一天 4 元。一天 4 元啊!你还敢骂他们是廉价劳工?就算是两块五一天的工资,那在白人群里也算不错了。你可不能说受人尊敬的加州参议院故意撒谎。加州只是稍微地夸张了一下罢了。

现在让我来回应那最后一条,也是最可怕的一条罪状。

11. 中国人把举止不端的女人带到了旧金山,她们的邪恶正在腐蚀整个城市的道德。

我们得先看看事实,才能知道这条罪状有多严重。唉,加州,美国的道德标兵,旧金山,毫无污点的城市楷模,正无助地跌倒在中国人的邪恶毒树下。

你曾去过旧金山么?除非你能受得了天堂乐园和伊甸园般的圣洁,我劝你还是不要去了。为什么?因为这城市如安息日一般的宁静让人抓狂。那儿的所有人都去教堂,你要是在星期天建议来杯温威士忌或来场棒球赛,人们将举目望天,升起双手,祈求上帝宽恕你。街上绝无醉鬼(除了唐人街),那儿是警察的安乐窝(除了唐人街)。

除了教堂,这里还有很多献给维纳斯的神殿,供虔诚的人释放

他们额外的献礼。为什么那里的如花女祭司几乎赤裸呢？因为穿衣会妨碍灵魂的交流。加州人心灵纯洁，道德高尚，信仰坚定，在所有的事上都如此。至于那些名声不好的妓院，不洁身自好的女人，我可以告诉你她们和羔羊一般无辜。就算撒旦在伊甸园引起的混乱，也远不如中国人在加州的所为。

也许人们会想，这么圣洁的社区应该能“净化”那些中国女人啊？可他们没有。他们派了些警察去监视她们，逮捕她们，虽然这些警察在化铜成金方面神力惊人（译者注：指这些警察不仅也去嫖妓，还以铜充金，付假钱），但在执法上，却比蝙蝠还瞎。若高尚的旧金山自甘堕落，那也实在是咎由自取。

这么多反对中国人的罪状，这么多立法反对中国人的原因，可他们依然有自己的影响，犹如不停劳作的器官中发出的闷哼。他们的周遭，对他们无缘无故毫无道理的偏见深入骨髓，对他们的熊熊怒火也随时可以爆发。而公众对这一切，漠不关心。

李鸿章访美

本国公民在外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本国政府自然应该出头调解。可惜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也还是不得不靠自己啊。清政府无能，顶多也就只能在极其有限的机会中摆摆姿态罢了。

1896年8月29日，李鸿章一行抵达美国纽约，开始为期一周的非正式访问。《纽约时报》当天以头版将近7000字的篇幅报道了规格空前的欢迎仪式和游行，据说当天有50万人观看了游行。当游行

队伍经过第 19 街和第 5 大道的交界处时,一个小孩儿向李鸿章投掷了一枚干柠檬。虽然当时已是 74 岁高龄,李中堂毕竟是戎马一生身手了得,何况前一年还在日本马关遭遇小山丰太郎的刺杀,于是轻巧地闪身避开。

9 月 3 日,李鸿章在下榻的华尔道夫饭店举行了记者招待会,问答都精彩。

临近尾声时,有记者问:“大人,您愿意让美国和欧洲的报纸进入中国么?”

李鸿章说:“中国已经有报纸了。不过很不幸,中国的编辑们不报道真相。你们的报纸是‘报道真相,报道完整的真相,只报道真相’,可中国的编辑们不是这样。中国的编辑们对真相是惜墨如金啊,就只讲一部分一点点。所以,不像你们的报纸,中国的报纸没什么人看,发行量不大。因为舍不得说真话,我们的报纸不能传播文明教育大众,不能完成一个好报社的使命。”

当时记者会的重头戏是美国刚刚通过不久的大规模《排华法案》,李鸿章当时从纽约回国时故意不走美国西部而取道加拿大,就是抗议美国政府在加州没有给中国侨民应有的权利。

当时李鸿章有些激动,双眼放光地说了很多话,批评《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正的法律。当然,这是一个政治家的应有姿态。但让我惊讶的是他批评的角度和方式,几乎完全是经济学的。李大谈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对中美两国的好处,批评美国政府愚蠢,拒绝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就是拒绝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好的产品。警告美

国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将因为生产成本太高而在国际市场上输给欧洲。

任何产品,都是劳动力和资本结合的产物(李鸿章在鼓励美国到华投资时也谈到了这一点),所以输出商品(出口)和输出劳动力(移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今天的国际贸易教科书也必包含移民问题,就是这个道理。

当出口的商品便宜,进口国生产类似产品的行业面临的竞争压力就加大,这是进口国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根源。但就算再不济,这些行业还可以倒闭,工人还可以转行到那些生产“不可贸易商品”的行业去(就是交易不能跨国进行而必须发生在本国内的行业),比如理发啊、建筑工人啊等等。

一方面,接收移民和进口价格低廉的商品类似,因为新来的移民可以接受更加低廉的工资,让他们在本国劳动,本国商品的价格也会降下来。另一方面,“移民”比“进口”面临的阻力更大,带来的冲突更多,因为廉价的劳动力涌入后还可以直接进入那些生产“不可贸易商品”的行业,带来更大范围内的竞争,这才是《排华法案》的经济根源。今天的美国,低技术的移民已经大量进入了那些生产“不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的行业,比如建筑工地上有很多墨西哥人,而修指甲的绝大多数是越南人。

李鸿章说到最后情绪激动起来:“比起爱尔兰人和美国的其他工人,中国人生活成本更低。你们的工人恨中国人,就是因为中国人的德行更高尚。”这最后一句一出,连他的翻译都不禁苦笑起来。

这次记者招待会的报道很精彩,能看到李鸿章很多微小细节处的“天朝上国风范”,比如迟到半小时,比如穿着和仪表,比如坐姿让记者想到拿破仑的画像。但不管怎样,他的说话还是能体现出这个人的不凡,他也一直是中国近代史上我最喜欢的人物之一。

结 语

中国人最终留了下来,然而《排华法案》也通过了,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基本上没有新的中国人移民美国,更重要的是,没有中国女人移民美国,所以美国华人社会的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直到二战时中国成了美国的同盟国之后,《排华法案》才在 1943 年废除,成千上万的中国女人才得以进入美国,华人社会也才慢慢由光棍的天下进入了比较稳定的家庭社会。而新中国建立之后,又有漫长的几十年,中美几乎不相往来,直到改革开放。

当代的美国华人移民多种多样。一方面,清华、北大为美国培养了最多的理工科博士,比美国本土最大最好的大学还要多得多(详见本书《建美国大业》一文)。另一方面,中国还为美国输入了最多的所谓的“政治难民”:2006 年美国给予政治庇护移民身份的人当中,中国人占 21%。此外,中国也为美国输入了大量的非法移民:据 1990 年代中期中央情报局的统计,每年有不下 10 万中国人偷渡到美国。这条从福州到纽约的路,背后又是各路黑帮势力和利益的重重纠葛。

这多样的华人移民社会,都源自一百多年前进入美国的华工和留美幼童,这些人的故事和抗争,不应该被遗忘。

注: 本文涉及的各种资料约数十种,为节省篇幅,不一一列举。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一转念 用经济学思考

作者 = 兰小欢著

页数 = 2 0 2

S S 号 = 1 2 8 4 5 2 2 9

D X 号 = 0 0 0 0 0 8 1 1 7 7 2 6

出版日期 = 2 0 1 1 . 0 5

出版社 = 上海三联书店